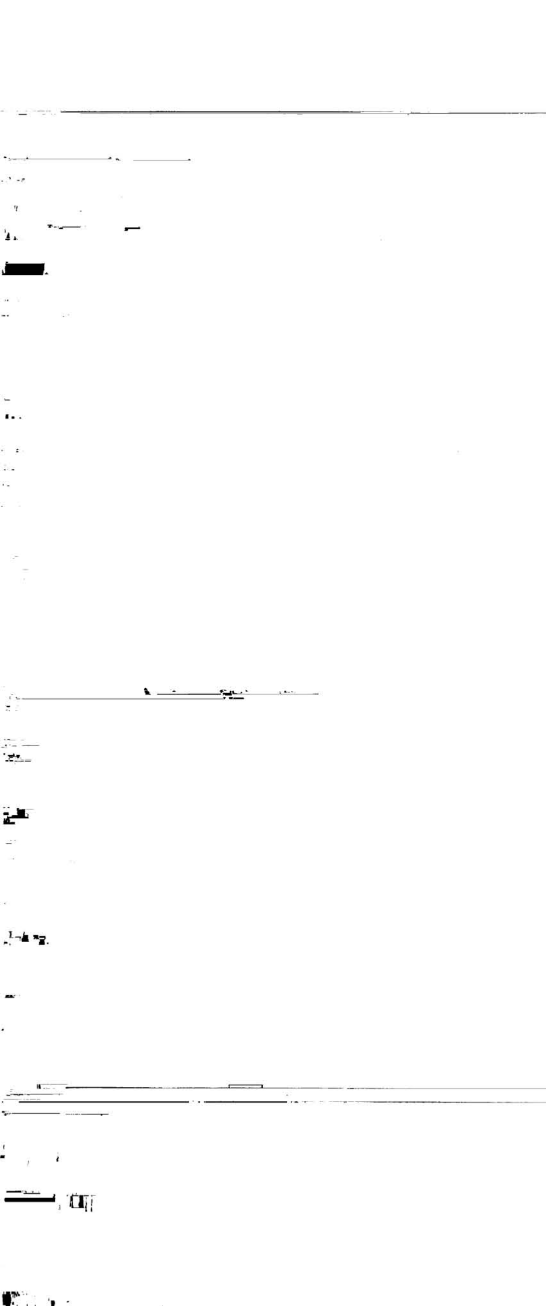
歲月沉沙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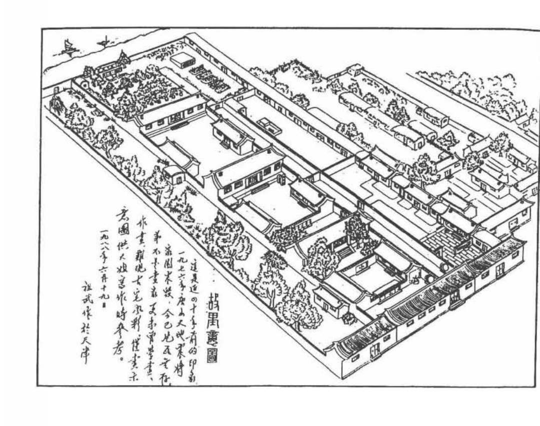
薊運河畔

羅蘭

目次







故里憶圖

堂弟祖武於一九八八年六月憑記憶繪製，原址已於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時全毀。



父親少年時，約十六歲

1930年代，父親全盛時期，在久大精鹽公司總工廠做鹽煤管理處主任。

一、大宅巡禮

「你們家好像一座大廟！」

民國廿七年（一九三八）暑假，我帶著在鄉下所教的小學女生，到蘆台老家去玩。那五年級的女孩，仰頭望著我家那高高的屋脊，如此形容。

「房子那麼高，站在院子裡好像要暈倒，」另一個女生這樣形容。

「嗳！這是宅子，還是大廟？」「解放」後，駐進我家的軍隊彼此這樣發問。

由這些來自外人的、不存成見的反應，可以窺見「靳嚮善堂」這大宅的高古與荒涼。

這大宅的荒涼感，隨著歲月加深又加深，終於，它在唐山大地震中傾圮了。

當年，它是仿照宮殿式興建的。只除了廳房明柱不敢用紅色而用了黑色。全盛時期的老家，一定是堆金積玉，富麗堂皇的。但當一所偌大的宅邸由盛而衰的時候，同樣的宏偉格局所給人的感覺卻一變而為荒涼空曠。去掉了那由於家運昌隆而顯現的富貴氣，就不知不覺被一種空蕩蕩，撐不起來的感覺所取代。

老家在河北省寧河縣蘆台鎭。堂號「靳嚮善堂」。不過當地人們直到現在，一九九三年了，仍然稱「靳嚮善堂」爲「聚泰號」。

「聚泰號」是高祖父時代所開的糧店。

傳說，高祖父兄弟二人隨祖上從浙江紹興移居北方。赤手空拳，來到蘆台謀生。先是在親戚的住家門外屋簷下擺個小攤賣糧食，所賺的錢雖然很少，但兄弟二人人緣極好，做生意誠實不欺，空閒時就唸唸書，很得主顧的信任。二高祖父特別喜歡文墨，練就一手好書法，常給鄉人寫寫對聯，漸漸有了名氣，結識了地方上的仕紳，經人推薦，進了縣府做師爺，撰寫公文，得到縣府的重用。大高祖父堅守本行，積存了一些本錢，開了正式的糧店，就是「聚泰號」。

「聚泰號」給這兩兄弟帶來財富，以後又繼續經營了其他生意，開了木廠、首飾樓、藥鋪、還有一家黃酒廠，都以「聚」字排名。他們也置了許多產業，包括十幾所瓦房，本縣和外縣的莊園土地，蘆葦地等等，逐漸成爲當地首富。家中所住的這棟大宅，位於北街，後臨薊運河。中間四層大四合院，兩旁是東西兩個跨院。第五層是橫跨三個院落的大花園。

祖父那一代，是最承續祖上餘蔭的一代。那大約是淸末同治年間到光緒年間，外侮不斷，鴉片煙久已荼毒全國。民間不但無法抗拒煙害，反而形成一種風尙，許多有錢人領先追趕這時尙，祖父一代也有幾位染上煙癮，視爲富貴的象徵。加速了家道的衰敗。到了父親這一代，不但「聚泰號」已不存在，只剩下字號名稱；所經營的其他生意也都已經倒閉或出讓。田地莊園大部分典

當質押，房產也只剩下了薊運河畔，我們所住的這一所大宅。所幸到了我父親、伯、叔這一代，不約而同地奮起經營，不再揮霍，拒絕不良嗜好，各安本分。能出外求學的出外求學，學成之後，有人出外做事，有人自願守住家園，拯救家業，放棄向外發展的機會，在家照顧所剩無幾的田莊。對內節衣縮食，對外卻盡量維持「聚泰號」的聲勢，絕不在鄉里間露出敗相。一切婚喪大典，絕不馬虎吝嗇，竭盡所能，照以往的排場辦事，而且絕不舉債。

多年來，家中的伙食，用我們自己的話來形容，是「鹹菜拌豆腐，豆腐拌鹹菜」。天天小米高粱，對外卻一絲不苟的撐住了場面，連祖上對清寒親戚的接濟，也分毫不減，年年照以前的規矩辦理。居然熬過了各種戰亂，而且逐漸贖回了典當質押的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家中幾乎可以說是恢復了元氣。逐步走向振興的途中。

這「靳鄉善堂」第四代的力圖振作所顯示的意義，與其說是爲了恢復當年的榮華，不如說是基於一份根深柢固的中國倫理。做爲後代子孫，先天有責任振興家業與保護家聲。否則便是「不孝」。伯、叔與父親這一代，正是這樣令人起敬的一代。

我是這家中第五代的第一個小孩。

出生在家道衰微與力圖振作的交替時代，懵懵懂懂，成了這所大宅中的一員。

都市裡，正在風起雲湧，受到「五四」新潮的強烈衝激。父親和三叔、四叔都在天津就讀新式的學校。而蘆台鎮上，這保守的大家庭裡，卻還維持著從裡到外的平靜如恆。我的母親也仍然

是和家中其他的妯娌們一樣，在這嚴守舊禮的大家庭做媳婦，既沒時間也沒心情來照顧我。

於是，我只得「自立更生」。

先天不足的我，直到三歲，還爬不上那通往正房的高台階。而就在這不得不艱苦掙扎，練習「自立」的情形之下，我一個人，全用那屬於幼兒的直覺，逐步去認識這所大宅。

那感覺是很奇特的。

小小的我，看那高大的瓦房，是出奇的高。屋簷更成爲不可企及的一些懸崖。仰頭看那高高在上的屋簷陰面的瓦，顯得格外莊嚴。廳房明柱和只能貼附著它慢慢繞行的我，成爲懸殊的對比，使我彷彿永遠無法與它相提並論。各層正房的台階那麼高，又那麼荒涼，我從母親所住的東廂房走到祖母或曾祖母住的正房，不但要飽受那走不完的方磚院落的考驗；更要受那必須努力攀爬的高台階的威脅。好不容易竭盡自己小小的力氣爬上了「頂峰」，看見了那正房後門高高的門檻，卻還不得不被那沉重的風門阻擋在外。

「開門哪！」我必須盡我可能的高聲喊：「開門！」直到有人聽見，趕來相助爲止。

風門打開之後，我拒絕開門的人把我抱過去，堅持要自己爬過那又高又寬的門檻。

那一定是一幅很動人的畫面。穿著舊式花衣服和母親手製的「貓鞋」，戴著「貓帽」的我，是需要怎樣的一種毅力，才可以不避艱險的爬過這最後一道「稜線」，抵達曾祖母或祖母那溫暖有情的房間！

年輕而寂寞的母親把弱小的女兒放手，讓她去跋涉攀爬的時候，是不是也充滿著無奈與疼惜呢？在我日後聽到的，長輩們的描述中，令我至今反覆思維的是母親那慣常的叮嚀：「慢慢走啊！別跌跤啊！」而我就一面小心的走著，一面自言自語的重複著這叮嚀，警告著自己：

「慢慢走啊！別跌跤啊！」

這來自母親的啓蒙第一課，變成自我警惕的金句。在我今天回想起來，卻提醒了我一生的身世之感。那獨自離家在外奮鬥的一生的艱辛，如果換作更加感慨深沉的兩句話，那不就是：「海上風濤闊，扁舟好自持」嗎？

母親那時是爲了訓練我獨立嗎？

還是年輕忙碌的她，不好意思親自送我去給曾祖母或祖母帶，而只得給我設計一項任務，使我有理由去投奔這兩位長輩呢？

母親給我的任務是一隻小小的彩色花籃，裡面裝著各色的碎布。「給老太太送碎布去，粘狼牙狗牙去！」母親的指令也變成我的另兩句「口訣」，一路唸著，一路去完成使命。「狼牙狗牙」是小孩子的話。它指的是當時婦女們做手工常用的一種鋸齒形的二方連續花樣。曾祖母做的手工很精細，母親交給我的這項使命可以一舉兩得，使老人家與小孩子都有事可做。

我在這大宅中，學著不糾纏母親，學著完成使命，也順便學著認識這太大又太荒涼的環境。它在我記憶中是莊嚴空曠而又充滿艱辛的。

幸虧當我再長大了一點的時候，發現了家中有三處美景：一、藤蘿架；二、箭道；三、後花園。它們爲我消除了那荒涼的感覺。

藤蘿架是一株古老的大藤蘿，它佔據了大宅一層與二層之間的一個長方形的「橫院」。它的南面是二層廳房的背後，由於它繁茂的枝葉，把那莊嚴的建築遮蔽成綠葉蔭蔭。北面是一道十二摺的屏門。這屏門，古意斑駁的蒼綠色，最引我喜愛。因爲它很像是爲這株大藤蘿而做的美麗的畫框。當屏門摺疊成兩扇而推往兩旁的時候，有特爲頂門用的小石獅把它頂住。那小石獅雕得很是玲瓏，可以讓我把它們提來提去地當玩具。

老藤蘿不知多少年了。粗粗的樹幹從地面橫過來，它的藤蔓往那木製的架頂爬上去，茂密的枝葉就遮住了整個的空間。開花的時候，紫霧迷濛，一串串地掩映在綠葉之間，形成濃濃的水彩蔭涼。於是「藤蘿架」就變成了這片院落的名稱。當我們說「到藤蘿架去」，那就是指這長方形的橫院和架下那圓形的石桌與石櫈了。它是長輩們帶著我們夏天乘涼的好去處。

至於說「箭道」和「後花園」，那卻是在我可以「獨遊」之後的驚喜大發現了。它們很幽深，很靜寂，但十分令我神往與留戀，成爲我日後可以擺脫同伴，自己「尋幽探勝」的最佳起步。

二、我是誰？

我是誰？是誰給了我「聚泰號」這讓我探索不盡的美麗而又荒涼高古的老家？一進大門，抬頭即可望到的那莊嚴黑漆金字的匾額「彤管揚輝」，是什麼意思？小時候看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應該把它看懂。

祖先，對幼小的我來說，只上溯到祖父。父親最常講的也是關於祖父的故事，講他的倜儻不羈，我行我素，喜歡突破舊格局，接受新事物。我沒見過祖父，卻聽過他的錄音。在愛迪生剛剛發明了「蓄音器」的年代，他就得風氣之先地把自己的聲音灌錄在那圓筒狀的「唱片」裡。在那一般家庭都還不知道「話匣子」爲何物的年代，他出錢爲一位歌妓灌錄戲曲。其中特別錄上他的解說和「桂寶唱的好哦！」的喝采。

祖父灌錄這唱片的時候約在一八九〇年左右（注：愛迪生於一八七七年發明蓄音器。一八八五年，唱片開始用蠟筒）。那時，他大概三十多歲，手頭多金，人又瀟灑，肯定是天津娛樂界的衆望所歸。而他當時所買下的那剛剛發明的唱機，如果留到現在，會是博物館的珍藏。

後來，我逐漸知道了曾祖父。曾祖父一代單傳，是繼承及發揚拓展「聚泰號」產業的關鍵人物。父親曾要我記住「三代」的大名，以備考學校的時候作答之用。於是，我記住了這「三代」：曾祖父，靳葆元；祖父，靳蘭田；父，靳東山。

其實，那民國二十年前後，入學考試早已不考「三代」了。學化工的父親卻還在這「考古題」上給我「惡補」。

在那以後，由於父親所講的故事中包含了更久遠以前的祖先，隱隱約約，知道曾祖父的上一代，兩位高祖父創下了偌大家業，使「聚泰號」在將近兩百年後，儘管早已不存，仍然名聞鄉里。

高祖父兄弟二位的年代，在我當時聽來，已經是太古老了。他們是乾隆年間的人。

直到最近，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一九九一年了。忽然又在無意中看到《寧河縣志》上有另一個名字——靳永銓。

「這是誰？他和我家有關係嗎？」

如果我知道他是誰，我還敢這樣直接寫他的名字嗎？

按照傳統的規矩，我至少應當稱他爲永銓公，或者應該更鄭重地稱他爲靳諱永銓。

因爲他不是別人，他是我高祖父的父親。我應該稱他爲「太高祖父」。

「太高祖父」靳永銓公，推算大約生於一七七〇年左右，略晚於清乾隆三十六年。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名字時，覺得非常陌生。只因爲我自幼及長，從未聽家中有人提過這名字，我在縣志上注意到的是這姓氏。姓靳的人，即使在家鄉，也並不是很普遍。再看下去，發現他的事蹟雖然簡略，其中卻有一句「以孫葆元貴」。「葆元公」，那不就是我的曾祖父嗎？那麼，他就是我曾祖父的祖父了。親切之感立刻油然而生。

只因爲我隨著父母少小離家，雖然時常回去小住，畢竟對家世太陌生。何況在我準備寫這本書的時候，幾位堂弟，甚至當時還在世的家中唯一長輩五叔都未曾提過。手邊的一張老家墓園圖，也只把兩位高祖父列爲最早。圖上最高位置處雖然繪有一座墳塋，所寫的說明卻是「虛祖」。意思是年代久遠，無需考證了。

但是，《寧河縣志》替我們記載得十分清楚。這位太高祖英年早逝，由太高祖母承擔起持家教子重任。她的事蹟在縣志上佔了相當篇幅，受到隆重的表揚。而老家迎門那幅巨大的匾額「彤管揚輝」正是清咸豐元年頒贈來表揚她的。

太高祖母娘家姓張。傳統縣志上對女人只稱什麼「氏」，連名字、家世一概不提。重點是記載她在二十七歲時，丈夫去世，茹苦含辛，在貧困中「勤紡績，撫遺孤」，把兩個孩子教育成人而各有輝煌的成就。後來她「榮膺封典」，咸豐元年，獲頒「彤管揚輝」匾額。所謂「彤管」是紅色的筆管，古時的女史官用這種筆來記載宮中的政令及后妃的事蹟。「彤管揚輝」是讚譽這位節義雙全的婦女持家有道，教子有方，光耀了靳家的門楣。

高祖父兄弟廷儀（字鳳翥）、廷祥二位，在賢母教導之下，不但事業有成，成爲地方上的首富；而且樂善好施，造福鄉梓。特別是二高祖父廷祥公，縣志上形容他「有器識，性孝弟，從無急言遽色。凡親族有緩急來告者，輒周恤之。」並且列舉他著名的善行，如：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推算他當時約爲六十歲）歲飢（荒年，收成不好），出粟賑貧。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推算約爲七十歲）瘟疫盛行。他施送棺木。

光緒元年正月（一八七五年，約八十三歲）將鄉人向他告貸的借據全部焚毁，不予追討，嘉惠無數貧苦鄉人。……

其實，根據父親爲我們講過的許多「老家的故事」來印證，我所聽到的高祖父的善事是經常性的。就以焚毁借據和周濟貧苦鄉人的事，根本就是他的日常。而其中特別突顯出這善行的戲劇性的，根據父親的講述，是每年過年大除夕，人們都在溫暖的家中圍爐守歲的時候，這位高祖父卻和家人打著燈籠，冒寒到鄉間去巡視，看那一家沒有點燈的，可想而知，這家日子必定過得悽慘，就悄悄放一些包好的錢和糧食在他們的窗檯上，使這家人得到一些救助。至於燒毁借據的事，也是每年如此的。往例是一切欠債都在除夕前要結清，他就會在照例催討的時候，由於對那些窮苦人家的同情而當面就把借據撕毁，不再催討，讓他們放心過年。

這些在我幼時當故事聽的祖上事蹟，原來縣志上也有記載，使我覺得這些故事都倏然之間被一一點亮，成爲許多支令人感動的燭光，溫暖生輝，照亮了悠久沉埋的歲月。同時我也忽然明

白，爲什麼父親那麼喜歡講這些故事給我們聽，而我們又是那麼百聽不厭。祖上的溫暖善行，不但是我們的典範，使我們覺得光榮，而且給了我們對人間情誼的肯定。尤其在我們那麼幼小的時候，這些來自祖先的故事，帶著溫暖的感情和啓示，一種循循善誘的慈愛，使我們相信，活在這世界上，即使有什麼苦難，也一定都能得到呵護與照顧，而可以勇敢的生活。

樂觀的心，是這樣培養起來的吧？

「家」的感覺又是何等的溫馨啊，難怪我每次回老家都那麼快樂！

「家」的意義是如此深遠！祖先給我們的是奮鬥開拓的歷史，是綿延不斷的來自先天的親情，和把這親情擴大發揚，嘉惠別人的眞誠與善意。

是誰說，「家」已經不再重要了呢？

是誰嘲笑過「祖先崇拜」，認爲那是落後與迷信而亟思革除呢？祖先的護佑與監督，難道不是比一般宗教更加眞實而有情的嗎？

我是靳嚮善堂、聚泰號第五代的第一個小孩。我極愛薊運河畔這片住宅，愛它古老的建築，寧靜繁茂的花木；也愛它在空曠與荒涼之中所蘊藏著的豐沛的愛與活力。這裡面住過極富創造力與開拓力的祖先，溫暖和悅而又艱苦卓絕的長輩，和至今在精神上仍然十分親近的我們這些後代子孫。

三、皇上的家當

直到我離開家鄉的那一天，父親書房裡還是掛著那只被父親視爲「傳家之寶」的掛鐘。這掛鐘，在今天看來，也許沒有什麼稀奇；但如果你注意到它那鍍金的鐘面，彩繪的、眼睛會轉的西方美女，以及它那兩條長長的懸垂著的金鍊，你就會知道爲什麼父親把它視若拱璧；和爲什麼它多年以來，一直是我們在搬家或逃難時的「第一優先」。

父親從來不告訴我們這鐘的眞正價值。他只是無論在多麼緊急的情況之下，只要是搬遷，必定首先搶救這只掛鐘。我們從小到大，都時常看到父親對它「第一優先」的動作，首先是把那兩只重重的鐘鉈取下來，用報紙包好，交給我們兄弟姐妹中的一個，而且每次都必定囑咐——「很重！別掉了！」

然後從那掛鐘的底部拆下它的鍊條，那是由兩枚金鈎掛在鐘腹內部機件上，做上弦之用的兩條長鍊。最後是把那掛鐘愼重地從牆上摘下來，小心地放進那原來就屬於這掛鐘的一只精緻的木匣裡。木匣上著黑漆，很莊嚴的樣子。它的蓋子做得十分精細，可以從一邊推進去，非常嚴密。

裝好之後，還要再包上幾層綿紙和報紙，放進盛著很多毛皮衣服的箱子裡，上鎖之後，貼上封條，另外還要在箱蓋上貼一張帶有紅框的信紙，上面用毛筆寫上醒目的大字：

「此箱怕壓，請放在浮面上」。

父親一定是很怕工人搬動這箱子的時候不小心，所以總看見他一路叮囑，一路跟著，眼睛不離開那箱子，直到肯定它沒有被其他行李箱籠壓在下面，這才放心。而這鐘的兩只鐘鉈，就成爲我們這幾個小孩子爭著替父親服務的一個對象，它們確實是十分的重。父親說：這鐘鉈原來是金色的，爲了怕被人以爲是純金，所以漆成了黑色。

這只掛鐘，無論父親是處身順境或逆境，無論他是在久大精鹽任高職，還是在天津大雜院做難民，它從來沒有離開過父親的左右。

這只掛鐘，是祖父無意中買到的。

好像一切事，對喜歡我行我素的祖父來說，都帶著濃厚的傳奇色彩，他從不以實利爲出發點去做事，但由這只掛鐘所給祖父帶來的寶物，卻眞是令人瞠目結舌！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進北京，老家蘆台鎭距離北京東南二百八十里。那時「京奉鐵路」已經由山海關可通北京，蘆台是中途的一站，和京師之間，交通便利，商旅來往頻繁。

某天，祖父在老家門口閒眺，看到一個賣舊貨的小販，挑著擔子從門前走過。喜好新奇的祖父，一眼看中了小販籃子裡的一個西洋掛鐘，鐘面繪有一個彩色的少女，金髮碧眼，那碧眼會隨

著懸垂的鐘擺左右轉動。而鐘的下面兩條長長的金鍊，下懸兩只玉米般的鐘鉈，頂上有個小門，在打「點」報時的時候，裡面的小鳥就會在鐘聲「噹、噹」的間隔裡，伸頭出來，叫聲「咯咕」，形成「噹——咯咕！」的樂句。在當時，這是非常新奇罕見的。祖父一眼看中，把它買了下來。買下之後，就問那小販，你還有沒有同樣的這種鐘，小販答說，還有一個。祖父要他明天帶來，於是，祖父買了兩個同樣式的鐘，一個較大，一個較小，顯見並不是一對，也不是同時進到中國來的。祖父意猶未盡，問那小販，「你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如果有，我都要。」

小販很高興碰上這樣的主顧，於是除了他自己已有的之外，又向別處廣為搜羅，肩擔、手提、車推，陸續送到這位「五爺」家來。就這樣，祖父從這賣舊貨的小販手中，買下了整櫃的瓷器，整箱的古畫和書籍碑帖，無數的玉飾和其他零星古物與文玩，還有一面銅鏡。

原來這些東西都是八國聯軍進北京，搶了故宮，奪走無數寶物之後，餘下太多帶不走的，落入亂民手中。大家不識貨，只覺得反正這些「皇上的家當」，多多少少，可以當舊貨賣上幾文。於是，這些古物隨著賣舊貨的小販流入了京東八縣之一的寧河縣蘆台鎮，被我祖父以廉價大批的買下，使「靳嚮善堂」這仿照宮殿所建造的大宅裡，平添了眞正來自皇宮內苑的各種古物。

祖父在無意之間，做了撿到大便宜的「收藏家」之後，並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地把這些珍品當一回事，由於日後我所見到的那整箱的古畫，整櫃的名瓷都原封不動地放著，可以想像，祖父並不曾認眞地把玩過這些東西。他那活躍外向的性格似乎對收藏與研究並沒有什麼興趣。尤其在

祖母去世之後，他不滿意續娶的繼室，索性離家出走，長年住在天津，這些古物就一直被深鎖在那些箱櫃裡。很奇怪的是，家中其他的人好像也並不注意這些由「壞脾氣」的五爺從舊貨小販手中買來的東西，於是就聽任它們在一些房間的箱櫃裡深鎖著。

我和這些「皇上的家當」接觸的時候，年紀很小，由於經常到祖母房間去玩，這位繼祖母要哄我而又沒有玩具，其中有一種珍品，就做了我的玩具。

在那陳舊的時代，傳統中國的小孩是沒有什麼玩具的，我的玩具好像只有一個「撥浪鼓」。當然，玩久之後也膩了。一定是因爲我纏得繼祖母沒有辦法。於是，她只得搜盡枯腸，從祖父的遺物，大小箱匣中翻出一只緞面橢圓形的首飾盒，這首飾盒，在我看來是顏色舊舊的，質料輕輕軟軟的，和現在的化粧箱大小差不多，大概是手工做的。祖母打開這首飾盒的蓋子，用手一把一把的抓著裡面那些小型的玉飾說：「這些都是零碎，不值錢的，給你玩吧！」

這些「零碎」包括許多戒指、扳指、煙嘴，帶鈎、帽正、墜飾等等，祖母一個一個的拿起來看看，把它們的名稱介紹給我。我當然不懂這些東西的意義，也不太覺得它們有什麼好玩。不過，我卻記住了那些玉石拿在手上的感覺，那是一種十分滑潤的感覺，這感覺彷彿一直都存留在我的手上。但對那些玉飾，我卻沒有興趣。雖然在我逐漸長大的過程中，經常有機會在回老家的時候，把玩它們，但那些扳指是男人用的，戒指也都太大，墜飾、煙嘴和帶鈎及帽正，對我來說，毫無用處，直到我師範畢業那年，才找出一枚最小卻也比一般戒指寬了兩倍的戒指，和當時

學校流行的化學製品充象牙的戒指一起戴在手上，後來也不知所終了。

祖母給我的「啓蒙」玩具，就此留在我記憶的一角。直到走入社會，看到了世人是如何地追逐羡慕珠寶金玉，回想到自己幼時當玩具抓來抓去的那些「零碎」，才恍悟它們的價値。那些由故宮裡流出來的珍品，應該是在當今博物院陳列展覽，供人觀賞的東西，一種暴殄天物的罪惡感與慚愧之情，才漸漸伴隨著那些「零碎」玉，化爲我回憶老家時，那複雜心情的一部分。

四、「皇上家當」的下場

我這暴殄天物的罪惡感，和祖母的罪惡感比起來，那可就「小巫見大巫」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大部分時間是在祖母房間的炕上，由祖母陪我玩。那靠近套間的槅扇旁邊，是一只大大的炕箱。北方建築中的磚炕佔全部睡房靠窗，橫貫兩邊牆的空間。寬約八尺，長有丈餘。炕上鋪氈條、皮棉褥子或涼蓆。中間有一個炕桌。炕的兩邊靠牆設有櫃子和炕箱。炕箱的長度和炕的寬度相等，高約三尺。我小的時候，站在炕上看炕箱的內容，掂起腳來，也看不見底。

祖母的炕箱裡，放的都是眞蹟古畫。

那一軸一軸白白的古畫捲軸，對我這小孩子來說，是完全沒有意義，更沒有吸力。偶爾祖母打開一軸讓我看，說「這是唐寅的」，「這是仇十洲的」，我覺得那大概是某位遠房的親戚、長輩，或鎭上同鄉的名字。由於祖母特別喜歡介紹他們的畫給我，所以我對這兩個名字印象深刻。

很不幸的是，這反而使我日後一直不能用景仰的心情看待這兩位名家，先入爲主的印象，使我總

覺得他們只不過是鎮上某處的兩位「土學究」。

古畫對我沒有吸力，倒是從箱子角落上，偶爾「撈」出來的土布做的「筆袋」，裡面有一束一束的鉛筆比較可愛。那清末民初時代留下來的鉛筆，曾經是新式的文具。木頭筆桿的顏色有淺淡的綠色、舊舊的粉紅或淺黃，那薄薄的顏色，十分簡陋，但對我那年紀的小孩子來說，卻遠比那些無色的捲軸古畫有吸力。於是，我「佔據」了鉛筆，成為我的「第二項」玩具，而不屑一顧那古畫。

鉛筆是六叔上小學用的。六叔是繼祖母唯一的兒子，和父親雖是同父異母，兄弟倆卻一直很親近。六叔個性單純爽朗，只是完全不近文墨。懶得讀書。大家也不知道他究竟喜歡什麼，曾送他去街上商店學做生意，他也不喜歡。自己跑到關外去加入了奉軍，在一次戰役裡打了敗仗，倉皇返家，從此不再當兵。卻使祖母那古老的房間裡，多了一副奉軍的武裝帶，和一柄大刀。它們和祖先遺留下來的古琴與琵琶及一柄據說可以避邪的古劍併排掛在牆上，給老家劃開了兩個時代。後來，父親在塘沽「久大精鹽」工作順利，把六叔也介紹進去做個小職員。職位雖低，收入卻不算少，又因為生活簡單，不需排場，也沒有什麼應酬，手頭存了不少黃金，後來一直比父親過得富裕又穩定。

六叔那舊式的鉛筆給我做了一陣玩具之後，我也就離開老家，暫別祖母，隨父母到塘沽去生活。在塘沽見到六叔的機會並不太多，只記得他笑嘻嘻而又必恭必敬地垂手侍立，聽父親向他訓

話，指點他做人做事的道理。那傳統的長幼有序的倫理一直延續到我父親他們這一代，到了我們這一代時，「全盤西化」逐漸取代了傳統的規矩，兄弟姐妹之間也就只剩下先天的友愛而不再重視後天的規矩了。

至於說，和六叔那些鉛筆同在一個炕箱裡收存過的眞蹟古畫呢？答案卻就在繼祖母身上。

那年，我十六、七歲，在天津河北女師，趁著暑假回老家玩，照例睡在繼祖母的房間。繼祖母打開炕箱讓我看，只見裡面已經空無一物。原來祖父去世以後，祖母的鴉片煙沒人供應，不得已，把古畫拿來換鴉片煙。「一軸古畫換一個煙泡，」祖母坦白地告訴我：「等古畫換完了，我煙也戒了。」

我倒是記得祖母戒煙。那一陣，她吃一種黑色的藥丸，葡萄乾般的大小，每次吃一大把，好像就靠這種藥，沒聽祖母受什麼折磨，很輕易地就把煙癮戒了。如今回想，那藥應該流傳下來，對有毒癮的人來說，會是一大福音。

祖母批評自己說：「我眞是個家敗！」

現在我是早已知道，只要我保存其中任何一軸畫，留下那小簸籮裡的任何幾樣玉飾，都可以發筆小財或大財，並且可以向別人大爲炫耀了。當然，這也不是要追悔的事。古老的中國，幾乎可以說，地上掃掃，地下挖挖，都是骨董，卻都當垃圾一般的棄置不顧。家中那些，只不過是記錄著祖父當年隨手收購時，傳奇式的幸運，卻又難逃另一形式的隨手丟棄而已。

「家敗」的又豈僅是這些?!

父母住的那第四層的東廂房，堂屋裡，有個「臥櫃」。「臥櫃」是橫式的，有別於正房那「頂天立地」的「立櫃」。這「臥櫃」，有現在冷飲店的冷凍櫃兩個併排那麼長，高度也差不多，形狀質料和「炕箱」沒什麼區別。平時用一把大銅鎖鎖著。那時，父親已經到塘沽「久大精鹽工廠」去工作，把母親和我也接去住「土坯房」。草萊初闢的塘沽，極其簡陋的「土坯房」，和老家的氣派當然是天壤之別，但父親立志擺脫老家，走向工業，也就自然而然地擺脫了那些價值連城的骨董。我不太知道當時父親的心情；只記得我偶然隨父母回老家，進了東廂房，找到自己小時候最喜歡坐的那張小小的籐圈椅，就等著父母打開那「臥櫃」，我好踩在椅子上探頭往「臥櫃」裡看那琳瑯滿目的瓷器了。

當然，以我那時的興趣，大概是顏色豐富的清朝瓷最能吸引我。宋瓷在我看來就太「平凡」了。其實，當時我根本也不知道它們都是什麼瓷，只知道父親有時挑來選去，挑出一件花色繁多的大瓷盤，帶回塘沽那簡陋低矮的土坯房，把它架在烏木架上擺著。我的疑問是：「這盤子爲什麼不拿來盛菜？」

那只宋朝的蟹爪紋豆青瓷盤更可憐！我問父親：「這盤子都裂了，爲什麼還不扔掉？」

父親也從來不向我們解釋。

了悟到那「還不扔掉！」的瓷盤是宋朝汝窯的古物，是我看了無數次故宮的展覽，讀了左一

篇、右一篇的關於宋瓷的解說，才逐漸在一種慚愧的心情中，肯定了它是不該「扔掉」的，但是，肯定不肯定早已無濟於事，只能對自己這代表著中國人之一的無知，慚愧感慨不已了。

宋瓷不知流落何方，不能只怪人家「文革」。我們自己的「文革」也是非同小可。打倒傳統，全盤西化，是我們和上一代，以至於下一代，上下三代的「光榮」。具體的「打倒」也就表現在自己對本身文化傳統的不屑一顧，表示反傳統與親西方。在那爲了救國而「全盤西化」的崇洋年代，一味盲從的社會大衆，可能眞是越無知就越有理了。

那年頭，「革命」也是「無罪」；「造反」也是「有理」。「革命」有明「革」，有暗「革」；「造反」有明「反」，有暗「反」。我們對自己文化的無知，是屬於「暗反」。當年小時候，只差沒打出了「紅衛兵」的旗號，而所做所爲，有不少就是「紅衛兵」的「先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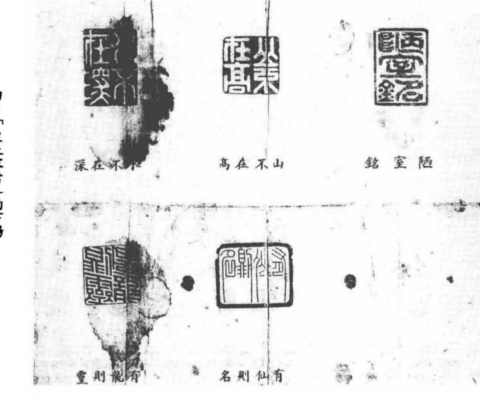
把眞蹟古畫摘下來，換上西洋油畫的，把祖宗牌位扔出去，響應西方宗教表示不崇拜偶像的，也都是當時「全盤西化」的同志。

話說，祖父在門口買到的那些古物，落在我和弟弟妹妹手中當玩具亂整的，還有兩盒可能是乾隆珍藏的墨。那些古錢狀的墨，放在兩只四開大的錦盒裡，那錦盒，黃緞襯裡，十分考究。我們偷偷拿來研墨習字，覺得它們並不如「十萬斤油」或「天然如意」來得好用，而完全不知道古時的名墨，曾經充爲地方賦稅，並且是朝廷中的珍藏。當時有一位鄉下親戚來訪，他的孩子頭上長瘡，看見古墨，就說，「這墨可以用來塗在患處，『化疙疸』，比任何藥物都有效」，於是拿

去做藥用，塗得那孩子太陽穴上一大片黑。也不知後來好了沒有，那墨也就零零散散，最後才被父親發現，大為痛惜，把我們罵了一頓，收拾了「殘局」。卻始終沒告訴我們那墨有什麼可惜。

除此之外，使我不敢追問的還有我最喜愛的兩盒印石。那各種形狀的印石頂上各有鏤刻精緻的印紐。印石上所刻的是〈陋室銘〉全文。每一句佔一枚印石。各種不同的字體，有陰文、有陽文。另附一張紙把刻好的文句印在上面，加上楷書注明。至今我是只存下了那張紙，而且缺少了末尾一句「何陋之有」。相信它一定還有說明或題款，可惜都已不見了。那兩盒印石也許曾在父親手中保存很久，但七七事變之後的幾次播遷，以及後來的文革，父親最後在供職三十多年的工廠人事傾軋之下，倉皇狼狽逃往北京，避居王府井附近的一條陋巷，當然一切也就都四散無踪了。

寫在《綠色小屋》裡的那只水晶硯水盂和它所附屬的那紅珊瑚柄的小銀匙，上面刻著一尾細緻的金魚，也是祖父的「巧遇」得來的「皇上的家當」。至於說，那些碑拓，左一張，右一張，父親拿出來欣賞的時候，被讀小學六年級的我看中了其中的一疊「魏碑」，趁著暑假，臨了起來。進入初一之後，那魏碑跟著我住進了河北女師，國文郭老師也許記得，當她第一天給我們上課，問班上同學，「你們都臨什麼字帖？」在同學紛紛答以「柳公權」「顏魯公」「趙孟頫」的時候，獨有我這來自外縣市的小女生舉手回答：「我寫魏碑」。由老師當時的表情看來，我覺得她是被我嚇了一跳。



這一組刻印的「陋室銘」，每句一方，大小字體各不相同，非常精緻。陰文陽文間用，字體典雅考究，連下附的正體字書法也非凡品。其中「有仙則名」，「有龍則靈」，「草色入簾青」各句，本身字體就是極上乘的藝術。「閱金經」一句更是用重疊的刻法，絕非一般篆刻家所可做到。

「陋室銘」全文應為十八方，加上篇名為十九方。另外可能有名款之類，共二十方，分裝兩匣。印匣也十分考究，下方是木托藍絨襯墊，各印都有固定的位置，上有玻璃罩。

當年十幾歲的我，不知為什麼，把這三張印文據為己有，帶著它到處搬遷，並且飄洋過海，把它攜來台灣。原印石則不知流落何方了。

《故宮文物月刊》第十二卷第六期（138號）有專文談清代皇帝閑章。看了之後，更覺得這組「陋室銘」來歷不凡。

祖父最先買到的那兩只西洋掛鐘，其中之一，一直跟隨著父親。另一只掛在祖母房間裡。老家的人們是在變亂之中流離各處，房子也在地震中全毀。古物當然更是不知下落。四十年兩岸隔絕，到能夠返鄉的時候，無法探到全部的「親」。只聽說六嬸在父親避難北京的時候，為怕那些從宮裡流散出來的各種線裝古書給他們帶來罪名，把它們一綑一綑地用來燒火煮飯，燒了好幾天，才算使心上一塊石頭落地，解除了危機感。又聽說，父親在北京的「難民居」大雜院委屈避禍的時候，手邊還有一只明朝青花大瓷罐，為怕被紅衛兵砸爛，只得擺在屋外門旁做垃圾桶，任它風吹日晒雨淋，現在也不知下落了。

至於說那「傳家之寶」掛鐘，經過文革浩劫，父親是絕對不敢持有的了。它流落何方了呢？被「紅衛兵」砸爛了嗎？清末義和團惹來八國聯軍，搶了故宮寶物，倒還有像我祖父這樣的民間公子哥兒去收購保存，文革的日子，誰敢喜歡「藝術品」？大家爭著去做文化和實質上的一級貧戶都來不及呢！

附記：

為求了解文中所提到的幾件物品，曾查了一些資料，有以下幾項線索，可供參考。

一、關於祖父買到的掛鐘，據說最早是在明朝萬曆年間，由利馬竇帶進中國。後來荷蘭人屢次要求進貢與通商，是在清朝。二、關於墨，《故宮月刊》第四十五期有詳細研究報告。第九十二期談〈乾隆墨雲室的墨〉極有參考價值。三、關於戒煙藥，據民國四年《大公報》載：「戒煙新藥為浙

江戒煙局長，日本藥學士，徐錫驥所研製，絕不摻用煙土嗎啡。七天斷癮。曾設戒煙所於上海浙江路。成效甚著，後在天津分售，每包售價二角。

五、羅漢會與赤兔馬

祖父是蘆台鎮上一位很特別的社交人物，因爲他不只結交上流社會的仕紳，也結交更多下層社會的販夫走卒，所謂「車、船、店、腳、牙」各行；尤其是「扛夫」、「腳行」（相當今天的搬運工人）；以及跑行商的人們，「牙行」（相當今天的「仲介業」）。至於他喜歡結交這些人的原因，主要是他自己手頭有錢，喜歡這些粗豪的人們在他面前一呼百諾，並且和這些人交換他自己所無的生活經驗。又因爲結交了這些人而成立了蘆台有名的「羅漢會」，使他成爲鎮上的風雲人物。極能滿足祖父那喜歡玩樂，愛出鋒頭的性格。

這「羅漢會」，在每年元宵節的時候表演，非常引人注意，所謂「羅漢」，是指僧人中修行得道的。寺廟裡常有這些羅漢的塑像。每位羅漢個性不同；表情與姿態也各式各樣。「羅漢會」是集合了衆多會表演而且有力氣的人，扮成羅漢的模樣，穿上戲服，莊嚴肅穆，神態逼眞。排成行列，一層一層，踩著肩頭疊上去，要疊到七、八層高。最頂上是一個小孩，叫作「羅漢尖」。這羅漢的疊起來之後，還要表演許多花樣，給人以橫空矗立卻穩如泰山的美感，十分令人激賞。這羅漢的

數目，至少要有七八十尊之多。扮演羅漢的人，必須足夠健壯，而且要訓練有素，才能勝任。而他們的來源就正是我祖父——靳家五爺所結交的那些水陸碼頭上裝卸貨物或爲其他行業「賣力氣」的工人。

疊羅漢有許多花樣。有「單挑」、「單象」、「雙象」、「粘糖人」、「寒鴨戲水」、「三座門」、「大花籃」等等。有的以高聳取勝；有的是在疊起之後，還可以做三百六十度「轉體迴環」的動作。

每年選「羅漢尖」也是大衆注目的焦點。這個高高在上的小孩，又須聰明伶俐，膽子夠大，會做「手搖拂塵」、「童子拜觀音」等等動作，然後可以逐層下來，穩穩地降落，才算成功。

羅漢會不僅需要經過嚴格訓練的「人」；也需要精彩的樂隊文武場。由「打鼓佬」領導，吹吹打打，十分熱鬧又壯觀。當然，更需要的是錢。

蘆台有東、西兩個羅漢會。每年互比苗頭，看誰聲勢大，表演好。祖父手下的「東羅漢」一直是更受歡迎的一支隊伍，勝過「西羅漢」。「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養」一個「羅漢會」的費用十分浩大。這些成員（包括樂隊），日常除各有各的工作之外，還從祖父這邊領取生活費。所有那些表演用的戲服、道具、樂器等項，全由祖父購置。平時東西就存在家中東跨院敞房的兩個大木櫃裡，過年出會的時候才拿出來用。爲了與「西羅漢」別苗頭，分勝負，在這些戲服上也是要大手筆去花錢的。

每年的「羅漢會」首先要到蘆台名寺「東大寺」去向寺裡供奉的十八尊金身羅漢頂禮膜拜之後，才可以起會。另一不可少的項目，就是要到我們家門前來走個全場。

當然，開的賞錢也爲數可觀，就更不用提那長年「養會」所花的費用了。那時家中儘管庫房日益空虛，這排場卻一直維持到祖父去世。

祖父的創造力來自他天賦的浪漫性格，再加上他那不顧一切的掙脫力，家中人們對他的批評是：「驕傲放縱，有己無人」。這固然和他排行最幼，備受長輩寵慣有關，但最主要的還是他那不羈的天性。

愛馬，也是祖父這不羈的性格寫照。

在祖父所養過的馬匹之中，特別有名而爲蘆台鄉里所津津樂道的是一匹「紅馬」。這匹「紅馬」有專人照料，十分的「養尊處優」。平常絕不用它拉車或供人乘坐，而只在每年正月「關公出巡」的時候，才恭請它出來，代表關公的「赤兔馬」。

據說，每年出巡的關公塑像，被隆重地抬出來，有人爲他牽著「聚泰號斗店」（舊時稱「糧棧」爲「斗店」）養的棗紅馬，另有兩人扛著一口大刀（關公使用的青龍偃月刀），在蘆台鎮巡視一周。人們對這關帝塑像敬畏有加，認爲只有「聚泰號」所養的這匹「赤兔馬」才配得上那「忠義千秋」的關公。「聚泰號」也就更加對自己所養的這匹馬加意照料，不敢掉以輕心。每年到了「出巡」的時候，排出陣容整齊的樂隊，吹吹打打，那堂皇威儀，吸引來全鎮以及外縣市的

無數觀衆，用虔敬的心情前來瞻仰。

如此年復一年，「赤兔馬」享受最好的餵養，卻是不必工作，只有馬僮負責按時蹓馬。所以養得肥壯無比。

這一年，元宵節已到，關公又要出巡了。全鎮都很興奮。民間一向非常崇敬關公，認爲他老人家忠義雙全，是最高品德的典範，不但武功傑出，而且學養深厚，加以各類戲劇對關公的形象加意塑造，關帝廟裡的關公更是威嚴堂正，令人對他崇服膜拜。因此這每年元月的「關公出巡」就更是人們對關公表示敬畏與愛戴的最正式的時機。到了這一天，眞正是萬人空巷，扶老攜幼，專程到街上來瞻仰關公的威儀。而「聚泰號」所提供的「赤兔馬」，更是鎮上人們羡慕與讚美的對象，普通一般人家焉能有這麼好、這麼不凡的馬呢？

於是，在吹吹打打聲中，關公的塑像由八人大轎抬著，堂皇莊嚴的出現了，兩旁靜觀的人們莫不屏氣凝神，肅然侍立，旁邊由馬僮牽著的赤兔馬，也亦步亦趨，另一邊是兩人扛著沉重的青龍偃月刀，步伐威武的走過來了。關公的不凡與不朽，是何等地令人景仰而激動啊！

大人們牽著或抱著他們的孩子，小聲告訴他們：「你看！你看！那是關公關老爺！那是他的大馬，赤兔馬！你看，那馬的顏色是棗紅色的呢！所以才叫赤兔哪！跑起來是最快的啦！……」

說著，隊伍走到街的盡頭，再過去就是野外了。平常，隊伍巡完了三條街，到了這裡就是回頭結束遊行的時候了，正在大家等著還可以在他們回程的途中，再仔細瞻仰一下的時候，卻冷不

防只見那匹「赤兔馬」一下子掙脫了馬僮牽著的絲韁，騰起四蹄，仰頭一聲長嘶，「撲喇喇」，捨開了大道，朝著曠野飛奔而去，一時把馬僮和所有的人都嚇呆了！追呀！但是，誰有那麼快的腳程？眼見那英姿勃發的「赤兔馬」仰首嘶鳴著，絕塵而去，從此不見踪影。

它到底到那裡去了呢？

它投奔了那一處山林呢？它是不是投奔了山林呢？還是如鎮上人們所說的「瘋了」或「成仙」了呢？

觀衆們在錯愕之中，議論紛紛，「聚泰號」就這樣失去了「赤兔馬」。再也沒人知道這匹馬的下落。

從此，鎮上留下了一句歇後語——「聚泰家的馬，肥瘋了！」這歇後語表達了人們對這匹養尊處優的「神駒」的觀感。他們一方面對它充滿艷羨；一方面好像也表示了一種批評。大家以爲這匹馬是「瘋了」，而且是由於吃得太好、太過養尊處優才瘋的。

有了這句歇後語以後，凡有人飽食終日，過分享福，因而做出荒誕不經的軌外行動時，大家就說他是「聚泰家的馬，肥瘋了。」

其實，依我現在的想法，那匹良駒，被圈養在人間宅院裡，長年侷促一隅，不知何等地嚮往野外那可以自由奔馳的天地。可能它早已在心中籌謀好幾年了，才在這年突然決定「投奔自由」，不再做人間的玩物。想像那匹馬，毅然甩脫約束，抖起鬃毛，騰躍飛奔而去的鏡頭，眞是

爲它心動不已。那一刻，對一匹好馬來說，是多麼壯麗的一刻啊！

赤兔馬走了，關老爺也從此不再出巡，靳家五爺也就在次年生病去世了，享年大約四十一歲。

算來那年清廷已被推翻，民國剛剛成立。說不定一股自由不羈之風，也吹到了這匹好馬的心中了吧。

五爺——我的祖父，給靳鄉善堂——聚泰號斗店帶來不少傳奇式的榮耀；也帶來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的先兆。他在無意之間，爲家中買進了價值連城的許多骨董；但和他的揮霍玩樂也正被認爲是功過相抵。他帶進家中的寶物應該是吃穿不盡的財富，但「聚泰號」在他去世之後，所過的卻是窮愁不已的困窘生活。

祖父去世時，只有四十一歲，而他那電光火石般的生命力的任性發揮，卻眞是使我這做孫女的非常神往。

六、白馬傳奇

「馬」是自由的象徵，也是歷史上忠義或武功高強的人所不可缺少的輔佐。宋高宗，泥馬渡康王的故事，是馬的神格化之中，最有名的範例。古來名將多輔以名馬；打仗時，馬是重要的戰友，所以有「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戰場名言。可見馬之於人，有多麼重要。

名人騎名馬，相得益彰。造物者似乎特別嘉惠某些顯赫人物。老家靳嚮善堂，養馬選擇了可以充任最受人崇敬的關公坐騎的「紅馬」，以現代觀念來說，確實是「打知名度」的絕妙的一招。自從有了「聚泰家的馬，肥瘋了」，投奔曠野的這一轟動事件，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就更刻意地來搜羅「聚泰家」馬匹的傳奇，於是出現了眞眞假假，繪影繪聲的種種傳聞。

鎭上有人說，「聚泰號」除那匹突圍出走的「赤兔馬」之外，還有過一匹會看家護院的白馬。這匹白馬之所以街談巷議，主要是因爲曾經有一個小偷，久聞「聚泰號」家中饒富貲財，於是動念，乘月黑風高之夜，去偷它一票。

這天，他穿好了夜行衣，來到「聚泰號」東院圍牆外面，試了好久，才攀上那高高的牆頭。

知道「聚泰號」不養狗，不用擔心狗吠。打更的剛剛走過，也不怕立刻再轉頭走回來。但是，當他正想縱身跳下院落的時候，忽見一匹白馬，四蹄飛騰，朝他直奔而來。說時遲，那時快，那白馬前蹄騰空，對準他，用力直踹。嚇得這小偷魂不附體，連跌帶滾，翻下牆頭，沒命地逃走。事後他告訴同行，說有這麼回事。同行笑他，一定是緊張過度，出現幻覺。豈有馬會看家護院的道理？於是，另一個小偷，自告奮勇，要去偷偷看，倒底有沒有這種事。說也奇怪，這另一個小偷同樣也被那匹白馬踹了回來，於是這件奇聞就又傳開了——聚泰號有匹白馬，看家護院，難怪他家不用養狗。

這件事，傳到聚泰號自己家人耳中，大家覺得可笑。難道說，只因爲有過那一匹「肥瘋了」的赤兔馬，就必定會有另一匹馬的傳奇嗎？再怎麼說，不但家中根本沒有一匹馬會看家護院，而且家中雖養有一些拉車或供人乘坐的馬，卻並沒有一匹是「白馬」。

傳言不予置信，反正老家也聽慣了鎮上人們的渲染，所以也不以爲意。倒是當時年輕的曾祖母聽在耳中，心裡有數。這位「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靳家嚮善堂第二代唯一的媳婦，是祖父兄弟五人，姊妹四人的母親。她早就知道家中確有這麼一匹白馬。當時只因爲自己是媳婦的地位，不敢多說少道，只得把自己的疑惑放在心裡，從來不敢透露。

多年之後，「赤兔馬」已經走了，孩子都已長大，她這一門兩不絕的，繼承靳家香煙，生了九個兒女的賢德媳婦，已經六十多歲了，才在某一天的閒談之中，膽敢把這多年前的傳奇，透露

給子孫，讓他們當故事聽。

當年，舊式中國家庭，無論多麼富有，媳婦也仍然要維持「男耕女織」的傳統。她上有兩位婆婆，每位婆婆都爭著要這位媳婦爲她們服務，所要求她織的布也就越來越長。白天忙不過來，只得揀有月光的夜晚，在院子裡的月台上去趕工，才可如期交件。

當夜晚來臨，大家都已入睡，只有她一個年輕婦人，在偌大的宅院裡，月下織布，實在不能不承認是有點害怕。但既然非此不可，也只得壯起膽子，勉強讓自己專心織布，希望盡量趕織一些，明天還要早起忙其他的工作。就這樣，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月明如晝，忽然一匹小白馬出現在她的身旁。秋夜非常寂靜，但她並沒有聽到這匹馬走來的聲音，這匹馬突然無聲無息地出現，當時，可眞把她嚇了一大跳。在驚恐之中，年輕的曾祖母放下織布的梭子，想要起身回房，卻見這匹小白馬一雙眼睛十分溫馴地朝她看著，然後回過頭去，用嘴剔它潔白的鬃毛。那姿勢，十分柔和。她覺得這匹馬很漂亮，那溫和的樣子更是充滿了善意，而使她感到安心。於是，她定下神來，想到，它可能是家裡新來的一匹小馬，夜裡聽到有人織布，順便走來看看，如果自己反而因爲害怕而跑開，豈不也太缺少人情？如果這匹小馬也是由於寂寞或害怕，才走來找她作伴呢？如果這匹小馬也是從別處——它的家鄉——被帶到這陌生的大宅，就像她被娶到這陌生的大家庭一樣，內心充滿著惶恐與不安呢？

善良的曾祖母這樣想著，開始十分同情這匹小馬。就讓自己鎮定下來，繼續織布。那小馬也

就很安詳地站在她的旁邊，眞像是來和她作伴的樣子，使她覺得十分安穩。

曾祖母在多年以後，向家人叙述這件事情的時候，神態怡然而又充滿著感情。她說，在以後的日子裡，只要她夜晚在院中織布，那匹馬就會出現。曾祖母也逐漸習慣了它來作伴。後來，她的兩位婆婆相繼去世，自己的孩子也已長大一些了，她是不必再熬夜去趕工織布了，當然，那匹小馬也就沒再出現。身爲舊式婦女，住在深宅大院，也沒有什麼機會到跨所馬廄去察看這匹小馬的情況。過了很久之後，她才在一次偶然的情形下，向家中的工人問起那匹小馬，想要知道它怎麼會跑到內宅裡來。它們不都是養在箭道外面，在跨所的馬廄裡，而箭道的門到了夜間，不都是要關起來的嗎？

使她大爲意外的是，那些工人異口同聲，都說家中根本沒有白馬。

曾祖母雖然覺得奇怪，卻也不敢再提起這件事，唯恐別人以爲她胡亂講話，有什麼問題呢！

這故事，後來由父親轉述給我們，那已經是嶄新的二十世紀，滿清已被推翻，新文學、新觀念、新教育、新風氣，潮湧而至。舊式的老家，卻依然使子孫們對它充滿著向心力與深厚的感情。我是聽父親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老家的故事，在既好奇又神往的心情中長大的。尤其是在多年之後，發現這些故事不僅是父親樂於講給我們聽；而且它們常常來自當年的鄉親或其他親友之口。這些由四面八方自動傳來的關於老家的故事，使我們在經過了整個大時代的變遷，看遍了多少滄海桑田，變動不居的人間興衰之後，反而日益加深了我們對老家的懷念與探索之情。

曾祖母在一代單傳的情形之下，給靳嚮善堂加入了五男四女，旺盛的人口，形成後來的五代同堂。家境雖然由盛而衰，但在蘆台鎭當時四個有名的大戶豪門之中，嚮善堂卻能支撐下來成爲僅存的一個。嚮善堂的傳奇故事卻也給這家庭的延續塗上了許多快樂而神奇的色彩。它是不拘一格的。卻也是充滿善意的，曾祖母對那匹神秘小白馬的同情心，正是源自她慈愛的母性。

曾祖母八十六歲才去世，所以我見過她，幼時常到她房間去玩，她很疼我，喜歡給我零食吃，還用筷子沾高粱酒給我嘗試。那證明，不但祖父瀟洒不羈，他的母親——我的曾祖母，也是這麼不拘一格的。她使我一直對酒頗有好感。

但在這同時，靳嚮善堂卻也有它極端保守的一面。否則就不會被鎭上人們至今還傳說著它的規矩大到「男不見女，女不見男」了。

這位給靳嚮善堂傳宗接代的最大功臣——曾祖母，勤儉負責又慈祥，年老時只享到榮華與尊敬，未受過日後家道中落之苦，是一位最有福的長輩。在福壽兼修，兒孫滿堂的好景中去世。

七、花園、童年與狐仙

我非常愛蘆台老家那後花園。

小時候，幾乎從我會走路，就最喜歡到後花園去玩。

我喜歡那裡的花草樹木，更喜歡那裡有那麼多的昆蟲，對我來說，那是我一生都不會忘記的神仙世界，尤其是夏天，枝葉那麼繁茂，整個的花園是一片寧靜蓊鬱的綠。穿行在葡萄架和葫蘆架下，幽謐極了；坐在矮矮的石階邊緣上，和花草那麼接近，是最安逸的時刻。注視著那些花草間的昆蟲們悠閒地活動，好像我也是其中之一，和它們一樣的樂享著生命的活躍。

一個人在後花園，靜靜地玩一個早上或一個下午，不需要誰來陪我，不需要任何的遊戲，也不打算纏著誰來給我講故事，後花園的花草與昆蟲就是故事和童話。我可以聽它們用無聲的言語告訴我許多關於它們的生活和它們的經歷，那都是很有趣的。有它們和我作伴，我就擁有了整個的世界。這世界，是如此的活躍，如此的充滿著生機，卻又如此的寧靜。

園子裡，沒有一樣昆蟲是讓你覺得骯髒而必須消滅的；連那大號的蒼蠅都乾淨得一塵不染。

地上的螞蟻那麼有秩序的爬著。它們有黃色的，有黑色的；有很小的，有很大的，很小的螞蟻特別合群，總是排成一長列整齊的隊伍。大黑螞蟻比較喜歡單獨行動，它們的腰好細！好像穿著夜行衣的武俠。

我極熟悉那些昆蟲的姿態與個性。螞蟻總是默默地趕路，蜜蜂輕盈地忙；蝴蝶是嬌生慣養，不事生產的女孩。好像它們的任務就是來給世界增添更多彩色繽紛的美麗。馬蜂是昆蟲世界的流氓。尖頭的紡織娘淺綠淺綠的樣子，眞像個新媳婦。蚱蜢像莽撞憨厚的男孩。螳螂那自命不凡的樣子，像個花花大少。

有時，我也會抓到蟋蟀或另一種長得和它很像，但比較瘦長的黑色小昆蟲，它們不像蟋蟀那麼好勇鬥狠，也不喜歡亂跳，很安分的樣子。無論它們是誰，好像都是不會侵犯人類的。大蜻蜓那好像燈籠一樣的眼睛，似乎也只是爲了它們自己欣賞世界的方便。紅尾巴、藍尾巴的那些特別小號的蜻蜓，飛得好像不是在飛，而是在飄著似的。

它們怎麼會長成那種各不相同的樣子呢？上帝是怎樣構想的呢？祂讓這些昆蟲在花草之間遊戲著，活躍著，仙境呀！你還到那裡去找這樣的仙境呢？

野茉莉是一大群、一大群的長在一進園門的左邊。我只要看到它們，就放心了。每次到後花園，最想看到的就是這些花，它們春、夏、秋三季的開。花色繁多，眞是燦爛！那柔軟又挺秀的花瓣，紅紫繽紛。最特別是它們那特別伸長出來的花蕊，一副對你表示歡迎的樣子，而又那麼秀

麗端莊，我常覺得它們代表著世上所有那些不需人加意照顧而就能開得那麼活潑快樂有自信的野花，鮮活不羈，一點也不固執己見，十分的合群。

眞感謝「嚮善堂」創業的祖先，他們在那好幾層莊嚴的大宅後面，卻規劃出這麼一片花園，不蓋房子，不要亭台樓閣，不要假山水池，而只保持這一大片乾淨的土地，讓它茂葉繁花，與昆蟲們共享天然。幸運的我，投入這世界，眞高興能加入它們，成爲它們之中的一個。

幼小的我，能不需大人陪伴，自己走到後花園去玩，正是我一生喜歡「獨遊」的一個起點吧？我時常這麼想。那經驗眞是很可懷念的。深宅大院的老家，在那麼多長輩善意地「環伺」之下，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開始擺脫他們的，是趁他們忙早上內務的時候嗎？是趁他們午睡的時候嗎？還是只要有任何機會，我都把握住呢？

要從前面的院落到後花園去，必須經過那長長的、寂靜的「箭道」。它在住宅和東跨所之間，從第一層四合院旁邊的月亮門走進這「箭道」之後，你就投入了一頁歷史。它是非常的幽謐又古老，仰頭望，它的西面是各層四合院的屋脊和房山。筆直的磚道引著你往前走，沿路會看見通往每層院落的小小的角門，好像終年也無人使用似的關閉著，留下空空的台階，東面是古意盎然的、高高的磚牆，莊嚴地隔開東跨所那長長的大院，毫無寬假似地「保護」著你。這長長的「箭道」，只有最前面一道小門，通往跨所，那邊有馬廄、有車房、有下人的矮房，和通往大街的、鋪著大石板路的車門。但平常這從內宅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小門也是關著的，因此特別凸顯出

那空空窄窄的石階。「箭道」最盡頭有個正對著我的小小的黑門，推開那小黑門，才是我自己的天地——後花園。

我那小小的身影，在這古老莊嚴的箭道中，寂寞地走過了不知多少遍；也不知那第一次獨自的「探險」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每次，我沿著這約有五尺寬的箭道，從南往北走去，或從北往南走回來，一路上，我是一面走，一面玩的。我喜歡那東牆上的鏤空花飾，它們是一個一個的Ｉ型，高約三寸，寬約兩寸，樣子非常像中式點心裡的「飥果」（飥音ㄊㄨㄜˊ）。這種「飥果」是用雞蛋和麵粉加少許酸粉和糖，烘烤而成，不加任何餡子，酥鬆可口，不甜不膩，簡單中的美味，我最喜歡。而那「箭道」牆上的這些「飥果」圖案也就因此使我對它們特別有好感。幼小的我，可以一路數著隔不遠就有一個的「飥果」，一面自言自語地念著：「飥果，飥果，……」從來也不厭倦似的。

偌大的宅院，全家老幼三十多人。卻是看不見什麼人在活動。祖父輩只剩大爺健在，但那時代的中國人，即使只有四五十歲，也自認是「老了」。他們是受老式教育的「學究」，嚴肅端莊，依禮是要規行矩步，不好動的。至於說叔叔伯伯，除了六叔因為年紀在他們同輩中最小，偶爾陪我玩一會之外，家中沒有一位「老中國人」喜歡陪小孩子「散步」。伯母、嬸母們，以至於祖母輩，都是纏足小腳，沒人願意多走路。所幸我好像生來就喜歡一個人欣賞這世界。那古老的箭道直通後花園，是我的「兒童樂園」，也不知是那環境塑造了日後的我呢，還是我生來就是這

樣地很會自得其樂，或是兩者互為因果，也就不必去深究了。

不過，這後花園，植物的世界，昆蟲的世界，我的世界，除了它那屬於你可以想像的美麗與寧靜之外，也記錄著一件我畢生難忘的奇事。

這「奇事」，我印象非常深刻，不但它本身生動清晰地鐫刻在我的記憶裡，而由於這件事所帶給我的有關「禁忌」二字的力量，也是我自己所無法解釋的。

那年，我四歲。

你不要總想問我，為什麼會把這麼小年紀的事，記得那麼清楚。因為即使連我自己，也都曾一再地問過自己，我的答案仍然是肯定的「我記得」。當然，有些事是長大一些之後，再去加強的，有些或許是長輩告訴我的；但現在要說的這件事，卻是千眞萬確，我自己記得的。因為自它發生之後，我沒敢告訴過任何人。而它是只有我一個人看到的。

那是一個夏天的午後，全宅十分清靜。我照例一個人，經過「箭道」，到後花園去玩。當我輕輕推開那通往後花園的小黑門，正要邁步跨過門檻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矮矮的老頭，他那矮的程度，實在只像個小孩，樣子卻是個老頭。他從花園後門西邊角落上的一間小屋裡走出來，那間小屋是從前給「花匠」住的，後來家道中落，早已沒有花匠，那小屋就一直空著，蛛網塵封，也沒有人去打掃，這時，我看見這位老頭，鬚髮皆白，身穿本色（未曾漂染過的白）土布的老式褲褂，彎著腰，從那小屋出來之後，就沿著花園的後牆往東邊走。他走得很慢，很悠閒無事，但

很專心的樣子，朝東邊角落的花窖走。我很注意地看著他，直到他從花窖那泥土的台階走了下去，我自己大概越想越不對勁，家裡從來沒有這樣一個人。即使有這麼一位長輩，也不會這麼矮，而且也不會在這時候，由那廢置的小屋裡走到花窖去。而以一個小孩子來說，最覺得不對勁的大概是這人居然不理會我。這時，我才忽然害怕起來，大聲問了一句：「誰呀？」沒聽見回答，我就用最響的聲音大哭起來。

這「最響」的聲音，響到什麼程度呢？我在這全宅的最後一層，隔著高高的屋脊與房山，和一個全然空著的第四層四合院，卻給在第三層正房的繼祖母聽見了。她大概是盡可能用跑的最快速度出現在我身邊，把我拉在她的懷裡，問我：「什麼事？什麼事？」

我驚魂未定地把剛才看到陌生老頭的事告訴祖母。祖母聽了，連忙制止我道：

「別說！別說！那是狐仙！」

眞有狐仙嗎？別說四歲的我不知道；即連現在，我也不敢說世上眞的有或沒有。這件事，只是由於當時所看到的是那麼眞切，祖母的警告又是那麼嚴肅，我不但連問都不敢問，而且就被祖母這一句警告而居然一輩子都對這件事守口如瓶，可見當時情景的具體逼眞與震撼。

我之謹遵祖母的警告，最重要的原因是從祖母當時的神情與語氣，讓我感覺到，恐怕說了之後，會對老家有所不利吧？

直到一九七幾年，我早已來到海峽這一邊，成家立業，兒女都已長大成人，和老家也久已不

通音訊，我才在一次閒談中，「破戒」和外子談起了這件事，雖然在談的時候，心中還是有點懸慮，但是，一方面覺得這禁忌實在很荒謬；一方面也覺得事隔半世紀以上，而且在空間上隔了一個台灣海峽，還有什麼可禁忌的?當然可以把它當故事說給家人聽聽了。

不過，如果一定要附會的話，唐山大地震，把我那一生都念念不忘的老家，震成了一片瓦礫，可也就是那段時間的事呢!

那老家，是眞的只剩了一片荒涼的空地，現在是當地一個公家機關，在那空地上蓋了一間臨時房屋辦公。後面薊運河白白亮亮，寂寞又無奈地，千古不變似的，潺潺地流著。

這已經是一九九二年了。

爲了給這世界多保存一份彩色，我是「寧肯信其有」的，因爲它太値得想像了。

八、五大仙

有了狐仙，我並沒有繼續害怕。也許是因爲知道了那是一個「仙」，而覺得不必害怕；也許因爲我太愛那後花園了，超越了那不該有的「怕」。我還是照常一個人去後花園玩。

倒是對那隔開後花園與內宅院落的第四層的大正房，充滿了不可言狀的神秘感，使我越是長大，越是對它增加了「怕」的成分。

「那麼高聳入雲的大正房，爲什麼沒有門窗？」如果勉強要去接近它，就會在那原本是門，而卻忽然以「牆」的姿態出現的樣子，嚇得不敢動彈。我不敢登上它的台階，對那莊嚴的月台，也敬謝不敏，盡量不到那上面去玩。

「四層」，在老家長輩們的口中也似乎是一種「禁忌」，不提那「四層」便罷，提起來，神秘兮兮。

有人說，四爺的一位小姨太太，在那裡服毒自殺，因爲是自殺的，所以依照禮俗，「小四奶奶」的遺體始終不准進老家的墳地—四爺的墳墓裡，只有「三」個人，四爺，他的大太太，和他

的大姨太太。

「小四奶奶」是怎麼服毒的？不知道，她和另一位小四奶奶，一位是回民，一位是從妓院領回來的。「服毒」當然是很可怕的，屬於「橫死」，所以在大家心中，那「四層」會鬧鬼。而這四層也確實十分奇特，在前院看，它門窗都砌著磚，已經很恐怖了，走到後花園去仰頭回望，它的後牆也沒有門窗，而且整個就是一面高牆，似乎在蓋的時候，就沒準備給它留下出路。由於連月台和台階一概從缺，所以整個一面高牆，像城牆一般的森然聳立，高與天齊，使人不敢仰視。那兩棵桑樹就一左一右的在它背後越長越高，荒涼的感覺和整個後花園的繁茂花木很不相稱。

我慶幸自己是在長大之後，才逐漸注意聽老家人談這神秘的「四層」，很小的時候，只注意花園地上的花草和昆蟲，它們那生命力絲毫不曾被空寂的「四層」所掩蓋，反而格外茂盛，但自從聽多了「四層」這兩個字之後，對它的神秘感就與日俱增了。

首先，我的疑問是：「狐仙」是住在花窖，還是住在「四層」，還是兩邊都住呢？家裡傳說，當年蓋這大宅的時候，蘆台是非常荒涼的，大宅的後院臨著薊運河，蓋房時，只留了可容一人通行的空間，但由於潮打對岸，百年以來，這邊的地自然增長為又可加蓋一層四合院的空間。由於離河岸很近，還是難免滋養了許多動物。舊時民間所稱的「五大仙」更是把這巨宅視為它們原有的「產權」。所謂「五大仙」，包括狐（狐狸）、黃（黃鼠狼）、白（刺蝟，俗稱為白大爺）、柳（蛇）、灰（老鼠），這五大仙住在這巨宅裡，毫不見外。據長輩們說，當初在蓋這

「四層」打地基的時候，有一次，那「夯」（音ㄏㄤ，舊時打地基用的工具）抬起來，卻懸在半空中，落不下去。工人覺得奇怪，仔細審視那地面的結果，發現原來那地上有個蛇洞，裡面有兩條小蛇，全身瑩白，瑟縮地躲在那裡，十分可憐。工人迷信，認爲這是「大仙爺」把「夯」托住了，來保護它們自己，爲了不忍傷害也不敢故意傷害這些「原住戶」，建築者就在先已蓋好的東廂房的牆上，鑿了五個精緻的洞口，意思是請五大仙住這邊，這邊有更好的環境和出入口。等於給了它們合理的補償，使它們不必再「穴居野處」。而這鑿有五個精緻洞口的東廂房，後來就是由我的父母和我住（我是在這東廂房出生的）。

而究竟那「五大仙」之中，是不是有一「仙」修成了正果，而變成我在後花園看到的那位老翁，可就無法求證了。

只是由於這份神秘感，也由於祖母對我的那次嚴正警告，使我眞的是銘記在心，未敢向別人透露。下意識也許眞的在希望那老頭是「修成正果」的一仙呢！

至於說其他的各「仙」，或許一直都在各安生理。地震之後，房倒屋塌，也更能隨它們自己的意願回返自然了吧？

不得而知。

但那巍峨而可怕的「四層」裡，究竟有些什麼呢？

從前，無人能道其詳。

除了傳說中的鬼狐之外，有人說，裡面堆滿了木材，是當初爲了再把後花園加蓋成第五層房屋而囤積的上好木料，後來由於家道中落，無力興建，那些木材也就一直沒有動用。

我猜想，說不定這是因爲花園中更有許多可愛的「原住戶」，用無形的力量阻止了人類無止境的擴張，使那第五層四合院終於沒有建成。

不過，在又過了若干年之後，家中人們早已遷離了那大宅，分散各處，自力謀生去了，大地震之後，偌大的宅第更是全部震垮，再也看不到它的蹤影。這時，忽然有些秘密可以公開了。

堂弟祖武說，老房子有「狐仙」，和大爺很熟稔、有時從閣樓上出來喝水。大爺經常用臉盆盛滿清水給它們喝。其實，它們仍然是「狐狸」原形，像小狗那麼大，不怕人。不知道它們會不會有時候以「仙」的姿態出現，但喝水的時候只是普通的「狐」而不是「仙」。

至於「四層」裡鬧不鬧鬼，無人證實。倒是後來有另一位堂弟說：裡面放的是整堂的楠木家具，不但包括它本身原有的，還加上了自前院一、二層正房與廳房搬過來的，因爲民國初年，軍閥彼此打仗，你來我往，蘆台是必經之地，經常選中「嚮善堂」這棟大宅做爲駐兵的地方。起先是爲了保護那些家具和陳設，把它們一古腦兒都搬到了「四層」。後來索性把一、二層都租給了別人，以免每次都被駐兵糟蹋。其中一層是租給了襪子工廠，把堂皇的正門也用磚砌死，讓租戶走旁邊另開的一道小門。而家中老幼則改走內宅的角門，過「箭道」經東跨院走車門。後來就連車門也嫌太堂皇，爲免惹人注意，把它也改成了小小的便門，實在難看極了。但中國人的命運也

就是如此，逃過了外患，逃不了「內憂」。

原來「四層」變成了老家那些值錢物件的大保險庫，既不鬧鬼，也沒有仙。

至於說，有沒有後續的「新聞」呢？

有一件。

另一位堂弟說，某次家中實在太窮了，兵荒馬亂，無以為生。不得已，他的父親抽開了「四層」的一塊「活磚」（原來還是有秘密通道的哩！）從這通道進去，取出一支高可三尺的錫蠟扦，上面雕有「仙鶴啣花」圖案，甚是名貴，把它拿出去換了一些錢來度日。

那麼，除了這錫蠟扦之外呢？

堂弟說，裡面有各種家具，和許多青花瓷器。其中一個瓷蓋罐裡，還放著榛子，不知是那位奶奶、姨奶奶，或客人吃剩下的（聽來頗像電影「末代皇帝」裡的情節）。

你要問，還有什麼？

這兩位堂弟，當年的青少年，卻是不能再道其詳。至於說我呢？當然是更加的不知道了。

到地震的廢墟中去刨刨看吧！

九、點秋江，白鷺沙鷗

蘆花江上利源多，兩岸人家盡笠簑。
一片榔鳴雲外響，幾回漁唱水涯過。
波涵遠浦紋如織，網晒斜陽密似羅。
小艇乘潮隨上下，前溪又起明月歌。

——寧河十景之一，江口漁歌（選自〈寧河縣志〉）

河，是人類的母親，它擁抱你，環繞你，養育你，載送你，給你帶來風景與詩情；滿足你的現實與夢想。

薊運河，尤其如此。

它是一條溫柔秀麗的河，它使兩岸的人們過得十分天然，怡悅又富足。

蘆台，在劃歸天津之前屬於河北省寧河縣。寧河是多水的地方。有水而無山，所以平野遼

闊，水道縱橫。河流迴繞，所經之處，有的地方稱爲「淀」；有的地方叫作「沽」。這裡人們所謂的「大川」，其實就是大海。海的正南方九十里，是北塘海口，西南三十里與天津大沽口連界，東南八十里，有六個沿海的村莊。

老家後門外的河叫薊運河，也叫「潮河」，又名「白龍港」。其實就是古時的「鮑邱水」、「合洵河」。它與「沽河」匯合而成的「白龍港」，南面的一支，流經寧河縣境，經蘆台流入北塘口入海。

這一帶，眞是「水鄉澤國」。北方少有的明媚。有四個「淀」，二十一個「沽」。「塘沽」是其中之一。原名「塘兒沽」，是我隨父母遷往該處，而在那裡安身立命的地方。那裡的「久大精鹽工廠」，後來全國知名。父親在該廠初闢草萊的時候，就成爲出力拓荒的一員。

我的生母李蘭蒸是「淮漁淀」人。「淮漁淀」是寧河四「淀」之一。繼母孟慧斌是「鯉頭沽」人。「鯉頭沽」是寧河二十一沽之一。

蘆台是京東的大鎭。人口繁密，商賈雲集。可以說是五方雜處。更有許多回教人口。由於距離北京很近，民衆也自稱這裡是在「天子腳下」，不但做官的人多，文風尤其昌盛。幾乎家家戶戶，以讀書爲榮。各住戶大門上的對聯，文詞典雅，書法精良，可讀性非常高。對聯的內容，鼓吹發財的很少，一般即使是經商致富的人家，大門對聯也是寫「爲善最樂，讀書便佳」，或「詩書繼世，忠厚傳家」。較具水準的商人，門聯上常借重古代名人的發財致富的先例，標榜自己是

不同流俗的「儒商」。

「陶朱事業，端木生涯」的聯語最普遍。藉陶朱公范蠡，和孔子門徒端木賜來表示他們不只是爲賺錢而經商，他們有更高的層次，所做的是與陶朱公和端木賜可以相提並論的「事業」。

蘆台，這北方的漁米之鄉。它的魚，靠薊運河供應；米，靠薊運河灌溉，交通與運輸，靠薊運河提供舟楫之利，四季美景也由薊運河來勾勒渲染。

薊運河所提供的世界，寧靜極了，難怪縣名叫「寧河縣」。它提供你最具體的道家情調——「天與一輪釣線，領煙波千億」在我心中是很具體的。

小時候，不知道它叫薊運河，只知道它是一條河。從我家後門外，蜿蜒地流過，遠處有長著蘆葦的港汊，對面是伸向遠天的田野。

長大之後，知道它叫薊運河，也叫「潮河」。因爲它是海水潮汐往來之處，這條河，從此轉西，款款地流過來，經過我家後門外，再悠悠地轉彎向東流去，曲折委婉，迴迴轉轉，中流河身很深，從來無須挑挖疏濬。兩岸如逢雨季積水，也大多流入河中，不致氾濫成災。

因爲我家後門就在河畔，挑水灌園十分便利。也給了我這本來不被允許走出大門的小女孩許多機會，可以趁著長工挑水的時候，央求他私下准許我在河岸邊的樹樁上坐坐，看看外面這如同圖畫一般的世界。也因此使我與這條河的感情十分深厚。到日後懂得欣賞國畫的時候，覺得畫中那河上的漁舟和漁舟上的漁翁，以及煙波浩渺的河水，和我幼時所見的薊運河一般無二，而且成

爲我逐漸進入道家思想世界之後的許多自動加入的「插圖」，使我覺得我國的道家思想是那樣的親切活潑又眞實，一點也不深奧或陌生。

不僅是我深愛這條美麗的河，父親那一代，更是這條河的知音。父親有時和我談起他少年時，和朋友們一起到河上泛舟的雅事，大家帶著酒菜和樂器，夏天的清風，秋天的明月，都由於這條河，而增加了詩情畫意，使我十分羨慕。雖然我從來沒有機會到薊運河上去泛舟賞月，卻在日後讀到國文課本上的〈赤壁賦〉時，完全把其中名句，融入了我對泛舟薊運河的想像。而且我相信，父親和他的朋友們也都正如蘇東坡在文中所寫的一樣，樂享那「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的情景。

那時代的男性擁有較多的自由，可以月夜泛舟，在小舟上和好友一起吟風弄月，飲酒吹簫，玩到「東方之既白」，盡情體會那「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情景交融。

父親非常喜歡朋友，更因爲他既會拉琴，又會吹簫，更擅長飲酒賦詩，所交的朋友都是同道之友。和他一起泛舟的朋友之中，有幾位是結拜兄弟。誠摯的友情一定也都記錄在薊運河的詩情畫意裡。

而我對這條美麗河流的感情卻完全是超乎現實生活之上的。小時候，接近它，凝望它，欣賞它的時候，我還不懂什麼叫「欣賞」，我只是喜歡看它，覺得它眞像母親一般的秀麗又溫柔。

當我走入社會，開始有意識地逐篇欣賞元曲，而又煩請書法家把白樸那首〈沉醉東風〉用瀟灑的行書寫下來，掛在我書房裡的時候，我覺得那詩句就正是我遠離了多年的、記錄著我童年的薊運河，而且，它隨著我年齡的增長，而突然顯現出它的道家情調——那麼天然。

黃蘆岸白蘋渡口
綠楊堤紅蓼灘頭
雖無刎頸交
卻有忘機友
點秋江，白鷺沙鷗
傲殺人間萬戶侯
不識字，煙波釣叟。

和篇首所引用的那〈江口漁歌〉，隔著六百多年。如果再上溯到漢唐時代，更遠追到〈擊壤歌〉，中國人的想法，卻是始終一貫的崇尚自然，歌頌無爲而治，不鼓勵追求金錢與勢利。這想法，影響了中國幾千年，使中國人成爲最愛好自由的民族。中國人幾乎每看到〈擊壤歌〉就會心嚮往之，油然而生一種安恬詩意的美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多麼自由的人生境界！

蘆台老家傍著「薊運河」。

塘沽，父親立業的地方，提供人們種種便利的是「沽河」。

天津，我成長的地方，更是縱縱橫橫，貫穿市區有五條河。

這些河流，在它們所提供給人們的種種生活上的便利之外，最重要的是把古往今來的許多文人畫家筆下的詩情畫意具體起來。

「漁翁樂陶然……酒醉後歌一曲，明月正滿川，……」是當時每個中國孩子會唱的一首歌；也是他們心中的一幅畫。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涯，旁水彎，輕舟來往無牽絆。……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鄭板橋的〈道情〉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首學校歌；也是永不過時的一幅畫。

河流伴隨著詩與畫，使我們的人生境界不被現實所局限，能夠超詣又逍遙。經商致富的人們，也仍有機會從「沙鷗點點晴波遠」的大自然美景中，體會到「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叟」，純樸自然的人生境界。使奔走競逐的人生很容易得到平衡。

在古老的歲月裡，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會在必要時提醒自己，「如果發財致富，生活無憂，我就可以歸返田園去安享平淡的生活了。」或「即使經商失敗，即使仕途蹇舛，又有什麼關係呢？大自然提供一切，我們隨時可以回返自然，做個漁父或老農。」

精神上，後退有路，首先要感謝的大概就是這些河流了吧？

十、危機與轉機

前文說過，在家中所有的人都是我的長輩的情形之下，只有六叔年紀比較小一點。六叔和父親同父異母，是繼祖母所生，鬻善堂自高祖父在蘆台創業，五代同堂，沒有分家，堂房兄弟不分彼此，大排行，父親行二。大伯父、三叔、四叔、五叔，都是大爺房裡的。六叔雖和父親是親兄弟，卻隔著三個堂兄，排行最末。

這也就是說，祖父輩雖然兄弟五人，但只有長房和五爺這房有後。二爺早逝，沒有成家，父親過繼給三爺；四叔過繼給四爺，祖父輩五兄弟只有四「枝」。父親雖然過繼給三爺，但實際上也只是名義而已。父親不但在感情上仍然認同自己的生父母，實際上，三爺也很早就已過世，所謂「過繼」，無非是依禮各房都要有人繼承香煙而已。老式大戶人家，在倫理上，幾乎都避免談到「分家」，「五代同堂」是大家和睦的象徵。「分家」是表示吵翻了，才打算各奔前程。在傳統上，那多多少少是不如「五代同堂」來得光榮的。

靳鬻善堂不但家大業大，而且絕對要給外人團結一心的印象。教育子弟也以此爲守則。講的

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切儒家的規矩都嚴格遵守。對待長輩，有一定的禮貌。兄弟之間也堅守「長幼有序」的古訓。就我記憶所及，幾位叔叔都已四、五十歲，日常見到我父親，也絕對要起立相迎。父親對他們有事情交代的時候，他們也一定是垂手侍立，聽完才敢就座。他們彼此之間也是一樣。一切自然而然。家中男性與婦女也都保持傳統禮貌。長輩與平輩之間，應對進退，各有分際，不敢隨便踰越，儘管時代早已不同，家中古老的遺風卻是絲毫沒有改變。維持這份傳統的除了最具權威的大爺之外，就是大伯父和四叔了，在這幾位長輩心中，只有嚴守舊禮，才算對得起祖先。這叫作「衣冠不改舊家風」。

一九九二年，距離老家那早已隨風而逝的全盛時代，已經將近一百年了。家、國和個人都已歷盡滄桑。尤其近半世紀政治上的隔絕，故宅更是已經在地震中全部傾圮無存，卻沒想到，當我抱著憑弔的心情，半猜半問地找到那片已成空地的遺址時，有幾位四十歲左右的當地婦女，聚攏來向我們主動談起「聚泰號」當年，而很興奮地提供我們資料。這些以年齡來說，是絕未見過「聚泰號大宅」實況的人們，單憑傳說，就絕無半點懷疑地告訴我們：「聚泰號規矩大，日常男女分道而行。男不見女，女不見男。」

給我這「聚泰號」的人聽了覺得十分好笑。老家雖然規矩大，但是「男也見女，女也見男」。一家人，怎能不見？只不過，男女之間不苟言笑，卻是一項不成文的規定。在長輩面前固然要執禮甚恭，平輩之間也嚴守長幼有序。至於男女之間，「授受不親」的規範確是有的，兄長

見了弟媳要互相迴避；夫妻之間在別人面前也得特別相敬如賓，彼此的稱呼也很客氣。

老家規矩多，對小孩子來說，就很沈悶。幸虧六叔為人爽直開朗。很受晚輩們的歡迎。但即使他不喜歡規行矩步，為了取悅長輩，還是得在長輩面前走路邁方步，應對進退照規矩來。只不過一離開了長輩那挑剔的眼光，他就恢復了頑皮。我想，在這一點上，六叔也是得了祖父的一份遺傳。

我很喜歡這位笑口常開的六叔，因為只有他肯帶我玩。

不過，和六叔玩也很「驚險」，他不但喜歡讓我走那窄窄的月台邊緣，這邊離地三尺，那邊不准踩線，害我戰戰兢兢；又常常把我放在家中醃鹹菜的缸頂上（這些鹹菜缸在不用的時候，是倒過來，缸口朝下放著的）。那缸底只有一尺多的直徑，卻有三尺來高。六叔把兩三歲的我放在上面，看我怕得不敢站直的樣子，引以為樂。當我求他放我下來，他就乘機「勒索」，讓我給他表演許多「口技」：

「學學你爸爸彈三弦的聲音！」

「伊咕噹，伊咕噹！」

「母雞生蛋怎麼叫？」

「咕搭！咕搭！」

「你爸爸上天津去做什麼？」

「『你』爸爸，上天津，給媽媽，掙洋錢。」

這是經過了好多次被六叔「口試」「交白卷」之後，母親刻意教我的，三個字一句，我才背得出來。當初是我自己分不出「你」和「我」，把問題中的「你爸爸」照原樣搬過來作答案。

六叔也總是在這時候開始刁難——

「不對！你說，『我爸爸，上天津，給媽媽，賣黃瓜。』」

「……」我開始執拗，不願「人云亦云」。

分不清「你」和「我」的這個小孩，每到這時，就堅持要六叔放我下來。六叔倒也不為已甚，怕我哭鬧，只得把我「開釋」。

在我成長過程中，老家幾乎每一個人都喜歡向我追述我這被挾持，又被開釋的趣事。說到我「有所不為」，寧「哭」不「彎」的堅持，認為我這小女孩對爸爸的尊嚴絕對維護，是很有「骨氣」的。

其實，「賣黃瓜」有什麼不好？小孩子尤其不會懂得人的工作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我猜想，當時自己那沒來由的堅持只是憑著一個小孩子的直覺，而那直覺一定是來自當時人們在逗我的時候，所流露出來的對母親的揶揄，和對父親赤手空拳，離家去外面「闖天下」的不屑與不信任。種種面前背後的談論與嘲諷，反映在我這小孩子的眼中和心上，一定也有她幼稚天眞的判斷。無形中就使我站在了父母的這一邊，知道母親所謂的「掙洋錢」是為父親辯護；而別人所教

我說的「賣黃瓜」當然是對母親那信念的一種輕蔑。

雖然我當時只有三歲多吧?但我的堅持正是來自先天的、對父母的愛與正義感。很可能，我那時已能體會到父親出外奮鬥，長年不在家，年輕的母親在那舊式大家庭中的弱勢地位，而自動責無旁貸地站在她的一邊吧!

十一、跨出一個時代

上文談到我的六叔喜歡拿幼小的我惡作劇，把我放在鹹菜缸頂上，勒索我說歌謠、學口技給他聽，否則不放我下來。而那三歲的我，連「你」和「我」也還分不清。

其實，「『你』爸爸，上天津」，既不是「掙洋錢」，也不是「賣黃瓜」；而是去讀書。自從母親嫁過來以前，父親就已經是經常去天津；高中畢業之後，考進了當時已很有名的「工業學院」去學化工，所以儘管父親已從學校畢業，隨同他的化學老師在塘沽那濱海小村去開拓製鹽工廠了，家中的人們還是以爲他去的是「天津」。

而最重要的是，老家的人們對父親去學「化工」很不以爲然。認爲「書香門第」，「大戶人家」的子弟，爲什麼要去讀什麼「工業」學校？他們覺得「工業」就是要做「工人」。而「工人」的形象就是「泥胳臂泥腿」，出賣勞力的。三叔和四叔雖然也唸洋學堂，「法政」和「法商」，但所學的是洋務和法政，到底還是「做官」的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怎麼能去做「工人」？

其實，反對做「工人」只是表面堂皇的理由，眞正的理由是大家庭，不願負責支應父親去天津讀書的費用。

父親沒有什麼時間申辯，也不知道怎樣才能申辯。

父親在天津讀高中的階段，正是和祖父最接近的階段，也是老家人們由於不滿意祖父的作風而連帶以爲父親也不過是到外面陪祖父花錢玩樂而已。對父親的想要完成學業，先已存有成見。

但對父親來說，這是他和祖父最接近的一段時間。也只有在這段時間裡，他眞正接受到祖父對他的關愛；也只有這段時間，他能發揮對祖父的孝心。學化工，是祖父的意思，祖父在各方面都是得風氣之先的。由父親日後敘述他和祖父在天津相處的快樂及祖父後來手頭拮据，典當自己的皮袍爲父親繳學費的事，更可以想像到，他們父子二人在天津既曾「同甘」；也曾「共苦」。

當時，中國人剛剛從「天朝」的夢中醒來，接觸到西方的船堅砲利。從極端的挫折與不服，到不得不認可自己在科技方面的落後是使國勢衰微的一大原因。於是亟圖學習西方，設立新式的學堂，聘請西方或日本的教師前來授課。光緒廿九年創立的這所工業學校就是其中之一。它原名「北洋工藝學堂」。當時所聘請的教務長就是日本人。學生按程度分入化學、機器兩科的，用英文教學；分入化學製造和圖繪兩科的，用日文教學。父親考入這所學校時，可能是民國五年。他的畢業照片一直掛在家中，上面寫的是「民國八年夏」，那年我剛剛出生。而祖父在民國七年去世了。

祖父的去世，對父親造成的傷痛和打擊非常大。在我成長過程中，父親經常娓娓敘述祖父的故事給我聽，當時我只欣賞父親敘述的生動和溫暖，以及由於父親的敘述，使我覺得我好像認識這位倜儻不群的祖父，對祖父的故事熟悉到如同親見目睹。但當自己逐漸經歷了人世滄桑，了解到在人間世奔波奮鬥的艱辛，才慢慢了悟到祖父疼愛父親的心情。以一個因妻子早逝，自己對憑媒說合的繼室不滿而離家出走，在外游蕩的中年人來說，他的寂寞與感傷，他對幼子未能照顧的歉疚；以至於當孩子長大，終於也能離開老家，到天津來讀高中而與他相聚，那補償的心情，以及，以祖父的聰明與傑出的天賦，該是多麼希望自己能夠有所建樹！以祖父那喜好新奇，勇於嘗試的天性，對一切有創意的事物都深感興趣而要去探索和參與的實踐精神，愛迪生發明的留聲機剛剛傳入中國，他就不僅是買來欣賞，而是主動去親自灌音，錄製唱片，所表現的勇於接受新事物的創造力，以及他在鎮上不惜重貲，組織羅漢會；表面看，那是他性喜揮霍玩樂，但當你深入了解，你會發現，他所表現的正是一種「管理」與「組織」的天才。他在駕馭人力方面，是那樣地舉重若輕，應付裕如。他有眼力認識骨董，有魄力大批買進。說明他有敏銳的判斷力和決策的才幹。以他當時不到三十歲的年紀，做事能有那樣的大手筆，用現代工商社會的觀點來看，他會是最好的企業家，一流的投資者，如果給他一個上軌道的環境，他不難成爲可以媲美美國一些敢於冒大風險去投資創業的成功者。

但是，祖父並沒有趕上一個上軌道的時代，清末的政治腐敗，國勢衰微，社會久已失去了朝

氣，大家庭抱殘守缺，因襲不振，加上婚姻的失敗，使他走向了頹廢玩樂的歧途。

由父親敘述祖父種種小事中可以了解，在父親心中，祖父是他最敬愛、最同情、最感謝，也最需要他去保護及照顧的一個人。

我從來沒聽過父親強調祖父的去世所帶給他的傷痛。

父親不提，其實也正說明那是他眞正傷心的一件事，他不敢碰那傷痛，他只談和祖父同在天津相聚的種種趣事。談他如何陪祖父去熟悉的有名的餐館吃飯喝酒，享受一呼百諾，揮金如土的豪縱。談祖父經常在付賬時，把錢袋中的現大洋一古腦兒倒在桌上，看它們四處亂滾，引以爲樂。而父親和熟悉的跑儻只得忙著分頭去撿。他也談祖父酒醉後，在路上把前面水車頂上的扁擔悄悄抽下來，自己扛回家。而那水車伕明知他在惡作劇，卻不說破，假裝不知不覺，卻在他們到家之後，才去叫門索回扁擔，因爲他知道「又是這位爺在開他的玩笑」。

父親對祖父的玩世不恭由衷諒解。而他也津津樂道祖父允許父親把抽香烟「化暗爲明」，他的理由是：「任何事不要隱瞞，要做就光明正大地做。再說，抽香烟總比抽鴉片好。」

父親所讚揚的是祖父的「民主」和「坦白」，但也透露出他對祖父的諒解——「後來他想戒掉鴉片時，身體健康已不允許他這種折磨了。」諒解和同情的心聲溢於言表。

我不知道父親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眼看著祖父從一擲萬金無吝色到要靠典當才可以爲父親繳出學費。那麼要面子的人，是如何面對自己病弱拮据的困境而堅決地不肯回家。父親給我們講

祖父的故事講得巨細靡遺，卻從來不講他當時是以何等難過的心情，陪伴著祖父而眼看自己這唯一的、最愛的、天才型的父親在悽涼中油盡燈枯。

由日後父親的來信中，我得知，那時間，正是父親在工業學院讀大四上學期的冬天——十一月。

我不知道父親是怎樣度過那學期的。在那以前，父親的學費已經是祖父把皮袍一件一件地當掉才得以繳付的了。

父親面對自己學業，想到祖父的苦心時，能不流淚？他日後力圖上進，敦品勵行，一定是當時他在自己摯愛的父親病中，所悄悄立下的誓言吧？祖父在自己明知已不久人世的時候，對父親一定勉勵有加，希望父親擺脫舊家庭，走向新時代，以不辜負此生，而不要步祖父的後塵。

祖父去世的時候，已是一文不名。

家中依禮給祖父出殯。

但是家中沒有義務供父親讀書——那是各房自己的事，而繼祖母，不要說她無心教育父親，實際上，她也無力來伸出援手了。

民國七年的冬天，是父親最寒冷的冬天。

繳不出學費，還差一個學期就畢業，也只得輟學了。

母親正在懷孕待產。

我想向這世界報到，來得眞正不是時候。

大家庭是很奇怪的，各房自己管自己，只有日常開支或婚喪大事，由「公桌」支應，其他，是各房自求多福，伙食是大鍋菜。各房量力而爲，自己可以有「私房菜」。父親和母親是最無人聞問的一對。

臘盡春回，學校開學在即，父親無奈地放棄了這最後一個學期。今後，大概只得是留在自家這虛有其表的大宅裡，挑水灌園，做一名終身無俸的長工了吧？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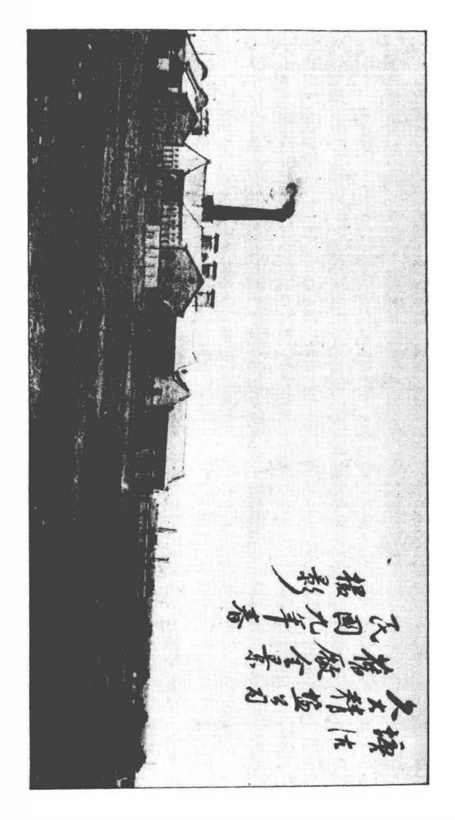
父親的轉機來自工業學院同班同學的一封快信：

「……來信已到，不必再談，所有本學期全期各費，已掃數交清。收據寄附。希即於日內到校受課爲盼……」

父親的同學，其中就有在薊運河上與父親一同泛舟的周克生先生等幾位，集資挽救了父親。這筆錢，給父親帶來了「錦繡前程」；給我們日後這幾個兄弟姐妹帶來了全新的成長環境。

工業世界，在父親面前展開。他誠服這世界上的親情和友愛。他從來不抱怨他的大家庭，他要和祖父愛他一樣地愛我們。他要像他的同學幫助他一樣地幫助別人。

在塘沽，他刻苦勤勞，忠心耿耿，隨著工廠一起成長壯大。在同事與工人心中，他是永遠的溫暖與寬厚，愛戴他的人是不必用言語去表達的。



他們用行動。

父親的一句話，工廠的相關部門與職員一向樂於遵行。不是因爲職位，而是因爲「靳先生說的，我們一定相信。」

這工廠，就是日後全國聞名的久大精鹽和永利純碱。創辦者范旭東先生留學日本，是教育家范源濂先生的弟弟。

十二、母親

我相信，如果母親不是出生在渤海邊的一個漁村「淮漁淀」，她可能沒有膽量鼓勵父親離開老家那深宅大院，而到塘沽那海風滔滔的不毛之地去住土坯房。

母親的娘家——我們的外婆家，我去過。那時我還很小。模糊記得外婆家的一列房屋，孤零零地在很空曠的地方，周圍曬著稻草，卻沒有田園。那稻草是從其他村子運來做燃料的。外婆的廚房在屋子左邊另一間低矮的茅屋，她燒飯的時候，我在旁邊搗亂。那廚房只有門而沒有窗，採光與通風都只靠那一扇木門。而我總是喜歡玩那比老家的風門輕了不知多少倍的木門，覺得自己可以把它開開關關，很能補償我一直推不動老家風門的挫折感。但是，我一關門，廚房就會變成漆黑一片。外婆喊我也沒用，鄉下又沒有任何玩具可以哄我。外婆無奈，只得順手拿了一只舀水用的葫蘆瓢，給我當玩具，那瓢不但毫無趣味，而且破了一個洞。我拿在手上，找一支筷子敲著，玩不多久，就把它扔在一旁，又去玩那可以開開關關的門。外婆在那一下全黑，一下復明的小廚房裡燒飯，大概十分苦惱。每當她又喝斥我，要我「別關門！」的時候，我就很「善解人



毌親和大弟祖培，毌親個性外向，勇於創新。

意」地說：「好嘛！我去敲破瓢！」

對生活簡素的外婆來說，雖然我的回答是「童言無忌」，但反映在外婆心中，大概使她感到有點諷刺，而哭笑不得，所以在以後我逐漸長大的日子裡，經常聽外婆提到這兩句使她覺得尷尬的問答，想見她內心裡一定爲她不能爲我提供玩具而感到歉疚。

其實，外婆那裡知道，我根本沒喜歡過玩具。而我所喜歡的是她家所飼養的那些雞，和院子外面廣闊的大平原與成堆的稻草。尤其喜歡去收集那些母雞剛生的雞蛋。那些紅皮的雞蛋是每次外婆到塘沽來看我們的時候，最受我歡迎的禮物。外婆帶來的雞蛋是盛在橢圓形的大簸籮裡，那些圓溜溜的雞蛋被滿滿的麥麩維護著；好像一些嬰兒安穩地睡在母親懷裡一樣。我對這些雞蛋的好感絕不是爲了它們可以吃；而完全是一種欣賞和喜愛。

淮漁淀那水天一色的開闊之美也比「聚泰號」的莊嚴窒悶可愛多了。我只是沒有機會讓他們了解，我是被外婆帶著，悶在小小的廚房裡，覺得無聊才去開門關門給自己解悶而已；我其實是情願讓大人把我留在門外，誰也不要管我。

母親嫁到「聚泰號」，被別人羨慕，認爲她這麼好命，但很顯然，母親一點也不喜歡那自命不凡的大家庭。可以想像，在那大家庭裡，不僅是妯娌之間對各人娘家的門第互相比較，老家的那些長輩，更難免自己覺得高人一等，對這憑媒說合的漁村媳婦，一定難免歧視。儘管母親在他們李家是極受讚賞的、讀書識字的才女，外公又是村子裡受尊敬的老師，能書善畫，典型的書香

門第；但來到「聚泰號」，那可全然的不算什麼了。從漁村的「高級知識分子」，變爲「聚泰號」的「窮親戚」，母親的委屈可想而知。

但是，環境的改變並不曾影響天性堅強獨立的母親。她不像別的媳婦，來到夫家就只能謹守夫家的規矩。她那執著眞理，敢向不合理的事情挑戰的個性，使她在傳統保守的老家，也能獨立特行。首先，她是用行動反抗每天去各長輩房間去做那半小時的侍立問安，她的充足理由是：因爲她剛生產之後，身體還未復元。她也是唯一的一個媳婦，敢冒破壞家規的危險，在嚴冬下雪的日子，以晚輩媳婦的身分，走進「伯公」四爺那溫暖如春的房間去抗議所分的煤炭太少，不足以禦寒，使四爺不得不放下家長的身段，答應增加煤炭的配額。後來，我們知道，單是侄媳婦膽敢走進伯公房間這件事，就是離經叛道的。

在母親心中，那全鎭仰望的「聚泰號」是百分之百的「監牢獄」。當家的四爺，自己抽鴉片煙，娶姨太太，揮霍無度，十足享受。卻越來越苛扣別人，以平衡他的收支。對其他各房是「計口配糧」。冬天發給各房的煤炭根本不足取暖。日常生活，除「大鍋飯」以外，一切額外花銷，都得各房自理。所以，去當舖當當，是除了自己另有財源之外，各房維持生活開支的正常來源。能拿去當的大部分是皮貨，北方冬天長，毛皮的需要量大，容易爲當舖所接受。一旦「死當」，成爲流當品出售，當舖老闆就利市百倍。開當舖的大部分是山西人，北方稱他們爲「老西兒」。「老西兒」開當舖，既識貨，又善殺價。對需錢孔急的人們來說，當舖既是恩人，又是魔頭。一

件當品受到老闆青睞的那一刻，和老闆估的價錢低到你只想朝他吐口水，卻又不得不低頭認命的那一刻，對跑當舖的人來說，是最能體會到的「人吃人」的滋味的了。

靳嚮善堂輪到抽鴉片煙的四爺來當家，實在是由於應該當家的大爺當初覺得自己太不擅理財而情願「讓賢」所致。

對一個讓你住在「皇宮」裡，卻只分配你一天兩頓「囚糧」，其他一切開支全靠典當自理的「靳嚮善堂」人們來說，有人可以很認命地忍耐；但是對母親這樣的人來說，能走出這「牢房」，才算得救。

母親血液中有漁村的自由，勇敢和堅定。向風浪挑戰的漁村生活，使她覺得「塘沽」也正是她另外一個「娘家」。

相信如果不是母親的鼓勵，以父親那比較傾向委曲求全的溫厚個性來說，想要邁出那老家可能並不那麼容易下定決心。

塘沽井家庄的「土坯房」，比准漁淀的普通平房不但簡陋，而且還更小一些。至少它不是獨門獨院，而是三家合住在一個院子裡。黃土院落被小磚塊鋪的走道分隔成四份。對面東廂房兩份，我們兩份。大門在東廂房旁邊，所以東廂房只有兩間。我們三間。不知爲什麼這院子沒有南房，南邊是一個堆雜物的小棚子和廁所。北房由一道小門和短牆隔開，那邊是工廠的廠長住。

院子裡那四份小土地上，原來是光禿一片，塘沽的土質受海水浸泡，完全不適種植，幾年

後，生活略為安定，才從三里外運來的「甜土」，略可滿足父親對老家那滿宅花木的懷念。自己可以種些黃瓜、豆角、玉米之類，既可做為副食，又可聊慰鄉情。母親則如魚得水，可以施展她在漁村生活中所受的基本訓練來表現她的才幹。她會處理各式各樣的海鮮和淡水魚蟹，而塘沽的海鮮質量之好，價錢之便宜，取得之方便，更是外地人所難以想像。在我稍微長大，能更清晰地記得生活面貌之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小販挑到門口來兜售的螃蟹，母親總是把它們整簍的買進，全部倒在大大的鐵鍋裡，加鹽和花椒，在大柴灶上一次煮熟。春天的銀魚、琵蝦與黃魚，都是最應時當令的美味，至今回想，仍然齒頰留香。「對蝦」與海蟹攜手而來，是塘沽人用他們的土腔慣稱的「大海螃蟹大對蝦」，火車經過塘沽車站時，小販向乘客沿窗兜售這海濱特產，是塘沽發展成為工業鎮之後的一景。

但也就因為幼時接觸的海鮮太好了，長大之後，反而不喜歡進海鮮店。城市裡的海鮮和當年塘沽那剛出水的海鮮，實在無法相比。而海鮮離水稍久之後的腥味，也使我這在塘沽長大的人不敢領教。所以在後來的朋友心中，我成為最不喜歡吃海鮮的一個。

十三、地平線

塘沽的生活裡，沒有磨磚對縫的瓦房，沒有骨董，也沒有翰墨和圖書，連花草樹木都沒有，它空曠一片，「地平線」成爲我幼年時最熟悉的景致。

當我沒有「後花園」可以去玩，父親上班，而母親忙家事。二妹在艱苦的陌生環境中出生，使母親的負擔更爲沉重。沒有玩伴的我，唯一「理想」的去處，就是那簡陋小院的大門口。還好，這裡是如此的鄉野，再也沒人限制我，要我「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了。

回想在老家的時候，「大門口」幾乎百分之百是女眷和小孩的禁地。東跨院的大門是車門。比一般大門寬上一倍。石板鋪砌的車道，直通跨院後面的上馬石、下馬石和三個車庫（舊時的車庫是專爲停放馬轎車之用）。當家中有人要騎馬或坐車出門，就先把車門打開，把那活動的、一尺半高的木製大門檻拿掉，使車馬直接通過光滑平坦的石板路，開上大街；然後再把大門及門檻恢復原狀。偶然，或是因爲出去的車馬不久就要回來；或是因爲還有另外的車馬再要出去，就只把那兩扇厚重的黑漆大門關上，而門檻就暫時橫放在「門洞」的一旁。這時，那大門下面就會出

現一尺半高的狹長空間，俯身彎腰可以看見街上的一部分景色。幼小的我，總不忘把握這千載難逢的一刻，俯身彎腰，從大門下面那一尺半空間向外面張望一陣。一面望，一面驚嘆著說：

「啊喲！還有馬哪！還有車哪！還有狗哪！還有人哪！……」

像看幻燈片一樣，直看到工人走來說，「要開門囉！別擋道呀！」我才退到一旁，看著有人乘車或騎馬從外面回來，「格朗朗」地通過那石板路面，然後我才戀戀不捨地離開這可以窺見外面世界的小小空間，回到我與外界隔絕的高大、空曠的宅邸。

在老家，想出大門是千難萬難的。不要說成年婦女，就連我這小女孩，也一樣受到重重禮教的「保護」。正門和車門是長年關閉，有人看守，不要想「越雷池一步」。記憶中，僅有的可以讓我們出去的機會是清明節的時候，隨家人去掃墓。那時才可以看見全體婦女長輩修飾打扮得整整齊齊，魚貫走到跨院，那裡排開著幾輛馬轎車，讓我們依序坐上去，車子裡鋪著棉褥或皮褥，還有長長的靠枕，母親總不忘叮嚀我，手要抓緊旁邊那精雕細琢的木頭車壁上的小欄杆。否則那轎車經過土道車轍的時候，有大幅度的搖晃，會碰頭的。而我是只顧好奇地觀賞轎車裡深藍主調的設備，和那馬匹等待出發的樣子，迫不及待地等著車伕走近車轅，但也就在這一切齊備，整裝待發的興奮時刻，那車伕就把車廂前面的車帘，從車篷頂上拉下來；開始一環一環地把它扣緊。我們坐在裡面就感到那光線是倏地暗下來，終於只剩了車帘與車壁間那一小截、一小截的縫隙，透過幾線天光。而只聽見車伕輕喊一聲「ㄐㄧㄚˋ！」然後他也跳上車轅，車子就「格朗朗」地出

發了。

外面是什麼樣子呢！只有「猜」吧！

那種在窒悶中搖晃著，走向不知前景爲何的道路。如今想來，眞像遭到綁架一樣。

看不見藍天白雲或綠野，只感覺到母親的懷抱溫溫柔柔地護持著我——「坐好！別碰頭哦！」

好不容易走出大門，卻比在家還更失去了視覺的自由與活動的自由，這記憶，永遠不會淡去。而我知道，它曾繼續是當時女性們的厄運。但是，我卻由於父母的脫離老家，而把它掙脫了。

我們來到了荒涼的塘沽，住進了低矮的土坯房。這土坯房，沒有台階，沒有車門，也沒有箭道與後花園。

在生活中消失了一切之後，我發現了「地平線」。

塘沽的「地平線」是一首蒼茫的史詩。

它太古老了，從黃帝戰蚩尤的年代，以前又以前，這地平線就靜靜的存在著了。

而我，擺脫了「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約束，有了充分的自由，天天敞開這小黃土院落的簡陋的木門，坐在那只有七寸高、二寸厚的門檻上，沒人限制我坐多久，也沒人警告我快走開。

於是，當母親忙家事，父親去上班，我不吵媽媽，也懶得聽妹妹哭鬧，自己在這門檻上坐個大半

天，看「地平線」。

那種眞空的感覺是日後少有的經驗。眞「空」！沒有房屋沒有樹木，沒有羊群牛群，整面的藍天，覆蓋著整面的黃土地，那麼完整無缺，那麼沒有一點阻擋與點綴，藍天像一只無邊巨大的倒扣下來的圓底鍋，而天與地相接的地方，那緩緩的弧度是那樣的引你追尋——再遠的地方是什麼呢？我知道，再遠的地方也是這樣天與地交界的地平線，它是推展不盡的。因爲我曾偷偷地向著它跑過，跑到我累了，也膽怯了，它還是那麼遠，還是那麼靜靜地覆蓋，靜靜地承接——藍天與黃土地。

於是，我悄悄跑回來，認可自己就應該坐在門檻上看。認可這世界就是那麼「眞空」！

十四、記憶

隨父母離開了高台階、方磚墁地的老家，來到這土坯房，下雨時，滿院泥濘。大雪時，因爲沒有廊簷和台階，風門就會被雪堵住，無法開門。

至於說家門之外，幾乎是沒有道路。更沒有市街。寥寥幾戶人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彼此沒有交通，偶爾聽到狗吠的聲音，白天還好，夜晚聽來，顯得格外悽厲。

面對這樣的荒村，幼小的我，心情上一定也有很重的負擔。一種無助的感覺，總難免會盤踞在我的心頭。

印象中，總記得父親晚上加班，那沒有路燈的荒村，除非有月亮或下雪，否則入夜是一片漆黑。外面傳來風號或狗吠，蓬門敝戶，絲毫沒有安全感。家是兩開間的簡陋茅屋。堂屋一張飯桌，四只方櫈，漆著斑駁的紅漆。另一間是睡房，土炕上，舖著氈條和棉被。一盞油燈，爲了省油，永遠是捻到最小。而母親經常是盤腿坐在炕上，我的枕邊，把油燈放在她的膝前，俯身就著那點微光，縫補衣裳。她那針線的聲音在萬籟俱寂的夜裡，十分清晰，而我假裝睡著，忍受著那

無邊的寂靜。黑暗之中，卻彷彿有無數針尖般細小密佈的星點，游動著，卻又從未離開它們原有的位置過。我一定問過太多次「爸爸怎麼還不回來，」以致母親回答得都厭煩了，所以不敢再問，但假裝睡著的滋味是非常窒悶的，耐心數著母親的針線聲不知多久，直到父親的腳步聲，隨著他幢幢的燈影在窗外出現，母親迅速地下炕去開門，聽到父親的低嗽和輕聲說話之後，我才放心地睡去。

有一天，下著大雪，天是非常的冷，父親並沒有加班，卻是過了吃晚飯的時間很久，天早已黑了，他還沒有回來。

焦急的母親帶著我，把煮好的飯菜，放在飯桌上等著。眼看燈碗裡的油快要耗盡了，父親還沒有回來。那荒村，在工廠的一段距離之外，外面風欺雪虐，既沒有辦法去工廠找尋，又沒有鄰居可以探問。母親的焦急可想而知，那煤油燈把我和母親的影子，大大的、搖搖晃晃的，印在黑洞洞的土坯牆上，說不出的孤單無助又恐慌。

不知等了多久，母親催我吃飯，我執意不肯，也根本忘了飢餓，風聲怒號之中，父親跌跌撞撞地回來了。他手上已沒有燈，皮帽和圍巾纏住整個的頭部，只露著眼鏡。羊皮大衣黑呢面，使父親在雪地上像一個陌生客。母親急忙拉他進來，用力頂著北風，關上房門，插好門栓。來不及問父親發生了什麼事。父親的帽子上，圍巾上，大衣上，手套上，全是冰花與積雪。他的手凍僵了，母親幫他一樣一樣的把這些配備卸下，看他跺著腳，抖去氈靴上的積雪，勉強接過母親遞到

他手中來的溫毛巾，卻只能托在手上，無法動作。父親的眼鏡上一層霧，母親幫他摘下來，露出他被寒風催出來的滿眼的淚，我在旁邊眞是嚇呆了，見到父親歸來的欣慰，抵不過對父親如此狼狽的心痛，只顧站在那裡，呆望著這如同陌生人一般的父親。

過了好一陣子，父親慢慢暖過來，喝了一杯熱茶，這才告訴我們，他回來這麼晚的驚險過程。

原來他從工廠下班回來，才六點多鍾，但北方的冬天，是已經天黑了。從工廠走路回家，要沿著沽河走很長的一段路，那天的西北風非常強勁，荒原上，既沒有建築物，又沒有樹木可以阻擋，連電線桿都沒有。父親一路走來，本已十分艱苦，偏偏陣風加劇，把父親一路往河裡吹。父親手裡的燈一下子就被吹熄而且變形了，只得把燈扔掉，奮力抵抗那風，卻是力量單薄，怎敵得過那十幾級的狂風加雪？不過，也幸虧有雪，才可以在沒有燈光照明的情形之下，看淸道路。父親在幾乎要被吹到河裡的千鈞一髮之際，抓住了一只固定輪船用的錨樁。把自己穩定下來。心想，雖然說，河裡已經結成堅冰，但被吹到河裡是不是能再爬上岸來？也仍然是很難說，而十分可怕的。父親抓住錨樁，喘息了一陣，決定不再沿著河走，而選擇逆風朝離河岸遠的地方走，走一段之後，再往家的方向掙扎一段，再逆風走一段道路，再往家的方向走一段。這樣用「之」字形的走法與疾風大雪搏鬥了將近三個小時，才算走進小村，擺脫了曠原上的風，而當我和母親在燈下焦急的時候，怎麼知道父親是在和風雪掙扎呢？

總算化險爲夷！父親終於回來了。我也終於找到了一句安慰父親的話：

「爸爸！不要再去上班了吧！」

父親拍拍我，把我放在他的膝頭上吃飯，只顧心疼我和母親爲了等他而空著肚子，餓到這麼晚。

父親怎能不上班呢？

我那安慰的話又是多麼幼稚呢？

但這風雪之夜的景象，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幼小的我，已很清楚地感受到生活的壓力，和做爲一個父親，他肩頭上的負擔。

從那時起，我就朦朧地對自己宣誓——將來我要好好孝順父親。

其實，在能孝順父親之前，我記憶中最深刻的卻還有那頓香甜的晚飯，因爲飯菜都已涼了，母親爲了快速，把它們倒在一起去加熱。上桌之後，菜香四溢，好吃無比。而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天的菜只是一道去皮的老蠶豆炒大白菜加些半肥瘦的豬肉片。日後我也曾試著再炒那道菜，卻是無論如何也炒不出那麼香甜的味道來了。

十五、拓荒

塘沽的冬天，經常是雪茫茫，風獵獵的。

它很空曠，風從廣大的北方，或更廣大的海上，任性地狂吹，把荒原上，幕天席地的雪，吹得迷茫又凌亂。那條大河，不知已經寂寞地橫越這荒原多少年代了，它亘古以來，就這樣把滿河的水送往海洋。當嚴冬來臨的時候，它會封凍成一道冰川，靜止著，隱埋起它那無止境的行程。

肆意怒吼著的風，發著哨子一般的聲音。它好像自古便如此地霸佔著這荒原，從未想過會有人能在這裡與它一較短長。渺小的人類在狂吼著的這冬季北風肆虐之下，像似一些枯葉，會被無情地席捲而去。

濱海的這片大地，覆滿了鹽分，即使不是嚴冬，也看不見樹群，地上只能長些苔蘚，紅紅的，「赤地千里」的形容，用在這裡很是恰當。

如果不是這幾位立志要以開發實業來建設國家的年輕人，看中了這一帶大海的資源，要利用這塊未開發的處女地，做他們創業的起點，設廠製鹽，這片土地還將繼續這樣的荒蕪著，寂寞



塘沽久大精鹽公司開闢出來的鹽田。

著。人們從未想到用工業化的方式來這裡向大海商借財富。而現在，民國二年，有人來勘察過了。他們嘗試在這裡設廠製鹽。大海就是他們的原料，分文不取而又來源充沛。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他們用簡單的風車，藉著風力轉動，把海水打進鹽田，免費的陽光就把海水晒成海鹽，再用簡單的方法把海鹽加熱，熬成精鹽。經過包裝之後，可以運到各地去銷售，而那大粒的海鹽，就開始成堆成垛地堆在鹽灘外面，給這荒原加上了點綴，成為一些閃亮結晶堆成的「鹽山」。

逐漸地，風車增加了，鹽田擴大了。人們由開始的使用小鍋熬鹽，漸漸蓋起了有篷頂的廠房，不再用簡陋的小鍋，而有了大型的「鹽炕」，開始初具規模的工業化了。

剛剛畢業的父親，是這工作陣營中的一個小小的「監工」，剪掉了畢業時還殘留著的辮子，穿上中山裝或工服，遠離了老家那身穿長袍馬褂，揣著袖子踱方步的傳統，在曠野與海風中，展開了人與大自然的攜手。

這「攜手」，是奮鬥，也是投奔。大自然用粗豪的胸襟迎接他們，卻也用無情的考驗，磨練他們。大自然提供一切，但看你要經過怎樣的奮鬥才可以取得。這答案，他不向你說明，全靠你自己去揣摩與追尋。

來拓荒的這些人，不但要能抵抗冬季的風雪嚴寒；也要抵抗夏季毫無遮擋的驕陽曝晒，以及那隨著酷熱而至的傾盆大雨，把滿地黃土變成濕滑難行的泥濘。住處與廠房之間是用雙腳走出來

的路。夏天冒著日晒和雨淋，冬天冒著零下嚴寒的風雪，沒有電力的照明，也沒有車輛。步行就是人們唯一的交通方式。夜裡趕工是靠著塗上桐油的紙燈。

「井家莊」是唯一的村落。他們姓「井」，但此地並沒有井。人們飲用的是河水，挑水的是一個單目失明的工人，大家叫他「井瞎子」。「井瞎子」功勞不小。他是這幾戶人家的「水源」。

照明的紙燈，「能源」是煤油。煤油由一個叫作「海家」的極小的小舖供應。「井瞎子」和「海家」就是這小村子的人們的上帝。

久大精鹽的拓荒者，穿著日本式樣的中山裝，剪了辮子、推著平頭的新式髮型，和「井瞎子」那盤在頭頂的辮子，還是形成了對比。這些開拓者帶著「異類」的姿態加入了這小村，給村人帶來了迷惑，也帶來了新的生活內容——不一定要「討海」，而可以去做工人拿薪水了。

最初的久大精鹽的工人，也是這村子裡最早不再留辮子的人們，他們叫來了遠近的親友，加入了工廠的行列。這些人，幾乎全是文盲。

在民初的年代，「上班」對一般人來說，是很陌生的。「上班」是工業化之後的生活項目。它指的是按時到一個工作場所去工作，按時支領薪水的一種集體。有組織，有規範。人們發現，一個良好的工作場所會如同一個家庭，它提供你工作，使你有新的歸屬，給你酬勞，使你可以維持生活。行有餘力，會照顧到你的福利。包括消閑、進修、醫療、子弟學校等等。在這之前，人

們只有去官署工作，人們稱之爲「當差」。天天去簽到應卯，也似乎只有官署，才提供在其中工作的人們俸祿薪餉。此外大概就是軍隊，有糧餉的收入，所以當兵叫作「吃糧」，可以維持起碼的生存。至於說商號或地主，都是以「個體」的姿態，隨本身需要，雇用一些人員，薪餉並不固定。商家的學徒大多數只管食住。家庭雇用家丁，也是如此。給些零用錢，管吃管住而已。談不到組織，也沒有其他的照顧。大戶人家雇用僕婦，好像在原則上也就是「終身雇用」。中途如果想回自己家鄉，或雇主經濟困難，可以「打發」他們走路。給多給少，當然也沒有固定的標準。至於說，未婚的丫鬟，大部分是向貧窮人家買來的。給她們取個主人愛聽的名字，供家人使喚。長大之後，如果主人慈悲，也會找個對象，把她嫁出去。也有姿色好的，被主人「收房」成爲侍妾。如果主人惡劣，把丫鬟虐待致死，或惹惱了主人，把她們「趕出去」，不問她們下場如何的，也是常有的事。大家並不認爲有什麼不妥。

到工廠去「上下班」，在當時中國大部分民衆來說，是很新鮮的。在塘沽這片土地上，忽然有外人來這裡開了工廠，招了許多工人，豎起了高高的煙囪，成天「突突」地冒著黑煙。工廠並且裝了一個聲音尖銳而又悠長的汽笛，每天四次，劃過那亘古寂寞的海濱長空！人們就跟著這汽笛的聲音在工廠進進出出的「上下班」；也跟著這汽笛的聲音知道了時間是幾點。「時間」這才開始對這裡近乎原始的居民有了意義。以前的「日出卯時」，「日中午時」，「半夜子時」，逐漸被「八點了」，「十二點了」，「兩點了」……所取代。時間忽然劃出了方格，在這規律的方

格之內，人們塡入了「工作」，「休息」等等不同的內容。

父親和那幾位「得風氣之先」的同事，就在春風、秋雨、冬雪、夏陽之中，經營起這全中國最具規模的「久大精鹽」。

十六、父母

「眞空」的世界，串入了工廠汽笛聲響的那一刻，是多麼振奮呢！好像從來沒聽過那麼動人的聲音！那尖銳悠長的笛聲從空無一物的長空中，遠遠傳來，是一個人間樂章的最溫柔的宣告——我們開始了！大家工作吧！

中國人在動了！但那不是「五四」式的「動」，這邊，沒有口號，沒有宣言，沒有抗爭，沒有誓約；有的只是腳踏實地，快樂地把生命納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年輕的生命有力量要發揮，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久大「一廠」的煙囱矗立起來了，廠房一間一間的蓋起來了，「地平線」上增加了一景，幼小的我，坐在門檻上看「眞空」的我，忽然看見有一列火車，沿著那地平線，從左向右，悠閑地開過去了，火車頭的黑煙向後長長地拖著，像一個巨人的髮辮，被風吹著，跑得那麼盡興。當火車終於從我眼前消失，開往看不見的地方時，我感動莫名，因爲，從那以後，我知道，地平線不再是「眞空」，而有了一件可以飛奔的東西，它是一個夢，是一個使者，是我自那以後，寄放前

途的一個具體的象徵。它是一項寫滿著「外洋與中國」的恩怨得失的、人類的新發明——火車。是它，改變了世界。

我們的生活中，有了兩種不同的汽笛聲。一種是工廠上下班的汽笛，一種是火車的汽笛。北寧鐵路「唐胥段」（唐山至胥各莊）是我國最早的鐵路。最初「唐胥段」的功能是運煤，開平及灤縣兩大產煤地區，在英國人經營，中國人覺醒，互爭礦權的情形之下，合併為全國知名的「開灤礦」。這「開灤礦」的煤，經由逐漸延伸的北寧鐵路，兩三小時車程，運到塘沽，是范旭東等幾位工業家看中了這地點可以設廠的重要條件之一。這火車也就成為塘沽久大精鹽生產線上的一景。有支線直接進入工廠。使得工廠地上滿是煤渣，黑烏一片。那長列的貨車，運煤來，運鹽去。烏黑的車廂，卻給人帶來溫柔的美感，像個勤勞負責的母親，它們是塘沽人全體的動力。有了支線之後，那長列的火車就不僅是在地平線那邊駛過，而來到了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那種貨車所特有的不但不急促，反而慢悠悠的感覺，比客車另有一種親切。客車是高高在上，對地面上的一切不屑一顧的；而貨車卻帶著一種服務的感情，載運著和我們生存密切相關的東西。那敞篷車廂，一點也不想有任何私祕的樣子，速度緩慢地、謙和地，可以禮讓一切高貴的客車先行地，那麼讓你覺得可以和它做朋友。尤其是我們這些小孩，每當有運煤車慢悠悠地從家的附近駛過，我們就會很興奮地跑到它附近去看那整齊的鐵輪，帶著那應該不屬於它的安閑與和氣，從我們面前輕輕地滑過鐵軌，那鐵軌的閃亮質感，總是引我羨慕。偶爾，我和比我小三歲的妹妹，各自找一

枚大號的鐵釘，在火車將要駛來之前，把鐵釘擺在鐵軌上，然後等火車輾過那鐵釘，它們就變成了兩支小小的玩具刀。帶著剛剛摩擦所生的熱，拿在手中，有一種暖暖的感覺。釘頭的部分被壓扁而面積加大，成爲整齊的刀形。而原來的釘子部分也就成爲一條狹長的刀柄。我們十分滿意這種「創作」之樂。完全不懂得那會對火車的安全有什麼影響，反而是有一次，妹妹把鐵釘放在鐵軌上之後，火車駛過的速度好像特別慢，我們眼看那鐵釘已經壓成了刀形，妹妹忽然伸手要從兩組鐵輪之間，把「鐵釘刀」拿出來。我一把拉住了她。那火車在行駛時，兩組鐵輪之間像是有個空檔，可以伸手過去，其實那是因爲火車後面一片空曠，沒有背景來顯現速度，而產生的錯覺，實際上，它還是「間不容髮」的。

自從有了火車，空曠的塘沽有了「重點」，我們可以到「鐵道北」去玩了。以前沒有鐵道的時候，連「北」都沒有什麼意義。

「鐵道北」有一片蘆葦地，還有一個跟著路基而形成的坡地，我們忽然覺得塘沽有了點綴。不知是不是因爲墊高路基所運來的土是「甜土」，所以當夏天來臨的時候，那路基的緩坡上開了不少的野花，有白有黃，在風中搖曳生姿，還有許多草。這都使我們覺得喜悅，每天專心等父親下班回來，帶我們到「鐵道北」去玩，那邊蘆葦叢中有些小路，走進去，會聽到藏在蘆叢深處的一些鳥叫。

父親懂得許多種鳥叫的聲音。他會告訴我們，這是「藍脖」，這是「紅脖」，這是「黃

鳥」。可惜我一直都沒有仔細去認識它們，而只是愛上了那蕭疏的野趣。

父親似乎和我們一樣的喜歡郊野。帶我們去玩的時候，一點也不勉強。彷彿那也是他盼了一天，好不容易才盼到的一段自己喜愛的時間，正好可以藉口讓母親專心地準備晚飯，把我們帶出去玩。火車和鐵道因此成爲父親的事業與父親的慈愛混合起來的象徵。

從零開始的生活，不僅需要勇氣，而且需要一些技能。那沒有廚房的住處，燒飯的泥灶是父親和母親兩人花了很多時間，用膠泥做成的。一個灶膛，上面是一個圓形的灶口，可以放炊煮用的鐵鍋，一面是一個長方形小小的灶門，在這裡燒柴，後面是一個可以插半截煙囪的風洞。先把灶型糊好，外面再塗一層白灰，下面墊幾個磚塊，就可以使用了。現在想想，眞不知當父親和母親協力做這起碼的生活工具時，想到老家那設備齊全的大宅，是做何感想。他們曾想過「不如歸去」嗎？還是既已做了「過河卒子」，也只有勇往直前呢？

或者，他們由於感情非常好，而寧願享有這「雙手萬能」，自立自主的生活；擺脫了大家庭的約束，反而更可以自由地相愛呢？

在我幼小的心中，我覺得父親和母親眞是最情投意合的伴侶。他們都很活潑，都喜歡園藝，也喜歡琴棋書畫。母親原來的名字叫李金彥，父親大概覺得「金彥」太功利也太男性化，就給母親換了一個詩情畫意的名字——「蘭蓀」。似乎這使他們更可以過得合自己的意。父親和母親下棋的時候，母親輸了，就會把整盤棋局攪亂，和父親賴皮。父親永遠對母親這小孩子氣一笑置

之，他們二人一起種花、種菜，瓜棚豆架的日子，全由他們合力創造，那「棚」與「架」當然也是他們一起搭的，在天天盼著發芽長葉，瓜豆成熟的日子裡，逐漸他們也養了小鳥；還養了蟈蟈，也有「蛐蛐罐」，大部分是爲了聽這些小昆蟲的叫聲而不是爲了看他們相鬥。母親還喜歡聽父親講故事。時常是父親把一些新舊小說裡的故事講給母親聽，然後再讓母親自己去看。來自漁村的母親雖然由外祖父教過讀寫，但她所見過的書是很少的。由於父親的「循循善誘」，先用故事引起母親閱讀的動機，然後再由母親自己去閱讀。閱讀之後，兩人在聊天的時候，就可以談談書中的情節，我也從「旁聽」之中，對那些書中人物有了相當的認識。長大可以自己看書的時候，就覺得那些人物都已和我相當熟悉了。

而父親和母親那種「談得來」的樣子，至今在我記憶中是美好溫馨的畫面。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氣非常冷。快過年了，母親又要忙給我們做新衣服，又要忙做年菜。三十晚上，北方過年要包餃子，父親一面幫母親擀餃子皮，一面給母親講一個窮苦人家的故事。講到在過年那天，做丈夫的瞞著妻子去當舖當掉了一件棉襖，買了肉和菜回來。而這妻子卻已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眼看丈夫過得艱苦，小孩又嗷嗷待哺，以後那有餘力來伺候病妻？心中難過，卻又不露聲色，勉強支撐，把餃子包好，放在外面窗檯上凍著。等丈夫和孩子都已熟睡，她給孩子縫好了禦寒的棉衣，把丈夫的舊羊皮大氅也修補整齊，一面流淚，一面暗中和丈夫孩子道別。希望他們由於不必再負擔她的醫藥而可以過較爲容易的生活。並且希望丈夫可以再娶，娶一個健康的女

人，幫助他過有希望的日子，在丈夫和孩子熟睡之中，她到院子裡上吊死了。

母親聽父親講著，哭得涕淚滂沱。父親卻笑她：「這故事，你已聽我說過多少遍了，每次聽，每次哭。卻還總讓我再說一遍。喜歡聽就不要哭嘛！」

而母親一面擦眼淚，一面說：「就是因爲喜歡哭，才喜歡聽嘛！」

年輕時的父母，在我們心中，眞是最可愛的一對：他們的輕鬆、開朗、勤快、樂觀，以及生活趣味之豐富，都一定影響了我們對人生的看法。家裡沒有爭吵的聲音，而只有說笑的聲音，眞不知他們的相愛是幾世修來。

母親「勤學好問」，所「學」的不只是讀書，而更是學做各樣的女紅。生活使她沒時間繡花，卻必須爲一家人縫製各季的衣服，連父親的中山裝，她都照著原來的樣子學會自己做。那本來是只有城裡的裁縫才會做的，以後索性連父親的西裝也由母親精細的手工裁製。而父親對母親無微不至的讚賞與鼓勵，一直使我印象深刻，而以爲世上的夫妻以至於各種人際關係，大概都是這樣和氣的。走入社會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後，才逐漸感到自己這從來不懂與人針鋒相對，或用疾言厲色去爲自己抗爭，在後來事事需要爭取，人人各不相讓的工商業社會，竟然也成爲一種「缺點」。

母親是一點也不保守的，隨著時代的改變，她和新到北方來的同事太太學會了織毛線，於是，我們一家大小的毛衣褲、毛線襪子和手套圍巾，都很快地「跟上了時代」。

到我考進天津女師，開始住讀的時候，那立式的手提書箱，竟然也是母親用自製的硬夾紙，外加一層厚布的精心製作，那獨一無二的書箱，是母親不忍心讓這不到十二歲的我，離家去住讀的心情寫照。她從來不用口頭的甜蜜來疼我。行動型的母親，用來表達感情的也是行動。

附記：

關於鐵路「唐胥段」，據淩鴻勛先生著《中國鐵路概論》中談到，從唐山到胥各莊這段鐵路是築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五月興工，十一月完成，當時是直隸總督李鴻章從事建設新海軍，並開辦輪船招商局，需要煤礦。為便利運輸，決由唐山煤礦築鐵路至胥各莊，銜接運河，以通天津。由當局派礦務局工程師英人金達（C.W.Kinder）主持其事，當時朝廷禁駛機車（認為妖物、不吉），乃聲明以騾馬拖拉，才獲批准。當時大家對軌距寬度有很多意見，幸虧金達氏堅持勸我國採用英國之四英尺八英寸半之軌距（當然也是為了英國人侵略我國礦權的便利）為當局所採納。這段鐵路十八華里，遂於光緒七年興工，開始時原以騾馬拉拖，第二年金達自製一小機車，行駛於唐胥間，不久為當時的御史所彈劾，勒令禁駛，經數月波折，才照常開行。

當時採用標準軌距，對我國鐵路日後之發展有重要之關係，不可忽視這一決定。

十七、硬體彩色「玩具」

用一九九〇年代，居住台北鬧市，卻又孤獨無比的心情，來回想自己的幼年，忽然理解到什麼叫「孺慕依戀」之情。

能有那樣的心情，是多麼幸福呢？被允許能有那樣的心情，是多麼溫暖啊！只有你在父母面前的時候可以。

當你有什麼苦惱，有什麼要求，有什麼困難，你叫一聲「媽！」就可以了。你甚至都不用說明原因，她自然就比你自己想的還多了。

當你想了解外面的世界，你跟著父親就行了。父親是孩子的榜樣，也是孩子的屏障和避風港。

當我很安全地每天吃到母親調製的各種麵食和海鮮，她幾乎是可以無中生有的做出別家所無的美味；當我可以很放心地在寒冬來臨之前，就看到母親爲我準備的棉衣與外套，我的要求就是外面的世界了。

父親代表著外面廣大的天地。我很羨慕父親的生活，他可以去外面奮鬥，那是在日常衣食以外的一些生活內容。

當久大精鹽粗具規模，有了廠房，這廠房離家近得多了。上下班的汽笛使時間有了意義。工廠爲上下班的員工鋪了一條窄窄的煤渣路，使生活有了目標和方向，那是久大精鹽工廠員工們的一條具體的「軌道」，每天早上八點，汽笛響了，父親走路去上班；中午回來吃飯，休息一下，父親再聽著汽笛離家。

時常，我會問整裝待發的父親「幾點啦？」

父親說：「兩點。」

「兩點就上班？」

父親覺得好笑：「兩點當然要上班。」

知道我這明知故問不能挽留父親在家，於是我宣稱：

「我跟著！」

「上班怎能帶你去？」父親理所當然，批駁了我的無理要求，戴上帽子，走了。

那時，職員們都戴帽子。夏天是草帽或一種圓形的硬殼「麵斗帽」（美國早期電影中，常見這種帽子），春秋天是硬沿的呢帽，冬天戴皮帽。

這天，我起先是無可奈何，站在門口，看父親走。但立刻我就決定悄悄地跟在後面。小孩子

穿布鞋，走路本來就沒有什麼聲音。何況爲了怕給父親聽到，更特別小心翼翼，放輕腳步。父親不知道後面有我在「跟蹤」，我卻是一路走，一路很想笑。一種惡作劇的心情，使自己覺得十分緊張刺激又興奮。

走到工廠，父親將要進辦公室的時候，我才笑出聲來，把父親嚇一大跳。無奈地對我看著，既然我已跟蹤而至，又沒有時間送我回去，只得把我帶到辦公室背後的一片空地，那邊放著一大堆如同小山丘一般的各色各樣的玻璃瓶，囑我在這裡玩，不要亂跑。

於是，我就乖乖地和玻璃瓶玩一個下午，等父親下班。

至今我雖無從打聽那些玻璃瓶是那裡來的，但我猜想，很可能那是一個和久大精鹽有關係的玻璃廠，屬於「下游工業」的一項成功的嘗試。這些玻璃瓶是很完整的成品而並不是殘破棄置的。它們全部都是完好無缺，嶄新的。顏色更是豐富多彩，形狀也各不相同。

印象深刻的是它們那深淺不同的綠和深淺不同的黃。最深的綠，近於墨色；最深的黃近於棕色。形狀方面，有細細高高的，有矮矮方方的。圓瓶子比較平凡，但它圓得像是削平了兩端的皮球，白色透明得好像大型的肥皂泡，很是好玩。我最喜歡的是那些見棱見角，細高而狹長梯形的，和矮矮方方多邊形的。不記得它們有沒有蓋子，只記得它們那份在陽光下的亮度。彩色的玻璃製品是非常耐人尋味的。它們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亮度，也就展現不同的顏色。我相信這些玻璃瓶吸引我的程度，應該比不上老家後園的花草；但它們另有一種來自後天人爲的新奇

感。那種堅硬的質感與亮度，以及它們見棱見角來自工業的造型，都使我這農業社會出生的小孩，用一種比較無奈而又不得不投入的好奇的心情，接近它們，欣賞把玩它們。

而且，我除了在老家時有一支「撥浪鼓」，來到塘沽以後，增加了一支畫著彩色的小竹笛以外，根本沒看見過新式的玩具。而這些玻璃瓶，無論在數量上和色彩與造型的變化上，都比一般的玩具豐富多了。

當我玩累了，就坐在旁邊一塊條石上，偶然也看見一些螞蟻。它們是那種大號的黑螞蟻，爬得特別快，比老家的螞蟻顯得兇悍多了。

日後回想那些玻璃瓶，大概是我國第一家玻璃廠的產品。只是塘沽並沒有玻璃廠。有人只記得秦皇島的耀華玻璃廠是最早的玻璃廠。但我一直相信，那些玻璃瓶的出產者是先在塘沽久大精鹽附近設廠試辦的。

無論如何，日後在化學課本上讀到關於「鹽」的工業價值，知道了「鹽」的偉大功能之一，是通過曹達工業可以做許多的化學工業產品，而玻璃和人造纖維以及染料，都是它的產品。小時候，看見工廠牆上大字寫著「副產品：碳酸鎂、漱口水、牙粉、牙膏」的時候，也只是模糊地知道「鹽」不僅是調味料而已，倒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用鹽漱口、洗杯盤上的茶垢，也洗水果，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使用著。而家中每月由工廠發下的粗鹽與細鹽，是永遠也用不完的。大部分都分送給鄉下的親友了。

至於那五顏六色，各式各樣的玻璃瓶之中，有一種成為我們日後很熟悉的東西。久大精鹽的副產品之一——漱口水，就是用那松綠色細長梯形四面體的瓶子裝的。它有一種芳芬的薄荷味道，上面貼著設計精美的廣告，小字寫著：「明星牌漱口水，使你滿口芳香，蟲牙齲齒，永不發生」。簡潔的詞句和那瓶子的造型之美，比之今天那些仍擺不脫圓柱形的瓶裝產品，像是眞有更高的創意與藝術價值，而那時代，才不過是民國十三年左右哩！

「玻璃廠」並沒有在塘沽長久設廠，它只是這些年輕工業家們推廣鹽、碱的廣大方向之一，而我和「玻璃廠」出品的邂逅，卻是把他們的產品做為我消磨長晝的玩具。不久之後，久大精鹽除了致力實驗製碱以外，也成立了「黃海化學工業社」，廠房擴充為四至六廠，「黃海」設在我們所稱的「大院」裡，「明星牌」就不僅是牙粉、牙膏和漱口水的牌子，而且是子弟小學的校名了。

十八、北方與南方

久大精鹽成立員工子弟小學的那年，我剛好達到學齡，不早不晚，民國十四年。子弟學校就設在「一廠」內，我們稱「一廠」爲「老廠」。蓋了三間帶走廊的教室。就開始號召我們去上學了。

沒想到，上學還是要考試的呢！

我隨父親去報名的時候，看見有比我先到的小孩，在前面排隊考算術。我一看那考卷，就嚇哭了。我只念過幾段《三字經》，幾句《千字文》，認識幾個普通的方塊字，可沒唸過那稀奇古怪的阿拉伯數目字。責任感使我覺得如果這學上不成，對不起父母，自己也很丟臉。

正在我哭得十分傷心的時候，那考算術的小男孩放下筆，走過來問我：「你怎麼啦？」我誠實地告訴他：「我不會寫算術。」

小男孩說：「你上一年級，不用考算術的啦！我是讀二年級，所以才考。」

哦！原來如此！早知一年級不考算術，我就不哭了。爲什麼別人不早告訴我，害我那麼緊

張！

這小男孩名叫章台華。

後來發現，他是我的鄰居。他們一家剛從江西搬來。小男孩的父親章舒元先生，是久大的廠長，他也是留日的，和久大的創辦人范旭東先生一起來到塘沽設廠。最近才接來家眷，租了井家庄和我們同一個院子的正房住著。因爲他們剛來，所以沒見過面。

章台華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

章台華的家庭、家世和我們是非常兩樣的。

尤其在那年代的北方。他們是南方人。

來塘沽「拓荒」的人有兩種，一種是遠從他鄉來的有錢有權的人。不過，這「錢」與「權」是工業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一種是無錢無權，只是憑一點技術來加入這行列的。

清末民初，有特別的一批幸運者。他們得風氣之先，由於家世或由於地緣的方便，一部分拿到庚子賠款的獎學金，經過清華學堂的一段教育而到了美國。這些最早期的留學生，後來可以說是個個飛黃騰達，在外交界、教育界、實業界、工程界、文學界，都有他們的一席之地，對他們個人來說，是全國仰望的幸運者；對國家來說，他們也是使國家在實際上擺脫舊傳統，奠定新基礎，走上新前程的一群開路先鋒。

在這批留美的學生之前，還有一批得到清末官費留日的，他們同樣是有較開明的家庭，經濟

情況也比一般人好，因此他們也得風氣之先，選擇鄰近的日本去留學。去日本留學的好處，一是距離近，可以省去很大一筆路費。在心理上，與家庭聯繫也方便些。一是自一八六七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已經相當西化，吸收西方的新知比中國提早了幾十年。去日本留學等於是通過日本的經驗去間接吸收西方文化。這一批留日的學生之中，學科學與學教育的不少；學軍事的也多。其中范旭東先生就是日本京都帝大化學系畢業。章舒元先生是日本高等工業（現在的東京工業大學）畢業，學的是應用化學。他們都是自中學階段就在日本就讀，然後考入大學的。這些早期留日的學生除學到日本的科技之外，也學到了日本的經營方法，特別是在勞資雙方互助合作這方面，日本把他們歷來所接受到的中國儒家思想，融入工業化之後的經營方式，建立起實用於更大群體的東方倫理，形成一種「工廠倫理」，在工廠當局與員工之間，培養出一份相當於家長與子弟之間的感情與向心力。比歐美的純資本主義作風要來得進步和溫厚。久大精鹽的這一批留日的開廠元勳把技術與方法運用到自己的國土上來建設與開發，發揮了更深厚，也更本土的愛國熱情，而篩除了日本機械式管理過於剛硬與形式化的缺點。

由於當時接觸外洋是從南方開始，所以這批留學生之中，也是南方人居多。我父親在開拓者之中，是難得一見的一個北方人。

不過，我們這一家正式接觸「南蠻子」還是在章台華這一家從江西搬來，做了我們的鄰居之後。

這「井家庄」難得的一棟獨院房屋，我們是最先搬來的，住在東廂房。對面西廂房起先住的是一戶河南人，不記得他們什麼時候搬走的，後來有了子弟小學，就由從「深縣」請來的校長謝笙甫先生一家住了。章台華的父親是廠長，搬來之後，住在正房三間。那正房和我們廂房之間有一道竹籬隔開，有小門可以相通。這道小門是經常開著的。小孩子們無視那「門」的存在，天天跑來跑去的玩在一起。

我們家這北方人，對他們南方人充滿了好奇。在我們生活中，從蘆台那堂皇的老家，到塘沽這簡陋的新家，算來算去，這還眞是第一次和南方人住在了一個院子裡。

我和妹妹跟這家南方人，展開了探索式的交際。

他們和我們可眞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他們說南方話。他們叫母親爲「姆媽」。他們說吃飯是「ㄑㄧㄚ ㄈㄢˇ」等等。而他們的家具和吃飯時的規矩和我們也是不一樣的。這一點，我們小孩子最好奇，也最喜歡研究。

我隨父母離開北方那規矩大得鄰里皆知的老家時，年紀很小，只記得最怕和大爺一起吃飯。不但怎麼端碗，怎麼使筷子，怎麼夾菜，怎麼離席，樣樣要我們學規矩，而且他要我們「食不言，寢不語」，可眞悶得我們哭笑不得。幸虧還有曾祖母或祖母的房間可以逃避。坐在這兩位老人家的「炕桌」旁邊吃飯是很自在的，頂多責成我們不許隨便跑開，不准掉筷子而已。

到了塘沽，我們可是大解放，一切回到了最簡單。不但由於住處簡陋，更由於母親那不喜歡

繁文縟禮的個性。她讓我們覺得吃飯就是吃飯，吃飽為止。我們那因陋就簡的飯桌放在泥土地上，搖搖晃晃，四只漆著紅漆的粗糙的方櫈，坐著也不舒服，大家也就樂得減免了那些排場。

章台華家卻是不一樣的。他們的南方規矩讓我們覺得十分新鮮。

首先，他們家的陳設比較考究，所住的正房居然有方磚 地，尤其他們那紅木大圓餐桌，江西瓷的餐具，以至於他們卧房裡的蚊帳和銀製的帳鈎，都使我們覺得「好講究」！而尤其令我們覺得新奇的是他們把馬桶放在房間裡，而且那馬桶漆著講究的紅漆，畫著細緻的花紋。這對我們北方人來說，眞是奇觀。不明白為什麼處處要排場，卻把馬桶放在屋角當擺飾。而且也許是心理作用，總覺得他們房間裡的空氣不太清新。

而最令我們好奇的是他們的早餐。

當我們這北方小孩起床之後，伸手拿個豆沙餡的饅頭或玉米麵糰子，蹦蹦跳跳，邊吃邊玩，解決了早餐之後，就喜歡溜過小門，到章家去看他們吃早飯。但見那紅木圓桌面上，整整齊齊，排好了烏木銀頭筷子和銀湯匙（我一直非常喜歡那銀湯匙的式樣，大大的正圓形匙子刻著細細的花紋，使我至今對圓形湯匙由衷喜愛），江西瓷的碗裡，盛著細緻的稀飯（細緻的感覺是因為它煨得特別久，而不見米粒），旁邊各有一個碟子，同樣花式，上面各放兩塊「金雞餅乾」。（那金雞餅乾可眞是歷久不衰。直到現在，市面上仍然可以買到。相信這是因為它的原料中，雞蛋的成分特別多，所以吃起來鬆酥可口。）此外，還有每人一杯牛奶。

章家的小孩規規矩矩，圍坐在餐桌旁。很珍惜地吃完他們份內的那一杯牛奶、一碗稀飯、兩塊金雞餅乾，稀飯裡照例由他們的母親每人放一匙砂糖，那砂糖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因爲在我家，如果用糖，則一定是紅綿糖，似乎在那樣的年代，砂糖也是一種「西化」的產物，否則我們不會對它那麼好奇。牛奶更是，不知他們怎麼會弄到牛奶。我日後回想，一定是在塘沽附近農庄，千方百計訂到的極新鮮的、由牛本身直接供應的鮮奶。

章家人的考究，使我們覺得好像看戲一樣。偶然，章伯母會發給我們這小旁觀者一人一塊金雞餅乾，那餅乾非常薄，又很小，使我們這已經吃飽的北方小孩覺得好玩，卻又未免懷疑章家的孩子怎麼能吃飽?他們的定量分配不是爲了省錢，而是爲了「衛生」。學了西化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對飲食方面的定時定量，首先實行在自己子女身上。而給我們這隨便跳著，粗枝大葉，吃飽爲止的北方小孩來說，那點東西，實在未免太「吃不飽」了。

章家的小孩和我們玩在一起，不懂得父母的職位高低和南方北方的界限。他們喜歡我們家的自由氣氛，我們沒有那麼多的繁文縟禮，我們跑跑跳跳吃早點的時候，母親在掃地，收拾屋子。章家的小孩來了，母親會把玉米麵、豆沙餡的糰子塞給他們吃，因爲她聽我們形容章家的早點，認爲章家孩子好可憐!吃不飽。起先，章家孩子不敢要，怕回去挨罵，後來也「入鄉隨俗」，知道無人會去給他們「告密」，也就樂於享用這粗豪又美味的北方食品。

我們的母親，個子嬌小，爲人爽朗，笑口常開，對孩子們一視同仁，她做菜是好吃第一，對

我們用餐的規矩是吃飽爲止。家中經常有好吃的北方魚蝦及她快手炒出來的各式小菜，對章家孩子造成莫大的吸引力，而寧願放棄那銀匙細碗，到我家來品嘗平民口味。有一天，章家妹妹竟然把我們放在灶邊的貓飯也吃下去了，當我們發現之後，大驚小怪地告訴母親，卻被母親連忙制止，一方面唯恐這小孩不好意思；另一方面是怕她回去挨駡，影響鄰居的感情。而最令母親擔心的是，很怕貓飯不乾淨，惟恐那小孩吃病了。

大概貓飯並沒有「東窗事發」。後來母親卻有點警惕，不但處理貓飯格外小心，連請他們吃自己做的平民美味，也逐漸減少，對南方先進人士的「定時定量」，倒也有了一番認識，因爲她發現，小孩子無限制的亂吃，確實也是致病之源。因吃得太多又不平衡的北方小孩，得食積的例子也是很多的。

但我們家的伙食卻眞的給章台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距離當時已有二十多年之後，大家因職位調動和戰亂播遷而各自東西，久已不通音訊。我歷經劫難，離開了家鄉，獨自來到台灣寶島，安家落戶之後的某一天，忽然收到章台華的一封信，告訴我，他在上海出國留學之前，曾在六國飯店，見到當時剛好調到上海的我的父親，告訴他說我已來到台灣，在廣播界工作，現在他拿到學位，也來到台灣工作，希望見到我。……

我按址去拜訪這位鄰居小學學長，他一見我，第一句話卻是：

「哎呀！你長這麼高，一定是吃你家大饅頭吃的！」

我對這位當年的小學長，好鄰居，青梅竹馬的玩伴。依然胸無城府，回答說：

「哎呀！小時候，我可是羨慕你家定時定量的牛奶餅乾。」

彼此相視大笑，小時候的友誼眞是永遠百分之百的天眞無邪！

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使我羨慕章台華——在我遠離家鄉，從此和父親永別之後，他倒還有機會在上海見了我父親一面。

十九、兩廠的傑出成就

小時候只知道鹽是供食用的；鹼除了可以發饅頭，做油條之外，頂多它是可以當肥皂用作有力的清潔劑。卻不知道它們有更大、更重要的用途。

鹽，除了食用之外，是一切工業之母。有了鹽，才可以用它製鹼，來振興與它有關的各項化學工業，例如人造絲和其他人造纖維，肥皀、石油精製、造紙、木漿、玻璃、染料、水泥、肥料，以至製鋁、硫酸錏、碳化鈣等的化學工業都由此發展出來。

而更重要的還有軍需工業。如毒氣、火藥、炸藥原料等，都需要鹽。

一個國家工業的盛衰，可以用「鹽」和「鹼」的產量多寡來做指標。這是爲什麼當年日本人處心積慮要拿下我國塘沽一帶的產鹽地區。

日本需要大量的工業鹽。北伐成功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這階段，日本每年需要工業鹽約一百二十萬公噸。當時有一半都是從非洲輸入日本，距離遙遠，運輸費時，運費又高，如果能得到塘沽沿海，對日本來說，那眞是一筆大大的富源了！

幸虧久大精鹽的開拓者們早有先見之明，自日本留學歸來的這幾位志士，在日本時就已洞悉日人對中國的野心。爲了盡早開發這潛力無窮的沿海，篳路藍縷，不計個人得失，破除萬難，先從製鹽的工業起步，緊接著就積極地發展製碱工業。

做爲一個有偉大抱負的工業家，需要雄才大略，不以賺個小錢，發個大財爲目標。他們做的是實業。大目標爲國，小目標爲民。內心眞正的滿足是發揮了自己的才能與志願。久大精鹽創辦者范旭東先生實在不僅是一位工業家，而更和他的兄長范源濂先生一樣，是一位教育家。

久大精鹽，是用恢宏的氣度，遠大的眼光來經營的。員工與經營者不是「勞資」的關係，而是「合作」的關係。其間沒有剝削與奴役的成分。對待員工，從衣食住行、育樂，到醫療以及員工本身的在職教育，到員工子弟的教育，一律在經營照顧的範圍之內。

於是，全廠員工變成了一家人。工廠是「家」。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不計較職位高低，不擔心待遇好壞。當永利製碱開工初期，遇到瓶頸，不能順利出貨，永利的員工拿半薪，久大的員工也情願拿半薪，「共渡難關」，沒有人使出「本位主義」去抗爭。主要是大家看得清楚，工廠當局獲利均霑，員工與廠方禍福與共，所以大家有志一同，不分彼此。結果製碱成功，使當時壟斷中國及南洋市場的英商「卜內門」洋碱不得不豎起白旗，不但退出了中國市場，而且連南洋市場也被迫同意與永利聯營。

據民國廿三、四年，實業部國貿局編印的《中國實業誌》記載：

久大精鹽公司爲吾國現在最大之精鹽營業，倡立於民國三年。初時資本僅六萬元（一說是五萬元），每年產量三萬擔。現在（民國廿三、四年）資本已達二百五十萬元，產量五十萬擔（約三萬噸）。……民國十四年，因戰事關係（按，係內戰。時北伐尚未成功），營業稍形減色，但所派紅利，尚在三十六萬元以上。該公司又爲永裕（製鹽，在青島）、永利（製鹼）二公司之最大股東。……

談到當時久大精鹽的員工，民國初年的人工低廉，塘沽是沿海荒村，土地貧瘠，無法耕作，少數人靠漁撈爲生，也相當困苦，很多工人根本就是乞丐，談不到技術，但他們的體力可用，負擔鹽廠工作也算可以勝任。工廠把他們找來做工人，是以「有飯大家吃」的心情，和工人打成一片。不但建廠初期，各種櫛風沐雨的艱苦工作，職員和工人彼此「有志一同」；而且盡量爲工人謀福利。在工廠賺錢的情形之下，並不把錢飽入私囊，而是除了擴充設備，增建廠房之外，很快地爲工人建了「工人室」。這「工人室」並不僅是一個「室」，而是一個佔地頗廣，很具規模的「活動中心」。裡面包括了供應日用品及食品的福利社、伙食房、醫療室、讀書室等等。而最有趣的是，院子裡還有許多運動和遊戲的器材。其中有兩個特別高大的、適合成年工人們玩的秋千，給我印象至爲深刻。它使年幼的我對它「仰之彌高」，連爬上去坐坐都難。另外還有特別粗壯的「悠木」、「翹翹板」之類。如今想來，這幾位實業家是把那些文盲工人們當小孩來教育及

照顧的。這眞是極有遠見的大手筆。

後來更開辦了員工子弟小學，招收所有的員工子弟，也收當地不屬於工廠員工的學生，員工子弟免費讀完子弟小學，到外埠去進中學之後，學雜費由工廠補貼百分之七十。

職員及工人的宿舍也陸續興建完成。電廠和自來水廠也都附帶建立起來，不但供應自己的工廠，而且供應塘沽全鎮。

冬天北方酷寒，員工家裡照例由工廠免費供應開灤煤（後改爲山西無煙煤）。工廠不但負責安裝火爐，並且定期爲每家清掃煙囱。醫療自然免費，種牛痘、預防沙眼等基本保健都由醫療室主動辦理。後來醫療室擴充爲頗具規模的附屬醫院。婚喪嫁娶等人生大事，也有總務處固定的「班底」，提供地點、人手，包辦布置、招待、儀式的進行，以至於筵席、雜務等等一切，無須個人奔走張羅。

員工的薪水按年資自動調整之外，工廠並規定每月從個人薪金中扣百分之幾的「儲蓄金」，再由工廠給以相對的數目，一併存入。如有急需，可以提用。平常存在公司生息，將來再用。每年的紅利大家有份，帳目公開。

其他像陸續增設的俱樂部、網球場、花園、兒童遊戲場、夏天的露天電影，辦公室下午的免費點心或水果，以及公費休假旅行的優待，年輕職員公費出國進修的鼓勵等等，眞是無一不備，使員工們都希望不但自己效忠，而且子女們也能世世代代在這工廠工作。

值得深思的是，公司對員工這無微不至的照顧，並非為了有什麼「法」的依據；也更非為了「怕」工人抗爭而才不得不如此。事實上，那些原來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工人，根本離反抗或爭取的程度還很遙遠，原不必為他們多所開銷。而廠方竟然如此地把原來一無所有的工人照顧到「冠」「冕」堂皇。津沽一帶，提起久大的員工，莫不眼前一亮。而這份照顧工人的原動力，只不過是「動之以情」的「情」字為出發點而已。

民國初年，那幾位尚能親沐中國傳統遺教而又留學日本的工業先驅們，在研習科技之餘，不免也受了日本式儒家古風的薰陶。加以自己國家深厚的文化傳統，一定使這些年輕的工業志士深諳孟子所說的：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眞諦。人同此心，大家「不言利」，資方待勞方以「情」；勞方報資方以「義」；「利」並不是維繫雙方合作的主力。

久大、永利兩廠的勞資合作特別顯揚了中國式經營理念由「情」與「義」做出發點的傑出成就。

在「勞方」與「資方」這兩個名詞未被廣泛使用之前，中國人對這類合作關係稱為「賓主關係」，或「東夥關係」。長遠的「賓主關係」則稱之為「老東舊夥」，強調感情的累積，而軟化雙方對立的心態。把最易於鼓動人性中貪慾的「利」字避開，在心理上就不會產生敵意。而西方

式的分門別類設立名詞，把中國客客氣氣的「賓主關係」劃分為壁壘分明的「勞方」與「資方」。使雙方關係只建立在「利」的取予，而強烈的暗示了雙方勞逸與得失的不均或地位上的不平等，難怪會成為糾紛之源。

大家常認為共產主義是煽動群衆，製造階級鬥爭的能手；其實，資本主義「利」字當頭，也會使勞方與資方在意識上產生對立。中國人在這兩大外來的主張之前，忘了問問自己，我們自己有沒有更高超的用人哲學，在久大、永利兩廠的管理方式來說，因為創辦者和他們的同事們大都是留日的，他們從日本經驗中有些心得。但實際上，日本經驗有更多是得自中國儒家的「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的傳統倫理。

久大、永利兩廠可以說是「中國式現代化」或「中國式工業化」的成功的典範。

二十、貝殼、童戲

說與章台華「青梅竹馬」，是百分之百的正確。

他長我兩歲，是當時子弟學校同學男生之中，少數不對女生惡作劇的「好人」之一。也許是他父母對他們的教育成功，他是個小小的君子。喜歡唸歷史、看小說，卻從不向人炫耀他的聰明；也從不使人記起他父親的廠長身分。

我們來自同學的感情遠不如那來自鄰居的感情。他喜歡在我家玩。記憶中，他總是大清早就來了，坐在我家炕沿上，和我聊天，看我母親掃地。大概因爲他實在很羨慕我們家那輕鬆自在的生活，所以有一次，他說：

「我到你們家來住，好不好？」

我覺得這也不錯。就幫他向我母親「申請」。母親笑說：

「人家章伯母可捨不得哩！」

章台華脾氣溫和，玩遊戲不在乎輸贏，我們常常玩一種用手心手背輪流接住五個小石子的遊

戲，有時是用一些豆子包在布裡縫著，其實用蠶豆也可以，不過，用布縫的比較柔和好用。把它們拿在手心中，丟起來，用手背去接，然後再把它們接回手心。接住數目多的爲贏，從手背上滾下去的爲輸。小男生的手不如女生的柔軟有弧度，當然是我贏的時候多，所以從那時我就知道，輸家有時比贏家討人喜歡，因爲他使別人從他的失敗中得到快樂。

我們也一起玩一種叫「上酒樓」的遊戲。在紙上畫些路線，能先登上酒樓者爲贏。五子棋也是這種靜態的遊戲之一。在動態的遊戲中，我們玩「跳房子」，這也是我的「拿手」遊戲，直到我十九歲，去鄉下教小學的時候，仍然常和學生一起「跳房子」。章台華對我「跳房子」的「貢獻」是盡量把撿到的最好的「瓦」送給我，其中有一塊正方形的瓷「瓦」，不知怎麼會那麼整齊，約有三寸見方，四緣如同刀切的一般，正中間有一個燒好的印章，紅色的，可惜上面寫的究竟是什麼年份，當時不懂，現在也沒有印象，只是那像豆腐乾一般的紅線條圖案，點綴得那瑩白正方形的瓷「瓦」十分精緻悅目。這些被我們用來做「跳房子」表示「所有權」的標誌，大部分是一些摔碎了的瓷器碎片，碗盤的底部最平整，也最受我們喜愛。但像這樣又大又方又整齊美觀的「瓦」，卻是極不多見的。我珍惜地使用了好久，以我「跳房子」的技術，不知蓋了多少房子，後來當然也不知所終了。它給我印象十分深刻。不但因爲它是我「跳房子」最得力的幫手；而且它那屬於高級瓷器的質感與它明亮的線條與顏色，都在我心中隨著歲月的增長，而越來越清晰。

因為章台華和我既是鄰居，又是同學，所以常有機會一起去學校，又一起回來。那綠色的帆布書包也是「新學制」之下的產物，把那寬寬的帶子斜揹在肩上，小孩子走路總是蹦蹦跳跳，寬鬆的書包就會在身旁或背上輕輕地拍打著我們。書包裡的「內容」實在很少，一兩本教科書之外，有個薄薄的石板，石板比書本略大一點，旁邊圍著本色的木框，有一、兩支細細的石筆，和一個小小的板擦。這套文具是我們的最愛，因為它可以允許我們任意在石板上寫寫畫畫，然後又可以不留痕跡地擦個乾淨，那是我們上國語課和算術課必備的用具，但大部分我們是用它畫小人。放學的時候，我們沿著一些人家的圍牆走著，那圍牆外面總是有高出地面的一條小小的土路，那小路很狹窄，因此我們自然而然是緊靠著圍牆走。塘沽原始的建築都是土坯。土坯是用泥巴和著麻刀（用鍘刀鍘碎的麻）加水製成的，所用的水是海水，所以裡面有非常多的大小貝殼。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多。你很難想像有那麼多的貝殼在泥牆上嵌著。它們並不是刻意用來做裝飾或加強土木的堅固的，它們就是那麼自然而然隨著海水和在了土坯裡，又在建好了的牆上凸顯出來。於是，這些貝殼成了我們這些小學生走路時的採集對象。

小孩子們，一路走，一路把所見到的形狀特殊、顏色好看，或最玲瓏可愛的貝殼從土坯牆上剝下來。真得感謝那天然形成的點綴，如果是現代，用水泥膠在牆面上的任何裝飾，都休想用孩子們的小手把它剝下來。而我們那時的採集卻是容易極了。

各式各樣的貝殼，絕大部分都很完整，有螺旋形的，有圓形的，有一種如同一個逗點形狀，

純白透明的，我最喜歡。它只有像一粒豆芽那麼小，但形狀整齊光潤，那玲瓏乖巧的模樣，像個溫柔的嬰兒。眞感謝做土坯的工人，肯那麼輕手輕腳，居然很少把它們壓碎，如果是現代，一切使用機器來做，即使是土坯，恐怕也不可能保留下任何一枚貝殼的完整。其他有些像泰國廟宇一般尖尖的椎形的，最多數的是一種圓圓的扣子形的，上面整齊的螺旋紋，像個小小的「螺絲轉」燒餅。

這些貝殼的顏色繁多，有乳白、深紫淺紫、粉紅、深棕淺棕等等，由於它們體積都很小，我們幾乎天天都找到一些帶回家，卻絕對不會使那牆面變成坑坑洞洞。

這遊戲，大部分是在夏天。因爲夏天白天長，放學回家的時候，太陽還有好高，我們可以有很多的時間，揹著書包閒閒地走著，一面找貝殼，一面踢石子的玩著回家。

簡樸的生活，其實是很藝術的。工業化的腳步雖然正以銳不可當之勢，迅速的逼近，而久大精鹽正在努力使國家擺脫落後與貧窮，以便跟上時代，希圖在國人的自覺與努力下，與列強的聲勢相抗衡。我們這批小孩，能在趕搭上這「全盤西化」列車的同時，仍然把握住那古老時代的夕陽日落，看見那「無限好」的黃昏美景，實在是一種可貴的幸運。尤其是我們這些久大精鹽的員工子弟，趁著父親那一輩胼手胝足，爲工業化去改革與奉獻，我們卻仍然有豐富的閒情，能撿到骨董一般的碎瓷片，做「跳房子」遊戲的「瓦」；放學時，有天然的貝殼讓我們把玩。而在這同時，我們親眼看著在雨中變得濕滑難行的黃泥地，逐步地鋪上了用工廠燃料燒剩的煤灰渣所做的

路面。工廠的煙囪一個又一個的矗立起來，火車的汽笛聲中，加入了上下班的汽笛。工廠有了自己的「發電機」，設了自己的「電燈房」之後，大家裝了電燈，儘管那紅紅的鎢絲燈泡，度數微弱，但還是毫無疑問地取代了煤油燈那搖搖顫顫的微光。

下雨天的油紙傘逐漸取代了斗笠。腳下的膠泥也逐漸因爲有了橡皮雨鞋的防護而不再困擾我們，當夏天那事先毫無跡象的「闖雨」倏地來臨時，我們也不再用頑皮的心情去嘲弄牆外那慌張的行人了。

燕子倒還是每年按時回到我們這黃土院落的屋簷下來築巢。春雨中，院子裡的小菜圃，還是有許多青芽悄悄地冒出來，興奮的春季旅行，到「西廠」去看看桃花及聞聞那泥土的清香，還是我們每年一次的大享受。

而在這同時，塘沽那很原始的建築工人，卻被工廠徵召來打地基，開始爲員工興建新式的宿舍了。

海風中，太陽下，秋雨裡，嚴冬的風雪中，記錄著我們的童年：

功課完畢太陽西，
手持書包回家去，
見了父母行個禮，

父母對我笑嘻嘻。

新式的學生歌伴隨著「新學制」，簇擁著我們迅速地成長。

擺脫了「出必告，入必面」的古式倫理，我們改變了尊敬親長的方式與言詞。連「鞠躬禮」在當時也是令長輩們驚訝而手足無措的「新發明」呢！

廿一、地址與門牌

久大精鹽與永利純碱齊步前進，業務穩定成長，員工的生活與子弟教育得到了基本的照顧之後，就開始興建員工宿舍了。

「長幼有序」，久大精鹽的員工宿舍先動工。永利碱廠隨後。

蓋房子的工人用大大的「夯頭」（「夯」音ㄏㄤ），四周穿著粗繩，圍成一圈，唱著歌「砸夯」的景象，給寂靜的塘沽，陡然增加了活力。工人用他們那粗獷又單純的聲音，大家齊聲高唱：

「砸夯！嘿呀嘿，嘿嘿，嘿呀嘿，二來喲！」

圍成一圈的工人，先是運足了氣，在歌聲中算準了節拍，大家一起把繩子拉直，使那石臼般的「夯頭」凌空揚起，再藉著地心引力落下。「砸夯！」二字佔一小節，是引子，第一個「嘿」字是爲了使力而把「一」字用「嘿」來取代，然後從「一呀嘿」……到「二來喲」，是第一個起落動作到第二個起落動作的完成。在周而復始之際，可以隨興加入歌詞，只要拍子不變，就不會

影響到動作的整齊劃一。

那男性的直率呼聲，響在塘沽那臨海的廣闊空間裡。而隨著那歌聲起落的「夯」，被拉著四周粗繩的手臂隨著同一拍子舉起；又隨著同一拍子落下，打在地上，發出「咚！」「咚！」的沈重的聲音。而隨著那聲音，本是黃泥的地基就越來越堅實了。

大的地基是由許多人合力一同打的，用「大夯」。有十幾二十人同打。打的時候要由「掌夯」的人來帶頭發號施令，是「起夯」與「落夯」的重要關鍵；也是歌聲的依據。而較小的地方是用「小夯」。每個工人手中一個像石杵一樣的「小夯」，上面是一個十字形的把手，這種「夯」是用各自的拍子打的，聲音細碎錯落，另有一種美感。無論用那一種打法，都是令我們小孩子百看不厭的一景。

歌聲和「夯頭」打在地面上的聲音，響在藍空下，是力與美的結合，也是希望的所寄。建設就是這樣用最原始的方法開始的。

當時在讀二、三年級的我們，在不能想像未來有何發展的情形之下，看工人「砸夯」，就成爲我們另一項新穎的生活內容。

房子是用磚蓋的，不用土坯了。

站在夕陽下，看泥匠、瓦匠很有技術的砌牆，奇怪他們怎麼那麼準確，用「抹子」把那紅磚隨手一敲，敲掉一截，剩下的就正是他所需要的尺寸，而他們砌牆的速度很快，那磚頭拿在他們

手中似乎很輕的樣子，三下兩下就砌起很高的一段、門、窗的木框就在砌的時候，很合適地嵌在中間，那一面砌，一面用白灰一行一行的抹著灌縫的手藝，也使我們十分欣賞，紅磚牆，在白灰的線條之間，顯出了漂亮的圖案。雖然父親說，這紅磚的價值還不如老家房子所用的青磚；用白灰灌縫也是低級工程，老家的房子不用白灰而是「磨磚對縫」的，講究多了。但我們仍然充滿好奇地期待著這從打地基開始的「新式」建築的完成，將來是既不同於井家莊那黃土院落，也不同於老家的「大瓦房」。它們是兩排同式的小磚房。每戶有三間或五間正房，一間書房，形成坐北朝南的一個L形。南房兩小間，分列大門左右。一間是下房，一間是廚房。角落上隔出一間有抽水馬桶及水泥浴盆的衛生間。（想想看！他們有多先進！那才是民國十幾年呢！）小小的院子，鋪了水泥地。木製門窗，漆上綠色的油漆。西牆邊是一個長方形的煤池，專爲冬天儲煤，以備升火取暖之用。

塘沽新村的建設比廠房在技術上要簡單多了，但費事的是要打一口井。並且蓋了一座三層樓高的水塔。來提供住戶自來水。這在當時的中國小鎭上，眞是創舉！

房子蓋得剛具雛形，我們井家莊的房子卻是已經到期了。

不得已，我們一家五口，包括我和妹妹，以及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弟弟，要在那新村的房子尙未正式完工之際，先搬進去住。那兩排房子，後排十七號是邊間，也是可以最先整理出大致眉目的一戶。院牆和衛生設備尙未完工，三間正房卻是勉強可以棲身了。於是，我們成爲第一戶搬進



這是「塘沽新村十七號」牆外。

第一批員工宿舍落成，我們是第一家搬進來的，父親站在新居牆外，拍照留念，神情輕鬆和悅，十分溫和，充分流露出他日常待人接物的本色。

「新村」的人家。

新式的房子已經不再沿襲北方使用的「炕」。那種用磚或用土做成的長方形的「炕」，是在「床」尚未普遍以前的大型卧具。小戶人家大部分是用「土炕」；講究一點的用磚炕。有錢人家所使用在炕邊的木製「炕沿」材料也好一些。炕的前下方，踏腳用的「炕櫈」也考究些。燒炕在外屋，看不見灶口。而簡陋一點的就在房間裡，炕的本身下面就有「灶口」，內部有通風道，把燒炕時的暖氣傳過去，使炕熱起來，冬天睡在上面可以取暖。不過有時因爲炕太熱了，會影響人們體內水分的平衡，而北方冬天本來就缺少水果和青菜，所以經常會出現因缺少維他命C而引起的疾病。

現在，塘沽新村在「住」的現代化方面也是得風氣之先，不但取消了炕，而且有了衛生設備，又爲了水的供應方便而動工鑿井，蓋了水塔。當然，這一切的成爲可能，最基本的動力，是工廠已經可以自己發電。有了電，才有了這一切。那時，我們對「電」的認識只是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電燈」。所以大家都把工廠那附設的發電廠，稱爲「電燈房」，好像它只是爲電燈而設的，其實，當那樓高三層的水塔建好之後，我們才發現那「水塔」的最下一層最高，整整一間，從上到下，是一部大型的馬達，又寬又高的履帶在電力的帶動之下，不停地轉動，那聲音「噠噠」地響著，把井裡的水打到水塔頂上那大型的水箱裡，再經過地下的水管，通往各住戶。有了自來水，才談得到衛生設備的使用。

在這一系列「水」的設備尚未完工之前，我們一家就搬進了「塘沽新村十七號」。別人說，那牆還太潮濕，那地也還需要再加一層「洋灰」，廁所也還沒有弄好，總之，還沒準備齊全，不宜居住。這一切，我們都知道，但我們必須要搬了，否則那「井家莊」的房東要我們再續租一年。

為了解除那邊房租的負擔，我們在一切尚未齊備的情形之下，搬進了剛具雛型的新居。困擾我們的並不是一切尚未齊備，而是這新居還有許多舊日的「居民」，尚未來得及搬走。這些舊日「居民」種類繁多，它們不同於老家當年的「五大仙」，它們是「衆小仙」。有許多是我們以前見所未見的小爬蟲。

蠍子、蜈蚣這兩種毒蟲，老家雖然也有，偶爾也會看見它們在陰暗的角落出現，但絕不會有這麼多。它們成雙作對而來，在牆壁上，在地上或台階上迅速地爬行。電燈尚未裝好，到了晚上，它們會侵犯到我們的木板床上來。僅有的避免他們過分猖獗之法，是盡量把床離開牆壁，並多灑一些石灰在床的周圍。但這也並不能百分之百杜絕它們的偷襲。還有一種形狀很像蜈蚣，但比蜈蚣略「胖」的蟲，兩整排的腳也更細長一些。身體不像蜈蚣那麼堅實，也不那麼紅得發亮。它們不太咬人，至少沒有毒，顯得和善些。還有一種也是多腳有節的蟲，個子比以上兩種短小，看來像是比較「和氣」，但它們頭上有兩個小小的螫刺，被它們叮了之後，皮膚上會出現兩個像針尖一樣大小的紅點，毒性不大，卻使你痛癢。我們稱這種小蟲為「二夾子」，他們數目較多，

但不像蠍子、蜈蚣那麼可怕。偶然也會出現壁虎，北方的壁虎，個子很小，爬得很快，母親說，他們是吃蠍子的，所以把它們做「益蟲」看待，只是要避免被他們的「尿液」沾到就是了。

至於說蜘蛛、蚊蟲、蒼蠅等等，倒眞的不像這些「地面部隊」那麼難纏，用不著爲它們大驚小怪了。

人，是非常有彈性的；也是非常容易被寵壞的。在不得不與各種蟲類爲伍的時候，我們也只得在夾縫中生存。也許要憑著更多的幸運，才可以僥倖未被毒蟲螫死，但這「幸運」似乎也並不是那麼難得的，因爲我們一家五口，也就在那樣的「危機四伏」之中度過了原始與「現代化」之間的那一段「隘口」。像傳說中的鯉魚跳龍門一樣，「跳得進，變隻龍；跳不進，還是魚」而已。巧的是，當時我們的小學裡也正在教這首歌。

我們在一段與蟲類互爭地盤的日子過後，算是「跳」過了「龍門」，我們正式有了地址與門牌——「塘沽新村十七號」。小小的綠門，洋灰地的院子，有抽水馬桶的衛浴，旁邊「打井的」王師傅，天天負責自來水塔的滿水，廚房不再燒柴，而用了燒煤的「高灶」，父親可以騎腳踏車上下班，我們是正正式式，走入「現代化」了。

廿二、明星小學貴族化

我的老家蘆台屬於「冀東」。冀東人說話在四聲上和國語有一些差別。和只有一小時火車路程的塘沽的口音也完全兩樣。中國的方言是很多的，由於交通不便，常使近在咫尺的人們也說著不同的方言。所以儘管我的老家蘆台，新家塘沽，以及塘沽話的發源地——天津，和國語的發源地北平都在同一條北寧路上，相距總共也只有六小時車程，但這三個地方說話的口音卻是三種各不相同的四聲。

開學第一天，我的蘆台口音就引起同學的哄笑。於是我哭著回家，說不要去上學了。父親安慰我說：「怕什麼?塘沽話在我們聽來也一樣可笑。以後你聽班上那一位同學說話好聽，跟他學就是了。」

如今想來，我的選擇力不錯。當時就選定和我鄰座的馮以玉。覺得她說話的口音最好聽。沒想到所學會的竟然就是日後受用無窮的「國語」。當時政府已在推動以北平話爲國語，而且「明星小學」已得風氣之先，一年級就教注音符號。這眞是很可貴的。

馮以玉是杭州人，在北平長大，說的是一口軟軟的北平話。她的父親是工廠重金禮聘來的廠醫，也是塘沽這「苦海鹽邊」小荒村有史以來第一次見到的一位西醫。

留日歸來的馮大夫是全科大夫，樣子十分高貴。他那整潔考究的西裝，白淨的皮膚，閃亮的眼鏡，都是令人仰望的標誌。因爲他太「貴族」了，土土的當地人找他看病，可需要不少的勇氣——怕馮大夫嫌髒。尤其是工廠尚在草創，當地工人絕大多數是文盲，而且衣不蔽體的現象一時尚未改善。當他們因衛生條件太差和衛生常識欠缺而眼睛發炎或皮膚生瘡而必須就醫的時候，馮大夫那完全不沾一點髒東西的，受過醫事訓練的外表，就會使那些工人望而卻步。相信一定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那些當地的「土」病人不敢去找他看病，而情願使用土法偏方和江湖郎中打交通，暫時辜負工廠這番促使地方「現代化」，改善醫藥服務的美意。

朝向工業化邁進的塘沽，在久大、永利兩廠的帶動之下，給人兩種不同的印象。第一個印象是胼手胝足，苦幹實幹的工業界特有的開拓精神。第二個印象卻是由於它帶來各方面的先進與經濟的繁榮，在員工福利方面，所衍生的「貴族化」的傾向，「明星小學」就是明顯的一例。和馮大夫給人的印象並駕齊驅。

「明星小學」之成爲「貴族小學」，並不是因爲工廠方面有意把這子弟學校辦成貴族化。它的「貴族」作風，可以說有一大部分是被老師們鑄造而成的。

明星小學老師的待遇比天津一般的市立小學整整高出一倍。而他們由於是在鎮上唯一的一所

經費來源充裕的小學，久大精鹽工廠的創辦人范旭東先生的辦學方法又是當時教育總長范源濂的一脈相承。他們二位是兄弟。范源濂先生在我國現代教育史上是一位功勛彪炳的教育家，早年在日本就已幫助留日同學興辦「法政學校」，希望從基本上改革中國的教育。回國之後，曾四度任教育總長或部長。「明星小學」間接受到這位教育家的影響，因而充滿著「現代教育方法實驗小學」的意味，基本上就不受舊式法令規章的約束，完全可以由辦學者自行其是。

比如說，五年級開始學英文，至少在民國十幾年代的天津市立小學是夢想不到的事。

學校的高薪及現代化的設備，包括新式的遊戲器材，都使這所小學有更好的條件，吸引更好的師資，也使它成為遠近眾所羨慕的一所小學，卻也形成了始料不及的「貴族化」。

而馮以玉這個小同學，從一年級開始就在無形之中成為這「貴族小學貴族化」的一個典型。她在醫生之家飽受嬌寵之外，每天穿不同的衣服上學。花色質料，在在與眾不同。因此她變成老師「諂媚」的對象。這「諂媚」的動作，包括為她隨時加減衣服，帶她上廁所，下課時逗著她玩，並且要認她做乾女兒。冬天下雪的時候，我們一般小孩在風雪中走路回家，老師會把馮以玉一路送到校門口，醫生有自用的人力車在門口等待。老師看著她上車，幫她蓋上毛毯，放下棉車篷，才放心地回去。而這些鏡頭，反映在我們一般小孩子眼中，先是覺得好奇，後來，就未免有點懷疑——為什麼他們坐在自用包車裡，把腳鈴踩得「叮鈴叮鈴」地響著揚長而去，而我們要在雪地上與寒風對抗著跋涉回家呢？而為什麼老師要那麼專誠地把他們送上車呢？當寒風催出了我

們冰涼的眼淚，連圍住口鼻的粗毛圍巾上都是冰花的時候；當我們拿著上習字用的銅墨盒的手，凍得特別痛的時候，爲什麼沒有一位老師來關心我們一下呢？爲什麼在學校一起玩鬧的小朋友，當她一登上那裝著閃亮銅車燈的包車之後，就和我們截然地分開了兩個世界，比我們高出了那麼多呢？

至於說，在學業方面，爲什麼明明我的分數和馮以玉一樣，甚至有時還多一點，而上台接受獎勵時候，總是輪到她而輪不到我呢？

小孩子不會去分析那感覺，但心情上卻總有一些小小的問號，這些小小的問號對我產生的作用是一些反彈和激勵。例如，我會告訴自己：「我沒有包車，我爸爸不是醫生，但我爸爸比那拿著冷冰冰的聽筒給我聽診的馮大夫可愛多了。」

而在我心中所形成的幾條小小的結論是：「我要做個最會刻苦上進的好女兒。我要更愛我們全家。而且，我要讓老師知道我雖沒有包車，但我有我的聰明。……」

這種種模糊的、天眞的，卻也帶著許多問號的想法，大概塑造了或加強了我某些相當特殊的個性，表現在我日後的生活態度上。但眞正使我至今感到欣慰的卻表現在當時我和馮以玉的「化敵爲友」。當我忽然自動放棄了與她在分數與獎勵上的斤斤計較，認可我在這方面比她差而情願用坦然的心情和她做朋友之後，那種釋然於懷的快樂眞使我得到了「解救」。那不知從何而來的一個屬於小孩子自己所下的決定，所帶給我的輕鬆之感，在我心中，至今都不曾淡去。

但這小小的決定並未使我淡忘有些同學在班上所受的歧視。

老師對班上的同學，好惡分明。而這「好惡」不完全是基於學生的是否用功或品德的好壞；而更有一部分是基於學生的家世與他們是否工廠員工的子弟。

因爲「明星小學」是塘沽唯一的一所像樣的小學，除它之外，塘沽當地剛剛辦了一所「兩等小學」。這「兩等小學」位於關帝廟後面，校舍通過一個高高在上的月台，從關帝廟的偏門進去，外面廣場就是操場。設備簡陋，也談不到正常的教學。所以當地人也希望能進「明星小學」。

工廠當局並不歧視當地人，經過測驗之後，同樣地把他們分入不同的班級就讀，老師卻對這些當地人有不少的成見。因爲一來，他們是「寄人籬下」，先天上缺少一份背景；二來，他們有一部分人由於家長教育程度比較差，氣質方面自然不如工廠高級職員的子弟。老師對待這些學生在態度上，就有很大的差異。常見這些學生被老師揪著耳朵站起來，接受體罰或打手心。有兩個姓劉的兄弟，更是挨打受罰的典型。他們都是高個子，坐在後排。被老師打的時候，常是紅頭脹臉，流下的淚水和汗水混著臉上的汙泥，那狼狽可憐的樣子，給我印象萬分深刻。這印象，使我日後在教小學的時候，不但刻意避免歧視功課不好或家境較差的學生，而且更要多花一點時間去關心他們的身世背景，使他們多得到一些了解與照顧。我覺得，對一個孩子來說，在教室受歧視是最大的痛苦，無論這歧視是來自課業還是來自家境，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都不應該如此殘忍。

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對「明星小學」的印象並不好，雖然在學業上，它給了我嶄新的啓蒙教育，讓我一生都受用不盡；但它使我切身體會到的那種人與人間，無形的不平，這不平的感覺，抵銷了我對它感謝的心情。

廿三、嶄新的日子

員工宿舍第一批建起來了，取名「新村」。

塘沽全是碱地，大地到處龜裂，草木不生。要想種植花木，先得從三里外的鄉村——「西廠」運來「甜土」。「甜土」是居民爲了有別於被海水沖漬過的本地「鹹」土而隨便簡稱的。這些「甜土」不僅運到「新村」花園，爲種植大量的花木做爲基礎，也分運到各個住戶院中的花圃，以供住戶們自己美化環境。

父親看中這屬於「新村」後排的「邊間」，是爲了門前那塊三角形的空地。它的面積只相當於蘆台老家一層四合院的半個院子，但對父親來說，已是聊勝於無。搬進來之後，就在人行小路之外，塡滿了新土。父親興高采烈，親手種植了一圈垂柳和整排沿著圍牆的夾竹桃，又在邊緣上種了低矮的馬蘭草。院子裡，除在花圃種了容易生長的鳳仙草及開花最多的野茉莉之外，還種了潑辣又嬌艷的「太陽花」。塘沽充足的陽光最適於這種小花，它有個由小孩子們賜贈的渾名，叫做「死不了」，言其生命力之強，無論多麼惡劣的環境，它也可以存活。其實並不然，如果沒有

陽光和「甜土」，它是不能存活的。

父親對老家的懷念，表現在他所熱心選擇種植的花木上。他爲遷就塘沽的環境，所選種的石榴樹、無花果和白色的南茉莉，都是老家就有的，此外，他種了各種顏色的牽牛，北方的環境對牽牛花很優厚，它們的顏色不只是紫色，而是粉紅、明藍、深紫、淺紫、白，以及混合成不同線條的雜色，後來，這牽牛花變成塘沽最普遍的花，野生在各處有籬笆的地方。

我們逐漸熟悉這雙手萬能所創造的新環境，親自體驗從無到有的快樂與信心。那通往花園的地方，特別建了一座拱門，上面刻了兩排大字，寫的是：「支配環境，渡過難關」。

當春去夏來，塘沽就每年都更進一步的生氣盎然了。「塘沽新村十七號」從此成了我一生最熟悉、最可愛的地址，從它逐漸完成，到我們倉皇搬離它，正好是從北伐成功到七七事變。

患難之中建立起來的感情，這「新村十七號」一磚一石，都曾和我們共度自簡陋到繁榮的歲月。小小的院落，兩扇給我們帶來無限安全感的綠漆小門，「門雖設而常『開』」的自由安全的居住環境裡。弟弟妹妹一個接一個的出生，看著他們脫離襁褓而可以跑出跑進，和鄰居的小孩到「前排」去嬉戲。「前排」是一個設有許多遊戲器材的大範圍的廣場。圍牆外的塘沽小鎮，也由於工廠的興盛而走向繁榮。那孤零的「海家小舖」不再孤零。各種店舖一家家地開起來，漸漸變成了整條的「新街」。「新街」上有了飯莊、茶食店、洗澡堂、鞋店、布店、中藥店、水果店；也有了一家戲園，偶然會有從唐山來的評戲團來唱幾齣「今古奇觀」裡的戲。新街鋪上了爐灰渣

的道路，不再泥濘了。

新村裡住的都是兩廠員工眷屬。他們的小孩很幸運地受到最現代化的照顧。明星小學下課之後，小孩子們回到自己的家，放下書包，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前排」遊戲去了。那裡有比學校還寬敞好幾倍的場地，設有秋千、翹翹板、悠木、窗梯，還有最前進的「沙坑」，從海邊運來大量的白沙，專爲孩子們發揮想像力之用。大家提著小桶、小鏟跑來，玩得不亦樂乎。

廣場靠圍牆的一大片地，做了兩個網球場，兩個籃球場，玩籃球的大部分是小學高年級的男生。玩網球的則是公司的高級職員。這些天之驕子的久大永利的職員，得風氣之先，接觸到來自西方的球類運動。網球場上的這些人們，穿上運動服，戴上球帽，你會從他們身上感覺到時代那快速的腳步，不到十年的時間，他們已不再是清末民初那留著髮辮，穿著長衫與布鞋的舊式中國人了。

成果是自己努力得來的。工作忙完，工作餘暇的時間就是這麼響亮。

除了戶外的運動場地之外，更時髦的是「塘沽新村俱樂部」，這俱樂部設在前排「二號」。和其他宿舍同樣的院子，裡面卻是整排打通的一個大廳。除了聽音樂和下棋、看報的地方之外，最具特色的是一個撞球枱。當時它不叫「撞球」而叫「枱球」。鮮綠的絨布枱面，襯著滾圓發亮的球。打球的人給我們的印象眞是十分「紳士」，而他們也的的確確，所追隨跟進的全部來自西方，你再也不想揣著袖子踱方步，更別提躺在炕上抽大煙了。

這一切，全是由於一個理想。創辦「久大精鹽」的留日學人號召來大批的同學和留美歸國的同「志」，把他們所受的新教育與新觀念，用最快速度，與最務實的方法引進自己的國土。

五四運動的健將們還在報紙雜誌上打著無止境的筆伩，憑理論想要彼此說服，要不要「全盤西化」哩，這裡已經把理論直接就變成了實際。工業界的人有他們先天最務實的一面。他們不寫文章，不理會誰有反對的意見。他們找到一片可以開拓的天地之後，就雙手萬能地把理想「做」出來了。你看得見這成績，你享受到這成績，不但是你，而且你由衷地知道，這成績正在嘉惠著你的下一代。而在這同時，它也用實際的成果影響著周圍遠近的人們，讓人們由佩服與羨慕而想要急起直追。

誰不想住進久大新村來呢？

誰不想也使自己的住處同樣的現代化起來呢？

「永利新村」也跟著就在同一範圍之內興建起來了。大家攜手併肩，齊步前進。

誰不希望也到久大、永利這兩廠來做員工呢？

誰不想使自己所經營的大小企業也依照這美好的藍圖來發展呢？

這不需要論戰，它的本身就是最具說服力的、具體的典範。

兩廠需要大量的員工，除此之外，周邊的各種工、商、運輸、營建，以及其他各種服務業都隨著兩廠的興盛而興盛，塘沽市面是空前的繁榮起來了。

久大、永利兩廠的迅速發展，使陸路運輸的鐵公路，水路運輸的招商局，外商的怡和、太古兩洋行，也不得不臣服於這兩廠龐大的業務而俯首爲他效力。不遠處的開灤礦務局更是早已成爲兩廠生產線上不可或缺的動力。

夢想霸佔塘沽這水陸碼頭的「法國大院」、「日本大院」……之類，雖仍駐著不同制服的異國色彩的兵士，但八國聯軍時所做的侵略夢，已被迫到了逐漸覺醒的邊緣。

久大精鹽，永利純碱，不喊一句口號，不打一次戰爭，他們用「實業」來說明一切——中國人大有可爲。

廿四、鍾瑪利

二年級的時候，同學中來了一個插班新生，名叫鍾瑪利，她是廣東人。我們不知道廣東是什麼樣子，於是，鍾瑪利就代表了具體的廣東。她給我們的印象是很不一樣的。馮以玉所代表的是一種屬於江南的嬌貴；而鍾瑪利所代表的除了那屬於廣東人的外向直率之外，還帶給我們一種來自基督教的新經驗。

在鍾瑪利以前，我們沒看見過信基督教的人。

首先，瑪利兩個字就是很基督教的。其次，鍾瑪利穿的偏帶皮鞋，我們也沒見過，那時，我們大部份還在穿圓口或尖口的布鞋，沒有帶子，是母親們親手做的。而鍾瑪利的紅色毛線襪子和她所畫的來自基督教的聖誕老人的紅衣服混為一體，好像她是來自另一個世界，也代表著「聖誕老人」的家族。

鍾瑪利的父親是永利碱廠新請來的技師。與她一起插班來就讀的還有她的表姐，叫伍杏記。唉眞奇怪！還有人名字叫「鍾瑪利」和「伍杏記」的！頑皮的男生們立刻給她們編了一首短歌，每天看到她們，就大家一起唱：

鍾瑪利 153|

伍杏記 153|

今年要想考第一!·1221|7210||

唱得有腔有調，而且還有表情。我說過，明星小學的男生是很壞的。

鍾、伍兩表姐妹，幾乎天天被他們氣哭。一面哭，一面抗議，「怎麼啦嘛？我們又不犯私！」

於是，「犯私」「不犯私」就又成爲男生們開玩笑的歇後語——「怎麼啦嘛？又不犯私！」現在回想「犯私」可能是沿海省份才有的一句常用的話，有人走私，有人販賣私貨，所以「不犯私」才被一般人用來表示自己的無辜。

也許是因爲天天被人拿她們的名字開玩笑，沒多久，鍾瑪利就把名字改了，叫「鍾愛華」。這穿紅襪子、偏帶鞋的小女孩，成了我們班上三個小個子，坐前排的女生之一——我，馮以玉、鍾愛華。

鍾愛華除了會教我們廣東話之外，還會教我們唱許多基督教的聖歌。我們很快就學會唱「耶穌愛我萬不錯，因有聖書告訴我，小人朋友他肯當，我雖軟弱他強壯。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聖書告訴我」。雖然我們從來不知道耶穌是誰。也不知道他爲什麼愛鍾愛

華。

鍾愛華也會織毛線。我們很欣賞她的技術，就也千方百計，請父母託人從天津買毛線和鋼針來織著玩。小學的生活內容一下子擴張了很多。

我們讀三年級的時候，北伐成功了。學校要開慶祝大會，讓我們做紙練和彩色字。這時鍾愛華就又發揮她的「先進」本領。她比我們做得既好又快，讓我們跟著她學，也許這是因為她比我們大一歲，所以會的事情也多一點；不過也許只是因為她來自最先對外洋開放的廣東，國父的同鄉，所以她會的事情，我們都不會。譬如做彩色字，要用小剪刀把色紙剪成細細的紙絲，摶成一個一個的小球，再黏在大張的硬紙上，成為立體的彩色字。這對我們三年級的小女生來說，是很難的。既剪不細又剪不勻，而且非常慢。鍾愛華發揮了「革命先進」的精神，她教我們把色紙先對分，再摺成一寸多的小長條，左手拿住，右手的剪刀靠在左手的食指與拇指之間，輕輕往前挪動的是左手的紙，而不是右手的剪。右手只是機械的動作，這樣剪出來的紙絲，既細且勻又快。技藝實在是要「學」的。

鍾愛華給簡單的塘沽帶來了好幾樣東西——紅毛襪、偏帶鞋、剪紙工和耶穌，而另有一件影響最大的「新潮」卻是「剪髮」了。

鍾愛華和她的母親都是剪短髮的。而當時塘沽久大永利兩廠的女眷還都是梳著舊式的髮髻。我們小學女生還梳著細細的兩條辮子，鍾家來到塘沽之後，起先，大家覺得他們奇怪，用不以為

然的眼光看待他們這一家「南蠻子」；但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這不以爲然的心情，一下子變成了羨慕和贊同。我母親動作眞快，忽然有一天，自作主張，就把我的兩條小辮子剪掉了。父親下班回家見狀，大爲生氣，把母親嚴厲地責罵了一頓。我在旁邊聽著不敢出聲，以爲這下母親一定後悔死了，也一定會好好地等上一年，讓我的短髮再度長成可以梳辮子的長髮。不料到了第二天，父親出門上班，我去上學。等我放學回家，卻看見母親把她自己的長髮也剪短了，而且還配上一個由鍾太太送給她的，有彈性的髮箍，壓在頭頂上。

母親的舉動不但使父親大爲震驚，連我也被嚇住了。覺得母親那一頭烏黑的長髮眞可惜！而剪成短髮的母親，看起來像個小孩，她個子本來不高，剪短了頭髮實在是減少了丰韻。

我不記得這件事引起的風波是怎麼結束的。但母親那勇於接受新事物的反抗性格，卻由這件事表露無遺。她成爲久大精鹽員工眷屬中，第一個追隨「南蠻子」，把長髮剪掉的一個。後來，卻是所有的婦女都剪髮了。只不過，母親的理由不是追隨時髦，而是「這樣方便」。

確實是不錯。首先，我清早上學，不必等母親爲我在百忙中梳辮子。其次，我也不必再爲母親對鏡梳頭那麼費時而不耐煩了。她的頭髮又多又長。洗一次頭要用好幾壺熱水，和很多的硼砂（舊時洗頭用硼砂，經濟實惠，又使頭髮非常烏亮）。又沒有吹風機，只得慢慢把它擦乾，母親事情又忙，小家庭，不但事事躬親，而且那年頭，全家大小的四季衣服、布鞋、被褥，都得親手縫製，洗衣更是全靠雙手，燒飯從柴灶到煤灶，自己升火，菜要自己買，自己調理。孩子又接踵

而至。整理內務也是責無旁貸。想想看，她怎麼會不希望減少梳頭的麻煩？於是，毫不猶豫，既然有人剪，就跟進吧！

但這份勇氣也不是人人都有的。

改革的勇氣是一種創造力和學習慾。母親不但勇於剪髮，也勇於學一切新的東西。鍾愛華一家從廣東搬來之後，最先接納他們的也是母親，她不但用行動接納鍾太太的短髮，而且用行動學習鍾太太的織毛線。記得母親是說到做到的立刻託人從天津買來英國出品的「蜜蜂牌」毛線和幾種鋼針，快手快腳地學會了織毛襪，然後織毛褲與毛衣，最後是織比較複雜的手套。至於說，圍巾、帽子，更是不在話下，於是，我們一家也最先「跟上了時代」，厚重的棉衣可以只穿在外層禦寒，內層可以減輕些了。以前的冬裝——內衣、小棉襖、大棉襖或棉袍、袍罩；內褲、棉絨褲、棉褲……外面再加棉斗篷或棉大衣，眞可以使人走不動路！

漁村出身的母親，自幼反抗纏足，結果等於只纏了一半，現在更是把繡花鞋擱在一旁，逐漸也可以穿皮鞋了。三十不到的年輕母親，可塑性高得很哩！又豈止是和父親學背詩詞和下象棋、圍棋而已！我們在小學學的每一首歌，她都會唱。而且和父親一起跟著我們邊唱邊跳地表演。

父親和母親十分相愛，剪髮的風波並未持續很久，因爲那本來就是小事一件。母親把從湖南同事太太學來的自製臘肉和糟魚，以及栗子雞，一樣樣端上飯桌的時候，父親就一點脾氣也沒有了。

廿五、久大員工逃內戰

塘沽，沿著海河，綿延著西方各國的營盤。法國營盤、日本營盤、俄國營盤、英國營盤……。他們享有中國的內河航權和駐兵權。懸著各國旗幟的輪船，毫無忌憚地停靠在塘沽碼頭。各國營盤門外站著身穿制服的荷槍兵士，那驕橫無禮的模樣，也被民衆視爲當然。

塘沽，不只是有外國營盤，它其實也有中國營盤。只不過，他們是軍閥打內戰的。

眞奇怪！中國軍隊在列強駐軍冷眼旁觀之下，打內戰打得那麼起勁！

這些中國兵，在冬天，寒風凜冽中上操，是我童年記憶中鮮明而又悽清的一景。

雪茫茫的早晨，他們的起床號：5|5－－3|1－－0|響在一白無際的天地之間。「大兵」站齊了行列，聽著「立正」「稍息」的口令跑步，遠遠傳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四小節，分成兩種不同的節奏。頭兩小節，一字兩拍，後兩小節，前兩字各一拍，第三字兩拍，第四字一拍，形成雄渾有力的節奏。那些大兵，打著綁腿，穿著布鞋，踩在黃土地上的拍子重重的，卻又輕輕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眞好聽！因爲它是大家一齊喊的。

然後，氣氛一變，他們的歌聲串入了塘沽曠野的空間，唱的是「當兵，吃糧，為我亞細亞！」

然後大部分是唱「三國戰將勇」，把關、張、趙、馬、黃，三國時代的五虎將依序唱完之後，就唱「滿江紅」——「怒——髮衝冠！」把「怒」用去聲表示，很是有力。然後再齊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我們不知道這些軍隊是那一支軍閥的，他們來來走走，但從他們所唱的歌的腔調，猜到他們是北方兵。

所以他們有時也唱「大將南征」。

那幾年，軍閥混戰，長輩們對時局的談論，反映在我們小孩子耳中的只不過是些你來我往的人名——張作霖、吳佩孚、馮玉祥、閻錫山、褚玉璞、張宗昌……。有時他們互相攻打，有時他們彼此聯合。經過村鎮的時候，百姓會受到騷擾、有錢的大戶人家尤其難逃一劫。蘆台老家「嚮善堂」因為房子大，總是首當其衝。老家的人們稱各軍隊來鎮上暫駐叫「過兵」。「過兵」的意義好像天災「過蝗蟲」一樣，軍閥為自己爭地盤，對軍隊並不注重紀律，更無愛護之情，尤其打敗仗的時候，更是不管軍隊死活，那些「敗兵」就成為變相的土匪，所到之處，無所不為。老百姓也只有忍氣吞聲，聽天由命。

塘沽自久大建廠到北伐成功，十年之間，沒有一年不內戰。內戰一起，一定找鹽商要錢。而

鹽商一定拿久大精鹽去搪塞，成爲慣例。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久大照例受難。當時塘沽成爲內戰必爭之地。每次鬧兵災，工廠總是勉強維持，不致停工；但盡量把員工眷屬送往安全地帶。而這民國十三年的逃難也就成了我童年記憶的一部分。

這次的逃難陣容可謂浩浩蕩蕩，目的地是天津法租界的總公司。

感謝「列強」！在我們國家裡佔了那麼多的「租界」，讓我們中國人在自己打自己的時候，有處可逃。

我們是坐京奉路的夜車，悄悄出發的。

塘沽車站上，擠滿了久大、永利兩廠員工的眷屬，站台上堆著各式各樣的箱籠。工廠總務處派有專人照顧這些箱籠。當然，其中都是一些細軟或各家自己認爲重要的東西。大部分是樟木箱或硬裡的皮箱，方方的箱蓋與箱底之間貼著封條，寫著箱子所有人的姓名。大銅鎖莊嚴地鎖著。另外還有許多網籃，盛的是形狀不規則的物件。我們的兩只大樟木箱，有一只上面特別加貼了一張字條，父親用大大的毛筆字寫著「此箱怕壓，請放在浮面上」。我們每次和工廠一起逃難，都會看到這樣的字條。我知道，裡面所裝的除其他衣物之外，一定有那兩架掛鐘，它們被八國聯軍由宮裡搶出來，又流入民間小販手中，被祖父湊巧買來，那是父親的最愛。除了它們很值錢之外，還更有對祖父的紀念價值。

我們坐火車到了天津，晨光熹微之中，從「老龍頭」車站坐洋車到了法租界的久大總公司。

我和妹妹半站半靠，倚在母親膝上；看著父親同事王芳洲先生的女兒坐在洋車的踏腳板上。那是我們第一次坐人力車，以前在老家是坐馬轎車。搬到塘沽之後，幾乎是沒坐過任何的車。對於坐洋車，很是好奇又興奮，因此格外印象深刻。我們笑王芳洲的女兒坐在踏腳板上的樣子，說她是「坐二等」。那大清早從火車站走出來的心情，留在我記憶裡，十分深刻。對幼年的我來說，那實在是一次新鮮有趣的旅行，好像就因爲這樣一次「旅行」，使我日後一直最喜愛淩晨絕早出發去旅行，那空氣，新鮮極了！

久大精鹽在天津的總公司非常高雅漂亮。你簡直不會相信在那民國十幾年的時代，有那麼沉穩堂皇又十分現代化的公司。它的規模在一開始就已奠定了多年不必再變的基礎與風格，所以直到幾十年後，它仍然莊嚴自信地站立在天津的市中心。這樓高四層外加一層地下室的建築，一直是我日後重要的落腳處。久大精鹽對員工子弟的照顧數十年如一日，而且無論大小員工，只要你去託他們幫忙或暫時借宿，都一視同仁，幫忙到底。

這次抵達時，久大總公司爲我們這群「難民」已經準備了早點。我們一下車，就被接待到大大的餐廳。十人座位的紅木圓桌上，已經擺好了四只十二吋盤，盛著精緻的早菜。另有小碟的花生米和清切鹹菜。饅頭和稀飯足量供應，使我們大快朵頤。

早餐之後，我們被「分發」到不同的招待處所去避難。那也是第一次，我認識到范旭東先生的大宅。那坐落在舊德租界改爲「特一區」的洋房，高大敞亮，有前後兩座二層樓，後面還有一

所單獨的小院，有書房和客房。大宅東側是一排小平房，專給看房子的人住。

我們抵達之後，行李早已運到，房子也已打掃清爽，大家各自打好地鋪。一切不勞我們操心。把地鋪安排妥當，大家初步認識了一下這「逃難」的高級環境，中午的時候，就有工友送開水、饅頭和包子來了。

范旭東先生經營久大精鹽，對員工照顧之周到，此是一例。這種對待員工如一家人的胸襟，怎不令大家留戀效忠，爲公忘私地全力以赴？

我們和母親在天津避難，父親和全廠同仁留在原地工作而沒有內顧之憂。工廠對這類事件的處理一向是如此公私兼顧。

逃內戰的經驗，以這次最爲深刻。這以後的再一次難忘的經驗，就是七七事變之後的八年抗戰了。這大宅，於是成爲我們與日軍誓死對峙的年代的一個注腳。

廿六、父親講故事

父親並不因爲新環境逐漸舒適而減低了對老家的懷念。他的懷念是非常感性的。

從父親多年以來，重覆敘述老家的諸般小事，片片段段，都是溫馨的這一點看來，世界上一定有人特別容易原諒艱苦與不平，而只專心記著快樂與溫馨。同樣發生在父親幼年與童年以及成年歲月中的極苦與極樂，聽父親每晚用講故事的方式一一追述，不但快樂、溫馨和有趣的小事成爲我們成長過程中最樂於記住的故事，就連那滴水成冰，無人爲要去上學的父親準備早點，而只得自己從已去世的祖父靈前供桌上，取用一小碗凍成冰塊的玉米麵粥，如此辛酸的往事，在父親敘述時，也成爲淡遠動人的小小人生插曲。至於他經常談起的，由於祖母早逝，幼小的男孩缺少照顧，因而「各種病都生過」，包括「肝炎」嚴重到長腹水，舊時稱爲「大肚子痞」，腹部腫脹難消。父親也患過疼痛難忍的關節炎，由於大家庭除正房以外，冬天缺火，陰寒長久侵襲，使少年時代的父親罹患了這應屬老年人才會有的病痛。

至於說，這樣嚴重的疾病，是怎麼治好的？當時我不懂得問，父親也沒說。但想像當時家中雖然只剩空架子在支撐，所結識的高階層名醫一定還不少，當年也沒有西醫，所以不容置疑，那是中醫的功勞。

父親這種容易消化痛苦的天性，一定也感動過我們。使我們從父親以說故事的方式談他自己對苦樂的取捨之中，得到對人生從正面去認可的許多啓示。

相信如果父親所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些痛苦與仇恨，那不但父親不願多談，即使多談，恐怕我們也不願多聽了。

我們極愛聽父親的故事，而且特別愛聽他講自己小時候的故事，每晚臨睡前，央求父親「講您小時候的故事吧！」父親從不令我們失望。

有些故事重覆又重覆，我們都記得一清二楚，彷彿身歷其境了，卻還是願意聽父親用他那充滿懷舊之情的聲音「再講一遍」。

這本書中，關於老家的傳奇，祖父的逸事，以及祖父和父親在天津的生活的片段，都是聽父親講的。

父親仁厚友愛的天性，也使他記著老家那些堂房叔伯——他的堂兄弟們。

大爺房裡有兄弟四人，由於沒分家，所以大排行，父親行二，老大是大伯父，爲人木訥，不苟言笑。逸事也少。三叔和四叔是雙胞胎，比父親略小一點，五叔是大爺膝下四兄弟中最小的，

而六叔是五爺這房的，和父親同父異母。

論年紀，既然大伯父規行矩步，不愛玩，五叔、六叔又小，就只有三叔四叔這對雙胞胎可以和父親玩在一起了。

他們遊戲的地點也是老家的後花園，那時我還沒來這世界報到，後花園還是上一代少年們的世界。

父親說這段故事的時候，總不忘加上一句──「爲了和大爺房中的堂弟弟玩，自己常常從繼祖母的瓷蓋罐裡『偸』拿兩塊糟子糕去『交』這兩個朋友。」

「糟子糕」很有效。他們堂兄弟三人不但玩得很投機，有一天，那兩位雙胞胎還救了父親一命。這就不僅是由於「糟子糕」，而是來自先天的手足之情了。

那天下午，天很熱，他們三兄弟相約到後花園去玩。幾個人玩得滿頭是汗，想要洗洗臉，看見花園角落的地上埋著「半截缸」，裡面有水。所謂「半截缸」，是把水缸的下半埋在地裡，只露上半在外面，這是爲了添水及舀水都方便。上面通常是加個木製的蓋子。三兄弟把缸蓋打開，由父親這做哥哥的拿了葫蘆瓢去舀水。那缸裡的水所剩不多，因此必須探身下去，才能搆著水面。不到十歲的這兄弟三人，個子都很矮小，父親這最大的也仍然是力不從心，一手拿著葫蘆瓢，一手把住缸沿，低頭彎身向缸裡舀水，卻是一直嘗試，一直搆不著水。缸裡的水像一面圓圓的鏡子，映照著父親的臉和梳著辮子的頭頂，感覺上那水離他很近，事實上卻總有一段距離，父

親只顧探身下去搆水，冷不防失去重心，倒栽葱、頭朝下，眼看就要栽進缸裡淹死，驚急之下，左手仍然奮力把住缸沿，右手的葫蘆瓢也扔了，騰出右手來也把住缸沿，卻是只能維持不致掉下去，而無法退回來，只得大叫：「不得了啦！救命啊！」

三叔、四叔這兩個雙胞胎在這緊急的狀況之下，立刻一人一邊，拉住父親的腳，兩個人使出平生之力，卻無論如何，也拉不動正在缸裡往下墜的父親，只聽父親在缸底頭朝下，悶聲大叫「別鬆手啊！我的辮子已經沾到水啦！」

兩個弟弟一面拚命使力拉住，一面急得大哭：「二哥！你不要淹死！二哥！你不要淹死！」

這兩兄弟筋疲力竭，嘶聲喊叫，不知過了多久，才驚動了曾祖母房裡的丫頭「小福」和「小壽」，從前院奔來救命。

四人合力把父親救了上來，解了他的「倒懸之危」。父親的辮子早已濕了，總算在兩個弟弟「咬緊牙關不放手」，與「地心引力」誓死對抗之下，保住了這二哥的性命。

看得出來，父親在多年之後，敘述這件驚險事件時，是對那兩個雙胞胎弟弟多麼感激——「如果他們因爲拉不動了，隨便一放手，我就沒命。」父親總不忘加上一句：「但他們寧願哭叫，也不鬆手。這份緊急之中的鎮定與堅持，也不是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做到的。」

三叔和四叔是大爺的小孩，三叔後來念外交，語文能力一流，二十多歲就到浙江去做鹽務局局長，卻不幸染上傷寒，病死任上（但據其他親戚說，是被人暗殺，無法求證，只得存疑）。

這位優秀的三叔，我沒見過，四叔卻在日後成為靳鄉善堂老家的重要支柱，他法政學院畢業，因大伯父為人保守，家中裡裡外外，事務繁雜，不能沒有幫手，於是放棄了在外工作的機會，負擔起日益衰落的家計，對外又要硬撐場面的重責大任。後來家中長工一個一個的辭工他去，四叔不但要負責家中捉襟見肘的收支，還要指點子侄們讀古書，勤習字，一絲不苟。偶然我隨父母回老家，也會被四叔「機會教育」，考我唸家中的楹聯，單是唸對了還不行，還要問我「出自何典？」使我這洋學堂的「高材生」窮於應付。但我還是很喜歡四叔。他教導晚輩的方法雖然嚴格，但態度十分溫和，一口老家蘆台話，那腔調，先天就柔軟蘊藉，帶著感情。高高的個子，清秀的五官，走起路來不慌不忙。家中婚喪大事，他和大伯父主導一切，兩人同樣的揣著袖子邁方步。一副「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有涵養的樣子，典型的儒家老中國人。但是，幾乎沒有人能想像這麼溫文儒雅、飽讀詩書，又在法政學院畢業的、公子哥出身的四叔，赫赫有名的靳鄉善堂的「四先生」，在長工陸續走了之後，是輪到他，天天脫下長衫去後門外挑水。每到過年，為應付債主，找個住閒的遠親去典當幾件值錢的皮貨或金器，不僅是自家花用，而更是為了接濟某某鄉親。

接濟鄉親是最不可免的。家中即使困窘，庄上還是每年整大車的送來各類穀物收成，我們小孩子只關切那些大號的花生和甜甜的紅薯。不知道那些麥子、高粱、玉米等等還要經過什麼手續，才可以變成全年家中和遠近親友必備的食糧。

倒是繼祖母不忘昔日光榮，說當年「聚泰號」一到秋收之後，送到家中西院糧倉的糧食，成大車的從北街東頭一直排到西頭。長年住閒的遠近親友，可就多了。這排場，至今猶有蘆台的老一輩鄉親，能道其詳。我這晚輩反而只是道聽塗說，不敢信以爲眞了。

廿七、老家逃難

做爲久大永利的員工，逃難也是浩浩蕩蕩，聲勢不凡的。相形之下，老家的「逃內戰」，情形可就完全兩樣了。

農業社會發財致富的「靳嚮善堂」，樹大招風，宅子太惹眼，因此，每此「過兵」，必定會成爲大兵落腳的處所。偏偏那幾年，軍閥對軍閥，打不完的仗，「蘆台」是他們必爭之地。打勝的或打敗的，都如蝗蟲過境，使住戶們膽戰心驚，飽受騷擾。

當我們在塘沽，由工廠照顧安排之下，浩浩蕩蕩逃內戰的時候，老家卻沒有那麼幸運，每次扶老攜幼，倉皇奔逃之外，家宅也被屢次駐軍而糟蹋得面目全非。不但駐軍糟蹋，自己也爲了掩人耳目，把大宅盡量「醜化」，使它不留半點丰采。我最記得有一次從塘沽回老家，驚愕地發現，小時候我最喜歡的那莊嚴的正門已經用磚砌死了，剩下門旁兩個大大的石頭獅子，很沒意義地站在兩旁，顯得荒涼又奇怪，使我不得不向左右鄰居詢問：「聚泰號在那裡？」

鄰居對「聚泰號」一副永不會忘的樣子，指著旁邊一道小小的窄門，說：「這就是！」

這就是？

這那裡是！「聚泰號」即使不開那堂皇的正門，也該開這邊敞亮的車門，怎麼會走那如同「晏嬰」受辱時被迫屈尊的那麼小的一個門？

事實告訴我，那就是我家。進門四顧，不錯，是荒涼敗落的東跨所。上馬石，下馬石還在，馬與車是不見了，倒是緊靠後花園前面的角落上，拴著一條兇猛的黑狗，看見我這生人，露齒狂吠，幸虧它被鐵鍊拴著，否則我是準被咬傷無疑。

荒園冷落，我悄悄退回箭道的小門。推門進去，小時候最愛邊走邊數的牆上鏤花圖案還在，卻顯得枯銹無神，不見昔日有趣的光采，那被我戲稱爲「飥果」的腰形圖案，變得毫無生氣。

箭道還是那麼長，但一份荒涼感，使我不敢直接往我所最愛的後園去尋幽探勝，很無奈地經過了那同樣也被磚砌死的月亮門，往後走，直到看見那唯一表示可以通行的通往三層房的小角門，這才小心翼翼地走進去。

原來前面頭層那五間半打通的大客廳和頭層後面的東西兩廂房各三間都已租給了一個「萬興百貨商店」，開了襪子工廠。爲了和內宅隔開，那濃蔭蔽日的「藤蘿架」院落也不再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地方。整個的宅子被攔腰切斷，剩下了一列第三層的正房和兩廂，以及後面沒人居住的第四層。這第四層也是早就用磚砌死的。當年給人的感覺是神秘，現在給人的感覺是敗落。

據家中長輩說，「鬧大兵」對老家造成非常大的災害。不但宅院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家中老

幼婦女更是終年膽戰心驚，隨時準備逃命。當時所謂「鬧大兵」，就是直奉戰爭。那一陣，張作霖的奉軍軍隊在東北，吳佩孚的直隸軍在華北一帶。而蘆台正是這直奉拉鋸戰的要衝，有時奉軍打過來，有時直軍打過去。眞可以說是兵荒馬亂。不得已，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時候，家中的男女老少就都逃到了鄉下一個叫「國家園」的地方去避難。家裡把堂皇的正門用磚砌死，故意給人造成破敗的印象，以免成爲駐軍搜括的第一目標，內宅和前院隔開，表示是「過不起日子」了。「房子都租給襪子工廠了，還有什麼油水呢？」

苦肉計，以求自保。

家人搬到「國家園」，這邊大門砌上，走東跨所，而且在車門旁邊開了一個小小的便門，看起來確實是小門小戶了，其實，單單是請幾位農民或家中長工看家，每人每天就要付兩塊銀元，這「一天」的工資相當一般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還要負擔他們的伙食。

據家中長輩說：各軍閥的軍隊都在這大宅駐過。張作霖的奉軍，吳佩孚的直軍，都曾先後光顧。張宗昌原駐山東，褚玉璞原駐河北一帶，由於受困，在蘆台駐了很久。不僅吃光了我家的存糧，而且把蘆台其他的十幾家糧棧也都吃光了。而老百姓是按貧富等級來分別捐款。當然，靳家也並不能因爲房子被佔用而就免於捐獻。吳佩孚因兵力不足，借調過南省的兵，有安徽兵，山西閻錫山的兵，馮玉祥的兵，還有陝西胡景翼的兵。這些外省兵各有各的方言，說話都聽不懂。據長輩說，在這些軍隊之中，以馮玉祥的兵最爲紀律嚴明。如有偷搶或任何擾民行爲，都要槍斃。

馮的部隊有三大件武器：大刀、步槍和手槍，在當時來說，這樣的配備是很厲害的了。

如今回想，眞是「福禍相生」，「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深宅大院如皇宮，卻是內戰各軍閥駐兵的最佳選擇。大好的精緻建築，裡面考究的家具和古玩，即使盡量妥爲收藏，怕也難逃損毀流失的噩運。而這大宅的主人們，不但在「過兵」時擔驚受怕，倉惶逃徙；而且在逃徙的時候，比別的人家要增加幾倍的緊張、惋惜和恐慌。內眷們平時養尊處優，受盡保護，逃難的時候卻加倍困苦。不要說自己家的車馬已無用武之地，即連向外面租用，也因不敢招搖而作罷。於是，男人們是徒步奔逃；女眷們則是請人用大籮筐抬往鄉下，或抬到火車站，再往其他城市逃亡。

大宅駐軍似乎已成定律，內戰時期駐軍閥的軍隊；日軍來犯的時候，也是飽受滋擾。「解放」以後，這老家的房子又住上了「解放軍」的傷患和部隊。由於這些軍人大多是農村兵，看到這麼大而又這麼空蕩蕩的房子，曾彼此詢問。

「這是宅子還是廟？」

廿八、衣冠不改舊家風

老家蘆台鎭距離塘沽只有一小時火車的路程。民國十幾年，塘沽已經大步走向工業化，蘆台卻還是過著靜態的農業社會的日子。

「衣冠不改舊家風」。何況是「靳鄕善堂，聚泰號」！儘管上一代吃喝玩樂抽大煙，掏空了老家的元氣，到了父親這一代，卻是力圖振作。有人離家出外奮鬥，有人自願留在家中延續傳統，重振家聲。離家在外奮鬥的並不比在老家留守的更偉大。因爲那留在老家的不但要支撐起偌大的「空架子」，而更不容易的是還要「中興」，恢復老家的光榮。

這責任，落在大伯父和四叔的肩上。

北伐成功，不必再逃兵災了。把出租的的頭層大廳及前院收回來，仔細修葺，使它恢復舊觀。僅存的田莊也堅持只典不賣，日後一定要贖回，才對得起祖先。爲了避免被外人覺察「鄕善堂」家道中落，法政學院畢業，新舊學識俱佳的四叔，犧牲自己向外發展的機會，以振興家業爲己任，和大伯父共同挑起這副重擔。

四叔不但每天要爲家用開支操心，更要爲以往對窮親戚例行的照顧而咬緊牙關，撙節開支，絕不取消這由祖上留下來的往例。他悄悄地利用東跨院的一個角落，自己養豬。每天在繁重的家務壓力之下，勉力騰出時間照顧五、六隻豬，盡心把它們養得肥壯，只爲在過年之前，可以請屠戶來把豬殺好，分贈給那些「只等聚泰號」來接濟的人們。除了豬肉之外，還包括幾斗稻米和已經磨好的麥子麵。這是當年高祖父經營糧棧，發財致富之後，留下的德澤。深得鄉里人們的感戴。四叔爲了維持這項家風，眞是苦心孤詣，不足爲外人道。每年堂堂皇皇，把這辛勞的成績照顧了別人之後，自己一家卻只夠除夕加菜及給祖先和神祇們上供之用。初五過後，供桌上的菜餚撤下來，全家可以吃到正月十五，以後這一年就又只能吃鹹菜拌豆腐及從「薊運河」撈上來的小魚了。

維持「聚泰號」的場面，眞是多虧大伯父和四叔。而這維持場面的「壯舉」表現在給曾祖母和四爺同時出殯的浩大陣容上，更是我家獨一無二的「大傳奇」，值得一記。

曾祖母和四爺並不是一起去世的，曾祖母去世的時候是民國十四年，四爺去世是民國十七年，而出殯的時候卻已經是民國二十一年了。

停靈在家，曾祖母是七年，四爺是四年，也幸虧家中深宅大院，五層大瓦房。每一層的正房穿堂都有足夠的空間，做爲寬寬敞敞，頗爲「氣派」的靈堂。

曾祖母先去世，停靈在繼祖母所住的那一層堂屋，四爺後去世，停靈在二層的堂屋。

黑漆烏亮的上等棺木，架在高櫈上，前面鄭重其事，長年的擺著香燭祭品，兩旁各有兩條長櫈。北方天氣乾冷，棺木又好，而且年年加漆，這爲現代人所不敢想像的停放方式，我們全家大小，視爲理所當然。

住在塘沽的我們一房，在這兩位長輩先後去世的時候，趕回去參加入殮以後，就只有偶爾才回去一次，對這兩具棺木的印象卻是十分深刻。因爲在沒有電燈照明的當年蘆台鎮，煤油燈與燭光熒熒熒熒之下，那漆黑烏亮的棺木顯得格外的莊嚴與肅穆。它們是大家出入必經之路，起先，我們還在清早與黃昏去行個禮，後來也就視它們爲家中的一景，不再覺得裡面睡著家中尊嚴的長輩。而只有大伯母和四嬸、五嬸，每天一早一晚，梳洗得一絲不苟地去到靈旁，撫棺哭上一場，叫作「吵靈」，表示永誌不忘。祖母和大祖母也有時參加到曾祖母這一邊，盡盡晚輩之禮。「吵靈」的都是婦女，她們的哭聲高低抑揚，形成一種音樂，極像現在常聽到的黑人靈歌，使我一直懷疑這是否是全人類一致的一種原始的「藝術化」了的哭聲。很可能在非洲也是用這樣的哭聲，大家「齊哭」，來表示哀悼，卻又因日久天長，當初的哀慟已經淡去，於是就形成了儀式一般有固定調子的「音樂」。

伯母、嬸母她們的音質實在很好。哭起來有人是高音部，有人是中音部，形成重唱或合唱，非常富於音樂性，尤其是大伯母，聲音柔和醇厚，是最飽滿悅耳的女中音。她長得很美，又十分能幹。當她領先「吵靈」已畢，起身依禮去勸慰其他的女人，使她們也能適可而止的時候，她那

含淚的眼睛，閃著「一切都該如此」的柔和而又自信的光。她不施脂粉，鵝蛋臉龐，略有幾粒雀斑。高矮適度的身材，素素淨淨的衣服，一絲不亂的髮髻，該如何是如何。正如她持家的分寸，一切都恰到好處，不疾不徐，不亢不卑。纖穠合度的身材，使她一直有優美自然的姿態。冬天的時候，她為了取暖，也僅僅是把雙手插在棉襖的衣襟下，從不見她聳肩縮頸。儀態之美，表現在日常的自然純樸之中。每天早上見到我們，總是先問：「夜裡冷不冷？」或「夜裡有沒有蚊子？」黃昏時分，也總是她，風雨無阻地過來給祖母房間把煤油燈罩擦亮，點上燈。一早一晚，必定到祖母房間來問安。點煙、倒茶、整理被褥，晨昏定省，絕不疏慢。幾十年如一日，帶領著後來進門的嬸嬸，教她們盡晚輩之禮。每一房的孩子過生日，她都記得。當天早晨，她一定備好燒餅油條與煮熟的鷄蛋，親自送到我們的房間，笑瞇瞇地提醒我們：「今天你是狗長尾巴尖，多吃點東西，長結實一點！」親切自然，一點也不造作。

老家長幼有序，長輩對晚輩的生日可沒有「送禮」或「請客」的。有時我們因為在外面住久了，偶爾回老家住住，會用外面的禮貌問「大媽早，」或「大媽晚安，」這時她反而會說：「家無常禮，不用天天問，叫聲『大媽』就行啦！」

小孩子們沒有一個覺得家中長年停放兩具棺木有什麼不尋常。大伯母有時也把我們拉去「哭」幾聲——「老太太最疼你呀！該哭哭呀！」讓我們也「愼終追遠」一番。

民國廿一年，終於，老家存夠了出殯的「大」錢。準備就緒，要出殯了。

這不但是「聚泰號」的大事。也是蘆台鎮的大事。

曾祖母王太夫人是在高祖父那一代興家立業之後，直接承續上代的發達，幫助曾祖父把「聚泰號」的家聲發揚光大的關鍵人物；而且是帶大了五兒四女，使這家人丁旺盛起來的第一功臣。如今在有了第五代之後，她老人家的出殯怎能馬虎？

「靳鄉善堂」鄭重其事，蘆台鎮也動起來了。遠近各地，「五服」之內的親族，依禮要在這期間住在喪家，街坊要準備擺祭桌路祭，還有要準備看熱鬧的，……平常沒什麼大事的這鎮上，如果有誰家「出大殯」，可比什麼都重要啦！

街談巷議，「聚泰號」要「出大殯」了。這「殯」將是什麼樣子呢？請多少和尚，多少道士，多少喇嘛？用什麼型製的棺罩？多少人抬？行列有多長？是「大破孝」還是「半破孝」？子孫有多少？……

鎮上每一個人都替「聚泰號」計算著。「聚泰號」自己又怎能掉以輕心？

何況是母子兩人同時出殯，誰在前？誰在後？

加倍隆重是沒問題的了。

準備去「聚泰號」吃「八大碗」流水席的人是陸續地到齊了，其他的人只得等待這一天「正日子」的到來囉！

廿九、屬靈的世界

在出殯的前三天，我們就從塘沽回老家了。

家中景象忽然變得非常陌生。

宏偉的「四合套」大瓦房，正門大敞四開著。直接可以繞過影壁，走進前院。一路穿堂都打開，連我們從來不被允許穿越的大廳房，都敞亮地讓我們看見那紅木家具。太師椅上鋪著藍椅墊。

全部的院子都搭上了蓆棚，周圍掛滿了輓聯輓帳。那在春末夏初特有的涼風，吹得整個蓆棚白花花的一片飄動，白布輓聯和素色輓帳，與上面那些黑字輓詞，瀰漫成一片屬靈的世界，完全脫離了人間世的踏實。好像整個這五進大瓦房都消失了，而變成了一個虛無縹緲的幻境，一切都在隨著死者的靈魂升天的途中，悠悠蕩蕩。靈棚擋住了兩側的房子，人們要回到自己房間的時候，得從靈棚那看不見的通道中鑽過去。而全部的房間都住滿了來自各地的「五服」之內的本家和親戚。婦女們都自動幫忙在縫孝衣。「大破孝」是「聚泰號」辦這大事所不能免的大開支。整

疋的白布由布莊送過來，扯開給親友的大人孩子，一人縫一件孝袍。孝袍的縫製有一定的規矩，直針縫，不許倒退，以免「倒孝」，會觸犯迷信，導致再有人死亡。孝衣的毛邊不許縫，以表哀戚而「無心修飾」。鞋也要「鞔」上一層白布，孫輩的鞋上加朵紅花，孝子的鞋後跟要加一條蔴布。婦女頭上戴「孝箍」，男子戴孝帽。孝帽還分軟帽與硬帽，硬帽叫「樑冠盞」，是孫輩用的，前面也有一朵紅絨花，表示輩份。這一切，都是大家親手縫製。

靈棚外面和各層正房的月台上，都擺著八仙桌，請來辦備喪事筵席的專人，開「流水席」——「八大碗」（八樣葷菜，是喪事常用的菜式），招待親友。隨時有人抵達，隨時入席，所以叫「流水席」。這種耗費是十分驚人的。

大伯母早在多少天以前，就囑咐各房把不必要的擺設收拾清爽。炕箱卧櫃、一律加鎖。只留立櫃下層給來賓放置衣物。炕箱上面放被褥。至於各層房子，除「四層」繼續封死不動之外，其餘越是平常沒人住的「閒房」，如今用來招待親友，越是要事先整理。打掃房間的同時，更要留神裡面的擺設或古玩。口頭還不能說是爲了避免人多手雜。（實際被順手牽羊的情形絕難避免）。表面上一切應有的陳設仍然要有，但盡量選些最普通而不可少的撣瓶、帽筒、蓋罐之類，以不使人看出是有意藏起來爲原則。但這樣一來，各個房間都簡陋多了。加上客人衆多，我們這群長住塘沽的自然是都不認識，就連老家的人們，也不見得每個都熟。特別是女眷，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要說對遠方男性親友不全認識，就連同是女性的親友，如果不是經常來往，也

得經過一陣介紹，才叙得出來，誰是長輩，誰是平輩或晚輩。大致說來，是男客住東跨所，女客住內宅。至於說，能不能嚴格限制在「五服」之內才可以進來，天天吃流水席，依我判斷，那是相當困難的。如果有人來混充親戚，也只得由他。頂多私下彼此計議，「盯著一點」而已。辦喪事既要擺出如此排場，也只得把一切可能的損失都計算在應有的開支之內了。

到了正式「開弔」這天，來賓從一大早就絡繹不絕。正門打開，直通內院。有些來賓從門外就痛哭流涕，一路走，一路哭嚎著來到靈前，上香跪拜。四位司儀稱爲「四相」，隨時唱禮。這「四相」也不同於一般的司儀，都是有功名的儒者，當地德高望重的人物。他們身穿藍袍，黑馬褂，分列兩旁，讚禮用「齊唱」。家祭時，從「孝眷出廬」唱起。三跪九叩首，然後「上香」、「獻茶」、「獻椒」（子孫獻給長輩的酒叫「椒」），「獻箔」、「獻饌」、「進毛血」……我們半猜半問地看著長輩上祭。然後當司儀又唱「匍伏」、「興」，「匍伏」、「興」……我們就跟著他的號令下跪，起來，再下跪，起來。家祭完畢之後，客人來祭拜的時候，我們也自動情願地來「跪棚」，陪著「匍伏」、「興」、「匍伏」、「興」的玩個不停。把「四相」唱禮的腔調也學會了。那眞是最好聽的「禮歌」。

在我們小孩子來說，這一切，眞是「好玩」極了。大家穿上肥肥大大的孝袍，我和妹妹堅持要戴男孩子的「樑冠盞」，而不要用一條帶子纏在頭上的「孝箍」，大家一同跑進跑出。高興跪就跪；不高興跪就跑到各房間去玩。四爺的靈柩在前院第二層正房的穿堂。曾祖母的靈柩在第三

層正房的穿堂。我們有時到前面去「跪棚」；有時在後面。曾祖母靈前的「主角」孝子是大爺。大爺那時也有六十多，快七十歲了。鬚髮皆白，卻要穿上重孝。他的孝服背後綴著麻布，腰上繫著麻繩，後面拖著長長的「尾巴」，末端打著一個結。我們這些晚輩不知好歹，一味竊笑「大爺的長尾巴」。而出殯時，孝子要拿著哭喪棒，也使我們爲一向尊嚴的大爺，深抱不平。

但這一切，在我們還都只是「正戲」上演之前的「序曲」，眞正令我們興奮的還在後頭呢！

三十、我們走路去

出殯的的那天，看好了時辰，「穿神、點主」，把神位立好，但見兩具棺木在哀樂聲中，罩上「棺罩」，曾祖母的是精工刺綉的「花棺罩」；四爺的是「黑棺罩」。由於依禮，曾祖母要在前，四爺要隨後，抬棺出門時，還曾大費周章。先把停在二層正房穿堂的四爺的靈柩移到前院旁側等待，等曾祖母那停在三層正房穿堂的靈柩在音樂的吹吹打打聲中先行，然後這才「起靈」隨後。這行列一出「靳嚮善堂」的大門，立刻蘆台街上全體興奮起來——「來了！來了！」

這喪禮，對本主來說，是籌備了七年，省吃儉用，籌足了龐大的治喪費用，爲的是在這一刻，要贏得全部鄉、世、戚誼的點頭認可；也要贏得所有鄰里的心服口服——「聚泰號」果然還是聲勢赫赫，令人不敢小覷。何況全鎮其他三大戶都已敗落，只餘「靳嚮善堂」一家。儘管他們上一代揮霍的程度驚人，卻仍然出得起這麼堂皇的「大殯」，足以使人們對「嚮善堂」肅然起敬，由衷佩服起來。

於是，沿途祭桌連綿不斷，表示鎮上對這家鄉親的敬意。

我穿著男孩的孝服，堅持不肯隨同女眷坐馬轎車，而要和各房堂弟們一起走路到墓地去，為的是可以「身歷其境」，而不必坐在那放下布帘，密不通風，黑洞洞的馬轎車裡，像被押解的犯人一樣的去送殯。

小時候，隨母親及其他女眷坐馬轎車去墳地的經驗是很難忘的。

河北省這一帶，距黃帝戰蚩尤的涿鹿已不太遠。許多出土的石雕人像或動物，散置在荒野裡，無人聞問。也不見有人研究那是多麼有價值的古物。只記得母親在這顛簸震盪的「掃墓之旅」的途中，曾掀開車帘一角，指著外面荒野中散置著的石雕，隨口編成歌謠來哄著被車子搖晃得七葷八素，又悶得不耐煩的我。至今我記得母親一面拍哄我，一面唸著「長蟲過道野雞飛，石人石馬大石碑」。那大概是轎車經過荒野古道時的即景。「長蟲」就是「蛇」。橫過古道的這野生動物，被車子經過時，驚得四散的情景，被母親編成歌謠之後，反映在我悶悶的小孩子的心情上，是既溫暖又無奈。自己也不能知道這沉悶又痛苦的旅程需要多久，既然已經開始了，也只得耐心地盼它快些終結吧！終結之後，就可以看到那極目荒涼之中，不知何年何月被築墳的人從地下挖出來的「石人石馬大石碑」了。

所以，當我長大到可以膽敢申請不坐車，而走路去墳地的時候，我就冒著被批駁的危險去申請，而居然就很容易地被批准了。

在路上走著「送殯」有意思多了，我和大弟祖光一路欣賞喇嘛們的黃衫和長可及地的大喇

叭，看他們怎麼可以吹出那麼低而可怕的長音。和尚道士們比較輕鬆，他們的樂器也好聽多了。喪禮最好聽的是嗩吶和鑼。它們那「哇喇哇喇，通！」的響亮的聲音，顯得整個的行列都很「光彩」，而我們這一大隊小小的第五代，穿著一律的白孝袍，步子活潑，一點也不哀戚，反而時常竊笑那些必須假裝哭得涕泗交流的長輩們，那裡來的那麼多鼻涕和眼淚。

沒有人責備我們，做孫輩和曾孫輩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特別得寵。都會放任我們蹦蹦跳跳，愛如何就如何。從這件事，也使我了解，自己是多麼願意加入男孩的行列。心中暗暗悲憫那大伯母房中，只比我小三個月的堂妹，被迫必須坐在那密閉的轎車裡，不許「拋頭露面」。而我卻只因已經隨父母離家在外，就可以被認爲不必遵守老家的古禮，而有選擇的自由。特別是我，這第五代第一個女孩，居然率先加入男孩的行列。大伯母答允了我的要求，把男孩的帽子給我戴上，還笑我說：「你看，曾祖母多了一個重孫子！」

遇到祭桌的時候，司儀要先喊一聲兩個字的口令，讓行列停下來，接受祭拜。而我們這些不坐車的孝子孝孫，就負擔起還禮的任務，磕頭跪謝一番。等再聽到口令時，就繼續前進。靈柩莊嚴而緩慢的在儀仗後面進行。我們這些「代表」跪謝的小孩們，覺得很是「光榮」。「祖光」堂弟笑話連篇，一路數著祭桌的數目。每次都爲猜不到那司儀所喊的口令是那兩個字，而胡亂替他編造兩個同音的字，使那兩個字變得十分可笑。於是這堂皇的行列裡，有人在哭，有人在笑。而無論是哭是笑，兩旁看熱鬧的人都不批評，因爲這已經是大家早已知道的正常現象。人們所關心

的只是它的場面，人數多少？花費估算若干？行列多長？送殯的人數越多，表示這家越是人丁旺盛，儀仗的行列越長，越表示家大業大，財力雄厚。

「聚泰號」這次「出大殯」，在當時的蘆台鎮已是難得一見；但據長輩們說，這實在遠不如當年全盛時期的氣派了。「當年曾祖父出殯時，前面的隊伍已出去一里多地，還未見眷屬們的馬轎車出現。街上的人都覺奇怪，以爲省去了這一項。其實當轎車終於跟上來的時候，浩浩蕩蕩，足有上百輛之多。……」

大爺和大伯父與四叔，竭盡所能，要維持這場面的苦心，也就可見一斑了。

走路到墓地相當遠，需要很好的體力，但更需要的是一種「遊玩」的心情。我常想，清明時節去掃墓的人們，郊遊的心情一定比追念先人的心情要來得濃厚。尤其是舊時家中的女眷，她們幾乎沒有一點可以被允許到郊外活動的機會。特別是像「靳繼善堂」這樣守舊的「大戶人家」。所以，儘管從家裡內院上車，直到墓地的途中，始終是車帘深掩，但透過那一尺見方的小車窗，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野地與田園。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享受了。

這次，我們這一支年紀十歲上下的隊伍，跟在長輩後面，一路蹦蹦跳跳，玩玩鬧鬧地抵達了墓地。

墓地是一片空曠。

祖墳很莊嚴的依序排列著。它們十分高聳。從最遠處的一座單獨的大墳開始，往下是兩座同



畫「故里憶圖」的小堂弟靳祖武

我的長子朱旭，也是畫畫的，他用現代科技電腦處理，把這當年「四歲的舅舅」單獨提了出來。



祖訓、祖翼、祖光、祖英、祖佑，前排最小的一個是祖武，卷首的「故里憶圖」是他畫的，我們分手時，他四歲，兩岸開放後，見面時，他四十五歲，他比我小20歲。

想不到是輪到他來幫我畫出老家，而且畫得這麼好，關於老家的資料也大部分是他幫我細心收集。

樣高度的，分列在大墳下方的左右。再往下又是單獨的一個，接著是空著兩個位子的五座墳墓的墓地。依輩份往下排。墓園旁還有兩座孤墳，是夭折而未曾舉行過冥婚的。或輩份太小的。最高的那座主墳是「虛祖」，意思是搬到盧台來落戶之前的祖先。然後才是兩位高祖，一位曾祖，及以下的祖父輩。每一座墳的周圍用磚砌成三尺多高的墳圈，上面再用土坯砌成拱形，外面抹灰或泥。墓地的周圍很好看，因爲是用無數雕著獅子狗的石樁圍成一圈的。那些獅子狗的樣子十分有趣，卻因爲它們所負擔的「守墓有責」的任務而顯得有點莊嚴。

下葬的儀式單調而又有點恐怖。我很怕看人們把棺木放進地穴裡那沉重又無情的場面。而整個的辛勞、緊張而又龐大熱鬧的喪禮，好像不應該是這樣的一種結束。

幸虧我是和堂弟們在一起，而我們是不得不被拉上馬轎車，和大人們一同搖搖晃晃的回家了。

「那司儀在遇到路祭的時候，所喊的兩字口令是什麼呢？」竟然一直都沒人能正確地告訴我們。

我們把這一天的經歷當作極爲新奇的素材，無拘無束的討論著。尤其是兩個字的古怪的口令，當我們亂猜而猜得太離譜的時候，大家笑得肚子都痛了。完全忘記了這是應該哀戚的、爲亡故的長輩出殯的日子。

卅一、世紀的省思

老家在各種困難內外交煎之下，辦好了給曾祖母與四爺「入土爲安」的大事。也許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種「死要面子」，「打腫臉充胖子」的虛榮。但如果在多少年之後，你再把這種現象加以冷靜深思，或許你也會發現，它另有一種嚴肅的意義，不容輕易否定。

老家的長輩們不想放棄對過去光榮的維持，是因爲他們覺得對祖先有責任，這爲祖先負責的態度就與「打腫臉充胖子」的表面上的意義大不相同了。

節衣縮食維持家風的苦心孤詣，是來自對中國倫理的由衷的遵奉，其中不僅是榮譽與責任，還包括著發乎自然的愛。這「愛」，在傳統中國式的說法是「孝道」，聽來顯得嚴肅；用現代的說法是「愛」，就輕鬆自然得多了。

「孝」是愛家；「忠」是愛國。中國人用傳統倫理來維護「家」的光榮，努力奮鬥，不肯承認「家」的敗亡；中國人在外力侵略之下，堅決不肯「亡國」，也是來自同樣的倫理因素。

老家也是由於這份極力要維持祖先聲譽與光榮的心願與毅力，堅持要使「靳嚮善堂」「起死

回生」。

如果不是遭遇那麼多變亂的話，這份對祖先的敬意、愛心，與責任感，所形成的無限活力與生命力，已經給這老家打好了「中興」的基礎。它應該是可以「中興」的。

祖父那靳鄉善堂的第三代雖然揮霍玩樂，幾乎蕩盡了家財；但是這老家的第四代卻非常好。這第四代，就是伯父、叔父和父親這一代，沒有人抽大煙，沒有人聲色犬馬。他們之中有向外開拓的，在努力發揮才智；有在家維持家計的，克勤克儉，一心一意在重振家聲。而且「詩書繼世，忠厚傳家」的黑漆金字大門聯，也仍然是「靳鄉善堂」這第四代遵奉的守則。課子讀書，勤學不輟；生活卻是絕對儉約。於是，逐漸地，以前所典當質押的房產與田莊都正在陸續贖回。

中國人不肯放棄「祖產」的心情所衍生出來的不肯讓國土淪喪的心情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他們不懂得爲什麼中國人在那麼貧困的條件之下，卻不肯「亡國」。而且那麼驕傲。

中國舊社會不肯分家的心情也許包含著「無私利」與「團結友愛」的美德在內。這分力量與信念也不完全是沒有正面意義的。

父親的那一代，堂兄弟之間的竭誠照顧是發乎自然的。

父親在外，當工廠業務蒸蒸日上之後，把六叔和其他有意出來開拓的人們帶入工業界，給他們機會，從基層做起。當有變亂的時候，老家照顧我們；而當老家被內戰的「大兵」或後來的日軍騷擾，父親在塘沽接納所有要逃來塘沽暫避的家人，幫他們度過難關。當大戰來臨的時候，大

伯父總會在信裡告訴父親：「小難逃城，大難逃鄉，在外如有困難，儘可回家。粗茶淡飯，仍可無缺。……」這種無條件的彼此接納，絕非現代美國式的各自孤立所可同日而語。

事實上，在得風氣之先的知識分子，大力引進西方文化，以西方爲藍本，振興實業，改革教育，齊步向前的時候，保守的老家農業社會，在潮流不可抗拒之中，也在自然而然的轉型，默默地試圖發揮它另一種功能。它變成了一個「退可以守」的基地，讓那些「進可以攻」，外出奮鬥的子弟們可以放心出去奮鬥，但必要時，這田園式的老家卻仍能容許他們「退可以守」。以中國幾千年逐漸形成的生活模式來說，「學而優則仕」的人們，年輕有爲時，可以在外工作而有所建樹；但老來可以「解甲歸田」或「辭官歸隱」，返回田園去落葉歸根。這不但保存了農業的本身，使它能持續擁有農業社會時代的重要性；而且也爲變遷中的工業時代，預先留下了「退休」的餘地。以「歸返田園」的倫理力量，取代「掃除到養老院去」的社會負擔。這項自然形成的社會穩定之力，如果給它機會去好好發展，未嘗不可以成爲很具特色而且非常自然的「中國式」的「老有所終」。這不僅能夠顧到工商業與田園的同步前進，互爲輔助；而且也顧到了溫馨的倫理，和家中人們不同性向的發揮。

在這一方面來說，老家在社會劇變的情形之下，卻正在不聲不響地樹立著這樣一個適應新社會型態的良好典型。中國人不但是最能忍辱負重的，中國人更是最善於在不著痕跡的情形之下，知所取捨而默默地創造環境的。

它最重要的力量，一是傳統的倫理。這項倫理維繫著由大家庭蛻變為工業社會的小家庭之後的親情，可以理所當然地互相照顧。

它另一項重要的力量也是來自中國人對田園與大自然的摯愛，不肯捨棄田園並不是不進步的。證諸今日世界種種因捨棄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所產生的無可救藥的問題，即可知道，中國人的選擇之中是何等地有智慧。

中國人最知道什麼是最好的。

在變動中的取捨與靜觀待變的定力，是中國人所獨有的。

在世界從戰爭殺伐，走向因放縱貪慾與自私所帶來更可怕的滅亡危機之中，我們特別惋惜這份「中國式」的對現代生活的調適，竟因為急於「革命」，未能給它所需的時間，而中途殘毀。如今想要再找回這項現代世界所急於尋找的「進可攻，退可守」的道路，恐怕是很難的了！

農工商業失去平衡與互助，人們失去歸返田園的晚年最美好的歸宿之後，一切的奮鬥與收穫都由於晚年的無望而將要成為人類的一項徒勞。實在是非常可惜而可嘆。

卅二、書生之見格調高

大家都熟知的一首「勞動歌」是趙元任譜曲的。

我所最早知道的一首「勞動歌」不知是誰譜曲的，它的歌詞和曲調也和後來的略有不同。歌詞每段的前半首是和後來的勞動歌一樣的，後半首的「哼哼哈哈」，到了第二段，變成「咿咿唔唔」，第三段是「鼾鼾呼呼」。而第三段的起首也和後來的「勞動歌」不同，它是：

「風花景，雪月天，遊罷回來又睡眠。鼾鼾呼呼，鼾鼾呼呼，休息趁閒空，一天休息幾點鐘。」……。

我最喜歡的是這第三首，「風花景，雪月天」，所有四季的美景，清涼寬朗的感覺，生活天地的可愛，都由這幾個字表達出來。

唱這首歌的時候，我讀小學五年級，北伐成功兩年了。學校正準備遷到工廠外面的新校址去。當時我們仍在老校舍上課，每節下課鈴響，就都儘快跑到和教室頗有一段距離的大院去搶著

打秋千。我是很少搶不到秋千的，因爲我個子小，排在最前面，離教室門最近，一下課就第一個跑出了教室，目標又很肯定——秋千。

打秋千的時候是最自由翱翔著的，藍天白雲就是我的大天地，飛呀，高呀，擺脫呀！歡暢呀！誰也奈何不了我呀！

「風花景，雪月天，遊罷回來又睡眠。」多自在的生活情調啊！人生是什麼？人生是美麗的四季任我遨遊，然後就是睡眠與工作，無牽無掛，無憂無愁。

這首歌，其實不是給學生做教材的。它是塘沽久大工廠工人唱的。

塘沽那些文盲出身的工人，交了好運。有人爲他們經營了這麼好的工廠，給他們工作的機會，讓他們有錢用，有衣服穿，有房子住。而且可以識字讀書。「勞動歌」的第二段不是說嗎？「認識字，好讀書，工人不是本來粗」，不錯呀！久大精鹽工廠的工人都可以進識字班唸書。又有工人室，大院裡有秋千等等遊戲用具給他們玩。拿他們當孩子一般地培植著。一九二七年，工廠開始實行日夜輪流的三班制。八小時一班。這來自西方，在美、英、法行之有年的「三八制」工作時間，在中國首次實行，是厚待工人的最進步的觀念。「久大精鹽」，「永利純碱」不待工人爭取，主動爲工人設想，在那年代，這是非常先進的。工廠當局主動讓工人了解，他們不是奴隸而是夥伴。他們有權享有正常合理的工作時間，合理的工作所得，與接受教育及休閒娛樂的機會。日夜三班制，每班八小時。如要加班，每六小時爲一個工。全年未請假者，加發工薪五天，

另有年終雙薪。舊曆年還要發給紅利。長工每工作一年就有半個月的資助金，存在工廠，退休或解雇時發給，做爲福利。

由於工廠對員工充份照顧，沒有「勞方」與「資方」的利益衝突，而只有大家目標一致，福利共享的互助。所以人人樂於負責，不願偷懶。大家自動全力做好本班的工作。交班時，不把困難留給別人。如果下班前機器出現故障，一定設法修好，即使已過了交班時間，也要堅持與接班者共同修理，直到修好才下班。接班的人也經常提早半小時到達，以便做好準備，並表示禮貌，這種自發自動的精神成爲久大與永利二廠的共同風氣，做爲這裡的員工，責任感與榮譽心之外，還加上了一分與工廠休戚相關的愛護之情。

塘沽這兩家工廠的員工給人「盔甲鮮明」的印象（他們無論穿工作服、中山裝，或西裝，在氣質上都與衆不同），不僅是由於他們工資高，待遇好，而更是由於環境與個人才幹之間的相互激盪，形成一分朝氣。那屬於工業界的人們所獨有的氣質，和財富反而沒有關係。他們並不炫耀財富與地位，和當時也在用另一種方式受人仰望的「買辦階級」大有格調高下之不同。這格調的形成，基本原因還是來自創辦人范旭東先生的遠大眼光，奉獻的精神，和教育家的襟懷。

我相信，如果他沒有這份教育家的襟懷，他工廠的員工不會這麼好。這不是「效忠」與「勤奮」所可概括，當然更不單是「高所得」所可吸引。

我沒見過范先生，而只是從父親口中經常聽到范先生的名字。當時大家人前背後，也稱他

「范經理」，但絕不是如同現在人們對上級那種近於阿諛的尊稱，因為人們也更在談到他的時候，直呼其名——范旭東。

同樣的，工廠的員工對廠長、處長或什麼「長」，也都不用官銜式的尊稱。我一直到即將離開天津，遠來台灣之前，才在其他地方第一次聽到有人在同事面前自稱「我是某主任」。那是抗戰勝利之後，塘沽另一家工程公司的職員而不是久大、永利的職員。這兩廠的職員不問你是什麼職銜，如非公事上的必要，彼此都可以直呼其名，工人對上級稱呼某某先生而已，只有技師，是大家常用來稱呼的職銜，但那也不是「尊稱」，而只是一種職務上的識別。

尤其沒有人自稱「我是某主任」的。

也就因為這個緣故，當我第一次聽到這以自己職銜為榮的自稱，覺得異常刺耳。在我以前的環境裡，確實沒有這一套。

我覺得那是使大家樂於對廠中事務共同負責的一個很大的原因，它不會使人認為「反正你職位高，因此你拿錢多，也因此你該負更多的責任。」它也不會使人認為「你是我手下的人，有責任你去負，有好處我來拿。」這是眞正的民主和平等。

這北方兩大工業的創辦人范旭東先生，雖然成就非凡，功在國家，但工廠的職員們卻只記得他經常說自己的想法是「書生之見」，「書生的傻氣」和自己這是「書生報國」。大家對他的愛戴也只得都表現在團結一致的工作上，多數人也深受他這書卷氣的薰陶，只做事，不尙空談。相

信這也是形成「久」「永」兩廠員工樸實而又軒昂的氣質的眞正來源。

附記：

范旭東的事蹟有一本書可以參考，這本書就叫《范旭東》。全書最耐人尋味之處卻是只見別人娓娓叙述他的建樹。而書中所收錄的他自己的談話記錄卻除了謙稱自己的工作態度與目標，是「書生之見」以外，實在等於什麼也沒說，好像他什麼也沒做一樣。

卅三、新派人物好老師

五年級的時候，明星小學從北平請來了兩位第一流的好老師，他們都是北師大畢業，而不是普通師範畢業的。

一位是英文老師。他的名字很特別，叫「椿子霑」。起初我們都以爲他叫「椿子露」，好容易才被糾正過來，但還是不明白爲什麼有人姓「椿」。而最奇怪的是，他的女兒插班進來，成爲我們班上第六位女生，她的名字卻叫「金學鏡」。

爲什麼父親姓「椿」，而女兒姓「金」？這奇怪的事，非問淸楚不可。於是這父女二人成爲我們注意的焦點。

椿老師一身筆挺的西服，剪裁合身極了，那時我們學校的老師都穿中山裝。（奇怪！那學校怎麼全都是男老師？）而他精緻的分頭和靑靑的鬍椿，配著白白的皮膚，以及他走路與說話的神情，簡直就像畫片裡的英國人。但他並不是英國人，他是滿洲人，旗人。旗人的漢姓是自己隨便選的。

「姓」可以隨便選，在我們孤陋寡聞的小小「漢族」人聽來，還眞是聞所未聞。原來不但世界很大，就連一個中國，也會有這麼奇怪的事。在以前，如果有人說他可以不姓他父親的姓，那眞是不可想像，甚至使人覺得他是大逆不道或不光彩的呢！

椿子霑，這英文老師可眞是「洋」化得非同小可。他不但衣服穿得「洋」，走路姿勢「洋」，說話舉止更「洋」。

椿老師第一天上課不講國語，一開口就是英文。我們「模範讀本」第一課，翻開來，等於是「天書」，完全不知道「英」文是怎麼回事。椿老師就把課文寫在黑板上了。

「a book。」他一面寫，一面唸。

可憐又好奇的我們，對英文全無概念的我們，慌了手腳。直想用國字在課本上把這英文讀音注上去，偏偏一時之間，想不出來那一個國字可以給 A 做爲注音。

椿老師看出了我們的手忙腳亂，索性讓我們把課本闔起來，直接聽他發音——a book。

當我們鸚鵡學舌學夠了，椿老師才使用他的標準國語給我們講英國人的習性。春季始業的季節，天氣還是冷的，椿老師站在教室角落的火爐前面，問我們，「你們烤火怎麼烤？」

然後他自己回答說：「中國人烤火是面對著火爐。」椿老師一面說，一面對著火爐搓手，學著中國人烤火的樣子：「好冷！好冷！」

「英國人烤火是背對著火爐，雙手揹在背後。」椿老師轉身背對著火爐：「It's cold! It's

cold!」

「因爲他們很科學」椿老師解釋：「根據研究的結果，人們的後背最怕冷，而不是肚子怕冷。」

我們大笑。

從此知道了英國人大概就像椿老師這麼「洋」。

暑假的時候，椿老師住在老師宿舍裡，沒回北平。但是來了兩位非常漂亮的女士陪他，卻沒有一位是金學鏡的母親。眞是令我們大開眼界。

另一位老師是國文老師。也是北師大畢業的。當然他唸的是國文系啦！

這國文老師很是「中國」。他的名字就很傳統，叫「張健庭」。

他的衣服也很傳統。第一天上課，他穿一件灰嗶嘰的長袍，灰西褲，黑布鞋。

他很年輕，走起路來一陣風似的，長袍下襬飄呀飄的，使我們一下子明白了什麼叫「飄逸」。

張老師「飄」進了教室，二話不說，拿起粉筆，先在黑板上寫了龍飛鳳舞的四個大字——桐葉秋風。

當我們全班還在目瞪口呆，不知這是不是已經上課的時候，張老師發言了：

「這是作文題目。你們別因爲這是春天，就不能寫『秋風』，也別因爲這是北方，你們沒見

過梧桐，就不能寫桐葉。作文，不能只寫你見過的東西，也不能只會寫眼前的事情。你要發揮想像力。秋天，你們總見過吧？落葉，你們總見過吧？作文不能給「範圍」啦！想想看，怎麼寫？」

然後他又加上一句：「說你沒見過桐葉的感想也行。」

我一點也不記得怎麼寫的這篇作文。但這位前所未見的「飄逸」老師，和他「瀟灑」的字，以及他那凌空而來的作文題目，都給我們帶來了「凌空而起」的迷惑與新奇。作文題目一下子擺脫了「我的志願」、「我的家庭」等等熟悉的題材。

是呀！大概是吧？五年級，應該有所不同了吧？

張老師好像在一瞬間把這一班「土頭土腦」的小孩抛入了空中。

「下一節課，我教你們對對聯。」張老師宣布。

「五四」以後的師大畢業生呢！不是大家都改寫白話文了嗎？他怎麼還這麼守舊？

原來他不只是「瀟洒」，而且還很「古板」呢！

這位穿長袍布鞋的年輕國文老師，怎麼這麼不拘一格？

我們很迷惑。

學了作對聯的「平平仄仄」之後，再一堂課，卻發下了講義，捨開了課本。選的是一課「元曲」。至今彷彿還記得其中兩句是：

踏霜華，恍恍行出荒草徑；
乘月色，輕輕開放破柴門。
……

上下文是什麼？忘了。

也許它是從雜劇中摘出來的吧？因爲它很像在叙述一段悲涼的故事。

我們的「新學制」教科書上也大部份是有韻的詩歌體。但它們絕對不沾一絲古典色彩，完全是「我手寫我口」的「兒歌」。

例如，四年級有一課題名「郵差」的，想像力豐富到好像那時就已看到了多年後的太空時代。我很喜歡這課書，所以一直會背，它寫的是：

門鈴響，大門開，綠衣郵差送信來。信從那裡來？信從小人國裡來。接過信來瞧一瞧，大字還比螞蟻小。看不出，快拿顯微鏡子照。信上說的什麼話？有人旅行來過夏。託我預備鴿子棚，當作旅館住一下。

門鈴響，大門開，黃衣郵差送信來。信從那裡來？信從大人國裡來。信紙方方二丈四，只寫三十六個字，約我去，大人國裡玩一次。去的路程多少遠，掐著指頭算一算，火車要走四五年，飛機要走一年半。

這課書，實在充滿了想像力及對多少年後的現代世界的預測。而五年級這位新時代的張老師卻開個倒車，給我們打開了那扇幾乎被遺忘了的、通往古典文學的後門。使我們有機會在一味追求革新的潮流中，及時地回顧到豐富的傳統。

這對我這讀了好多線裝小說，一腦子「舊思想」的小學生來說，卻是在無意中得到了一項新的肯定。

我的作文分數忽然大幅度的提高。我從這位新來的國文老師得到了很大的鼓勵。

這年的春季旅行，也由這位不拘一格的國文老師徵得學校同意，帶領我們坐一小時火車，「遠征」了天津。使我們不但看到了有名的「西沽桃花林」；也看了「南開」和「北洋」兩所有名的大學。回來之後，張老師說讓我們寫「天津旅行記」。我立刻「發揮所長」，寫了很快樂的一大篇。老師對我誇讚有加，說：「老師寫的也不過如此。」我信以爲眞，回家「據實」向父親報告，卻被父親正色地教訓了兩句：「老師這不過是鼓勵你，不可信以爲眞！」

不過，我那篇作文卻奉命陸續抄了不知多少篇，分別寄給外縣市的其他小學。雖然在我心裡仍然覺得「老師對我不僅僅是鼓勵而是欣賞」，卻再也不敢到父親面前去自我表揚了。

這使我想起三年級那次賽跑應得第一卻被判出局的事，現在我開始明白，對我來說，作文得到肯定，比賽跑得到肯定確實是有意義多了。我並沒有什麼運動才能。那次跑第一，實在是因爲同組的人都跑得太慢。萬一那次居然沒被「偏心」的老師藉口我號碼拿在手上（沒人幫我把它別

在衣服背後）而判無效，我說不定會以爲自己可以進體育系，做個運動選手呢！那豈不是「入錯了行」?!

張健庭老師除了教國文以外，也教音樂。所有代表當時代的如「葡萄仙子」、「月明之夜」、「麻雀與小孩」等等歌舞劇，都是這位張老師教我們的，還包括表演。我現在已想不起來這位穿長袍的男老師，示範「葡萄仙子」的時候，是什麼模樣，但記得由於他彈一手好鋼琴，也使我們幾個喜歡音樂的小學生得到了啓蒙的機會，奠定了我一生喜歡音樂，並且能學以致用的基礎。

張老師把我們這班教到六年級上學期結束，他就趁暑假離職到天津教南開中學去了。這成爲使我羨慕南開中學的一個較具體的原因。

我很高興，在那嶄新的小學，居然給了我一年半的時間，肯定了自己喜歡的舊文學並非落伍。

我也很高興，椿子霑先生的英文教法雖然令人緊張，但小學畢業時，我們已經唸完了兩冊「模範讀本」，能使我在升入中學之後，比同班同學「搶先」了一大步。當別人還在爲ＡＢＣ苦讀的時候，我卻可以大玩特玩了。

卅四、分道揚鑣

章台華在讀到五年級的時候，隨父母回南方去了一次。在臨走之前，他把歷年來自己所收集的香菸畫片——彩色的「封神榜」人物像，整套的送給了我。說：

「這裡面只缺少一張姜子牙了，如果能存到姜子牙，就可以拿去換獎。」

至於說，是什麼獎呢？

是自行車一輛，不過章台華說：「即使存到姜子牙，也不想去換獎，因爲那畫片比自行車好看多了。」

我收下了他的「寶藏」，卻沒有去尋訪姜子牙。

那些畫片是當時很受歡迎的一種「大聯珠」牌香菸的贈品，每一盒裡有一張。奇怪的是，以我那麼愛看小說，幾乎所有的古典小說，章回說部，都在六年級以前看完，卻不知爲什麼，單單沒看《封神榜》。而章台華送我的那一系列畫片，卻幫我補充了一點對《封神榜》人物的知識，從那些畫片上所印的人物名字，使我總算認識了包括哪吒、二郎神、托塔李天王等人物的大致形

貌，而可以從中想像一下他們的性格。

由於這位「小君子」章台華同學，我也逐漸發展出一種對人生際遇的結論——我發現，人和人由於起跑點的不同，不但影響他日後的發展途徑，而且也影響他的人生觀。

五年級以前的章台華和我一樣，一派天眞。五年級以後，忽然發現了分歧。不僅是章台華和我之間的分歧，而且是很多人與人之間的分歧。

這分歧點的來源，是在老師問大家，「畢業以後準備考那一所學校」開始的。

那員工子弟學校，校名是「塘沽明星小學」，「明星」是久大精鹽的商標。這「明星小學」因爲久大精鹽的創辦者和職員們那得風氣之先的西化與新潮而顯得十分突出。在當時，所有的教學內容，教員聘請，以及教育觀念，無一不是走在時代前面。塘沽久大精鹽的高級職員，待遇好，從年輕時代即已高瞻遠矚，信心十足。對子弟的教育更是以他們自己受教育的歷程和對大環境的認識來期望子弟。而一般職員及工人子弟，在這方面就不完全相同。各人對自己環境的考量往往就會從爲子弟選擇學校時的考量而顯出了分歧。

「畢業後要考那一所學校呢？」

異口同聲答「南開」的佔了大多數。而他們的聲音也最大。

因爲「南開」是聲勢赫赫的好學校，造就出來的有名人物很多，對社會的貢獻也大。「有爲者」當然要選擇「南開」。能立志去唸「南開」的人不但要功課好才能考取；而且要家境好，除

此之外，唸初、高中之後，一定要有力量升大學。由南開中學到南開大學，一爐陶冶出來，當然前途似錦。

那麼，其他的同學呢？

有些家中人口衆多的工人子女，回答的時候就很猶豫，因爲他們的家長大部分沒進過學校，因此對子女日後的升學問題也很茫然。他們根本對外面的學校沒有概念。所以其中有一位高個子男生的回答是：「我爸爸要我進工廠的『鐵工房』做工，幫他掙錢，」引起同學們一陣哄笑。

那男生紅著臉，兩眼直看著黑板的樣子，使我忽然對他十分同情。

老師也問到我。我的回答是「河北女師」。

有幾個女同學很不以爲然地異口同聲要求道：「唸南開嘛！我們可以繼續做同學呀！」

我不記得怎樣回答的，我只記得當時突然感到一種不尋常的氣氛，好像在一刹那之間，我變得孤立起來。

「念南開的」和「不念南開的」，竟然不是同一類的人了嗎？我不太了解，但我感到一種「固執」的心情逐漸佔據了我。好像自己忽然開始懂得什麼叫「立志」和「圖強」。

這「固執」的心情也好像從此就跟定了我。很奇怪，也許我那時是剛剛長大，「個性」在出現；也許是受了那一陣使自己覺得忽然「孤立」的氣氛的激發，使我忽然看到了自己內在那「不服輸」的個性。

我的「不服輸」從來沒有形之於色。我表面上是很柔和的。我也喜歡柔和。我不和人對立，不在言詞上尖銳，不為自己辯護或抗爭。我非常的不聲不響、外表看，我還是那樣，內心裡，我知道了——這世界是不一樣的。

章台華屬於那許多「念南開的」。他從南方回來，考進南開之後，我們就沒再見過面了。和其他那些「念南開」的同學竟然也一畢業就永遠分手，倒是很令今天的自己不了解的。因為我們仍然是同一工廠的員工子弟，住在同一範圍的員工宿舍裡。寒暑假都會回來的，而我們卻就那樣不知其所以然地分道揚鑣了。

我選河北女師，其實是父親的意思。他的理由是：

一、這學校辦得好，歷史悠久，校風淳樸。

二、女孩子學師範不但可以做老師，而且也有益自己將來教育子女。如想升學，也一樣可以升學。否則有一技在身，可以無往而不利。

父親好像早已預見我會由於戰爭而被迫提早走入社會。他的安排成為一項預言。七七事變，八年抗戰開始時，我是剛剛一步踏出校門，連正式文憑都還沒拿到手，就以十九歲的年紀去鄉下教書，自食其力了。

如果我不是讀師範，而只是一個高中畢業生呢？我又如何能在戰亂中自食其力而且幫助家計呢？

我是那麼百分之百地要幫助父親。而我做到了。

然則，這「起跑點」的形成與確定，又是多少複雜的因素互相累積、互相激盪而形成的呢？恐怕這應該追溯到我那由盛而衰的老家；追溯到空有極高才華而中途殘毀的祖父；追溯到父親悽苦的童年……，當然，也一定會加上了我那全心爲父親設想的心情。也許還加上我所讀過的那許多舊小說。

我好像確實是比較適合讀河北女師的。

這學校不但校風淳樸，而且是最能作育英才的學校。它的好處是非常內在卻又非常久遠的。它適合我天性中的許多面，當然也包括了我那喜歡獨立特行的「固執」。

卅五、中學裡的小學生

「不可，不可，不來可報魯德，不來可報魯德……」

初一的同班同學葛德靜，是沙河縣人，晚自習的時候，很小心地把她自己加在英文旁邊的國字注音，反覆地唸著：「不可，不可，不來可報魯德，不來可報魯德……」

「book, book, black board, black board。……」

看她越唸越小聲，越唸越睏，我把我的零食清水蘿蔔分一片給她，「嘿！『疙疸定』！別那麼用功！吃塊蘿蔔提提神！」

「疙疸定」是我們按她名字的諧音給她取的外號。

她和善地對我笑著，「英文眞討厭！你多好！早就唸過！」

於是，我教她唸英文，同時自己抄歌詞給另一位同學，她叫沈秀玲。

沈秀玲白皮膚，大眼睛，聰明伶俐。她是走讀生，家住天津，是典型的都市人，會唱京戲，但不會唱學校教材以外的歌。我把在明星小學和一位插班生黃石麟學來的歌舞教給沈秀玲，準備

在歡迎新生的遊藝會上去表演。這首歌叫「艷陽春」，是按照杜牧的「清明時節雨紛紛……」的詩改寫成元曲風味，變成北方調子。有唱有和，表演起來又有點像「小放牛」。它的歌詞是：

艷陽春，清明時節雨紛紛。
沾衣襟，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牛背忙欠身，
遙指草橋道，一片白雲深。
青山翠隱隱，春水碧沉沉。
酒旗飄林外，茅屋靠山根。
這就是杏花村。

我選這首歌和沈秀玲一同上台表演，班上同學都很高興。因爲有人樂意去替她們「出鋒頭」，她們就等於得到了解救。那些看來比我們年齡大的同學，多數是從外縣來的。河北女師是省立學校，招生對象以河北省籍的爲主，學雜費全免，宿膳也是公費。天津是直轄市，反而得不到這項優惠，本市的學生以及附屬「中學部」的學生並不是公費生。我是蘆台人，屬於寧河縣。當年寧河縣還未被列入天津市，所以我是公費生。

河北女師全校各班級包括學院部各科系，絕大多數來自外縣，因此也絕大多數都是住讀。外縣的風氣比較樸實，也比較保守。但在另一方面，卻也由於未受都市流行時尙的感染，反而帶來了許多發自各人才華的獨創性。那種自由發揮的美，正是外面跟著流行與時尙走的人們所缺少的。再加上那來自傳統社會的謙虛互助的美德和待人接物方面的成熟，使我受到不少的照顧和「寵慣」，因爲我在她們眼中，實在像個「小孩」。

和我同樣喜歡蹦蹦跳跳的同學，在班上大約有五六位，沈秀玲是其中之一。她和我都是小個子，我們一起坐在教室的頭一排，她排頭，我排二。彼此有共同的興趣——唱唱跳跳；但也有很不相同的興趣——我喜歡簡樸，她喜歡穿戴，我喜歡運動，她一放學就回家了。每過一個周末，她就告訴我，又去聽了什麼名角的京戲。

我們二人表演的「艷陽春」頗獲好評。

河北女師是六年制，從初一到高三，都是「師範」，分爲「前師」和「後師」。我考進去之後，一點也不覺得自己是個「師範生」，一切仍然延續塘沽久大工廠子弟小學的作風，帶著一身來自工業小鎮的勇於表現的「實行」的精神，非常喜歡上台表演。也許同班同學早已看中了我這「小孩」足可以在許多「拋頭露面」的項目上替她們去抵擋一陣，於是不但歡迎會上有我和沈秀玲的歌舞，而且還推我去致答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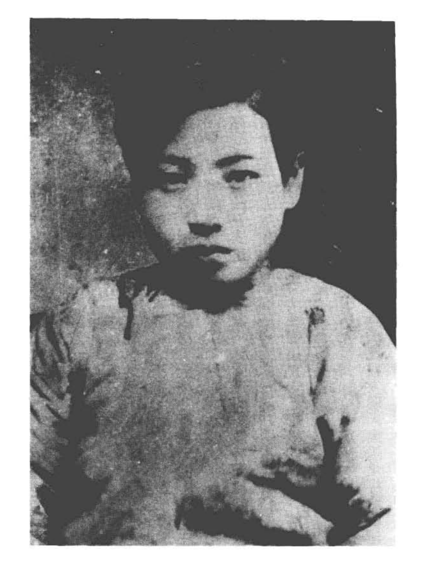
我當然一口答應，小學的時候我就喜歡上台講故事。即使沒有故事可講，單單爲了上台，我

也要臨時編一個。致答詞，和講故事當然「沒有什麼兩樣」。

不記得答詞的內容，卻記得那講桌太高。站在那裡，露不出頭頂，結果是司儀同學給我搬來一個櫈子，才得以完成任務。

不記得當時我身高多少，只記得體重五十八磅。歡迎會的時候，剛入學不久，還沒有制服，我穿的是一件極短的黑色「迷你裙」（那時正流行），脚下一雙籃球鞋，還剪了個「赫本頭」（那時也正流行）。現在想想，那雙籃球鞋眞是「敗筆」，否則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很「現代化」的。那籃球鞋卻一定顯得我很怪模怪樣。不過，也許就因爲個子那麼小，裝束又那麼怪，而且還上台講話，又唱又舞，所以一下子贏得了全校各班上千位同學的注意。幾無人不知三十三學級有個「小」學生。「知名度」就這麼打開了。

老同學歡迎新同學的方式是「拉朋友」。高班同學像「相親」一樣地在新生之中，挑選自己喜歡的，去拉來做朋友。我在很短期間就被每一班的同學輪流拉去。那時最高班是二十五學級（女師自廿九學級以後，半年一班），我從這二十五學級的一位「解」學姊開始，二十六學級一位鋼琴好手「宋」學姊，二十七學級一位運動明星「畢」學姊，二十八一位大美人「閻」學姐……還有中學部的，後來我「升任」學姊，又去「拉」或被「拉」到較低學級的教室或寢室去認識別人。低年級的同學我最喜歡，因爲她們比較愛玩，無論是打球或是吃零食，都是找她們最方便。



民國二十年春節左右，為投考河北女師春季始業班所攝，時年十一歲半。58磅體重，小小個子，正班落榜，考入補習班，半年後，升入正班，是第卅三學級，從此進入了我一生的「黃金時代」，《羅蘭散文》一、二輯中的文章，大部分出於這段歲月的回憶。

這張照片是幼弟祖耀在與我取得聯絡之後，輾轉寄來，原照他隨身攜帶，走南闖北，從未離手，這是翻照放大。

我很快地認識了全校各班的一些有特色的同學，以及與這些同學有關的各種活動。這使我在受師範教育的六年時間裡，從生活中所學到的遠超過了課本所給我的。朋友多，使我成爲一個喜歡校園遠超過喜歡教室的人。在校園裡，無論是和同學散步、談天、看球賽、看體操表演，或唱歌，以至於只是獨自坐在校園一角，對校園的景色做個全心投入的欣賞者，我都覺得十分快樂。

由於我剛進這學校，就被推出來在歡迎會上致答詞，而打出了「知名度」，於是，班上的自治會選演講股的時候，就把我選出來做股長。

很奇怪的是，這「股長」的爵位卻對我產生了相反的效果。我發現自己不但完全不能接受當「股長」這事務性的工作，而且從此連演講也失去了興趣。自從當選「演講股長」之後，我竟然就再也沒有上台演講過。所有輪到我上台講話的事，我都極力拒絕，好像我突然看到了它有完全和我興趣不同的一面，而一下子就與它絕緣了。

這件事，可以說是令我對自己最大惑不解的一件事；但在另一方面，它卻也許是我有生以來最使我「發現自己」的一件事——我原來是如此極端地不喜歡把「好玩」的事變成「工作」，因此情願放棄它了。

也許就因爲我這極端不肯受約束的個性，使我在河北女師成了一個因爲愛玩而交遊廣闊、活躍的學生，卻從來不曾參加過學生自治會之類的活動。我時常逃課，卻並非不守校規，因爲我只是「逃」出教室，卻並不離開校園。所以雖然有被老師記四十二小時曠課的紀錄，卻被教務課主

動幫我改成了「病假」。我雖不用功，卻並非不唸書，所以能勝任各種考試。至於說，喜歡唱歌卻不肯上台表演，那倒是眞正河北女師那不喜歡突顯個人而只喜歡大家同樂的校風所感染。我在這學校六年，從頭到尾，悠遊歲月，與世無爭。幾乎全校都有知己，上至學院部各科系，下至師中部、勞師、簡師、鄉師、幼師，直到離開學校多年之後，提任何一班，我都能說出一連串出色的同學的大名。

卅六、愉快的校風

「老師！老師！這題爲什麼是這樣？」我捧著代數習題問。

這「老師」並不是老師。她是班上的同學。如果她是老師，我反而不會去問她。我覺得老師遠不如這位同學，能在關鍵的問題上給我適當而又高明的指點。

這位同學名叫張淑英。

在各科老師之中，教小代數與三角、解析幾何與大代數的是同一位教師。他姓曹，因爲初三的功課表上塡寫的是「曹。三角」。我們就簡稱這位老師「曹三」。

「曹三」上課眞是枯燥乏味極了，我幾乎沒有一題是聽他講課聽會的，我簡直是不聽講。不聽講的原因當然是對這門功課沒興趣，但後來我發現，大部份原因是我對他講話的口音及聲調沒興趣。你知道，有人的聲音聽來使人十分睏倦，他就是使人睏倦的那種聲音。有人的聲音聽來使人緊張，生物老師那過份健康的牙齒所發出來的聲音就是令人緊張。我猜想，我逃課的原因多半是逃那講課的聲音。

國文老師的聲音溫潤，我不逃；心理學老師的聲音愉快而節奏鮮明，我不逃；音樂老師的聲音先天就有極好的共鳴，我不逃；公民老師的課，我一定逃，因爲他吸氣的聲音使我牙痛。（後來我發現，日本人說話的時候，最愛用這種方式吸氣。）

逃課的結果當然是不會做功課，平常不交作業沒關係，老師好像明明知道，也原諒我。考試的時候，事關成績單，就不能再掉以輕心。於是，每當月考或期考來臨，別人都按部就班，依考試科目的順序溫書，我卻是從一個星期以前就先「溫」數學。而「溫」數學的方法是找張淑英借整本的作業習題，從頭到尾一題一題地抄。在抄的過程中，我用自己的方法去了解那些習題，每抄一題，了解一題，實在看不懂的才去請教張淑英。

張淑英個子不高，是外縣來的，念書的成績一流。班上另兩位功課好的同學是張文淑和陳全璋，她們都非常用功，幾乎從來沒見她們打球、唱歌或吃零食。在這三位同學之中，張文淑比較嬌怯，使我不忍心常去打擾她。陳全璋是走讀生，不太容易去麻煩她，因此只有張淑英最方便，她眞是「有求必應」。尤其因爲她們這些功課好的同學在月考或期考之前所要準備的功課都是那些需要「背」的。數學是靠平時的理解，根本不在她們準備的範圍之列，所以把習題整本借給我，一點也不致耽誤她們的用功。這眞是我的幸運！我和她們剛好相反，考試以前只需全力去拚數學，那些用「背」的功課難不倒我，我只要在考試前一天的晚上，把筆記從頭到尾唸兩遍、背一遍，就穩操勝算了。

張淑英對我非常好，不但在數學方面「循循善誘」，生物、理化，也是請教她的時候多。六年師範生涯，我成績單上那「全甲」的高分，不是老師教的，而是同學教的。眞感謝同學的慷慨，不把我當競爭的對象。

同學之間肯幫忙，不嫉妒，不在分數、名次上爭一日之短長，是使我對這學校念念不忘的最重要的原因。我曾寫過好幾篇有關這學校溫暖友愛的校風的文章，包括那不登記分數，也不登記名次的成績單；那分組上課，不以技術爲標準，而以身體健康情況爲考量，分組施教，分組訂定計分標準的體育課。成績單上不登記分數和名次，而只登記「甲乙丙丁」「等次」的考核方法，那成績單鄭重其事寄到你的手中，卻只告訴你，你的成績是在這樣的幾個範圍。至於說，究竟是幾分，或考第幾名，學校不強調。也就因爲這個緣故，同學彼此之間也就不會在分數細節上去斤斤計較。學校這樣做的目的是培養學生寬朗的心胸、高遠的視野和同學之間的友愛互助。這是最好的「群育」。同學之間由於沒有分數與名次的競爭而彼此能以眞誠相見，這是使河北女師的學生無論是在校期間或畢業以後，都能親如手足的最大的原因。

至於說「體育」課，更是發揮了愛護和培育的最可貴的功能，它採用「能力分團」，方法是把每三班的體育課排在同一時間，再以身體的健康狀況和技術上的天份來分成三組，分別上課。身體好，技術也好的分在甲組；身體好但沒有什麼技術天分的分在乙組；無論技術有無天分，只要是身體健康有問題的分在丙組。三班混合之後所分成的這三組，在同一時間，分三個場地，由

三位不同的老師上課。甲組馳騁疆場；乙組也一樣有類似的課程，但不必那麼需要天才；丙組在體育館室內上課，做柔軟體操等等不需太多體力的運動，目的在於保養。其中也不乏從甲組調來暫時「保養」的學生，等她們身體狀況復原之後，可以再調回甲組。而這三組學生用不同的考試標準計分。甲、乙、丙三組學生都同樣有評分得「甲」的機會，各組的「甲」價值相等，這使得即使不能做運動選手的同學也不致在「明星級」的同學面前自卑。全校對體育活動的熱愛形成活潑明朗的校風。各類運動會或球賽，人人樂於參加觀賞，給運動員加油，自己也分享各項運動的快樂。而有天份的運動員也不致成為給學校打「知名度」、爭光榮的工具，他們的身體狀況隨時得到重視，若有問題，隨時調到「丙組」去「維修」。

教育上的「德智體群美」五育，能夠不僅是口號與課本，而是把具有創意的教育方法認眞實行以發揮實際的效果。這正是「師範」學校對「教育」二字的眞正了解，並且能夠身體力行的最佳「實證」。河北女師能在這些方面做到研究與實踐，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至於說五育中的「美育」，身為喜歡音樂、美術與詩文的學生之一，我特別能體會到河北女師在這方面的優點。首先，學校的鋼琴室二十多間，是開放的，隨時去練習或只是去「玩琴」，絕對不受限制。音樂老師在學校的地位很崇高。音樂教材的範圍廣闊自由，隨老師去搜集來做為教材，不受限制。歌譜的印刷是「世界級」的——銅版紙石印，標準型。而且有全部的伴奏，課外的音樂社團包括了合唱、京劇、崑曲等等不同性質的音樂。美術老師也都是一時之選。

而最重要的「美育」還不止於是音樂、美術課。學校在培養學生的「欣賞力」與「創造性」方面，「寓教育於生活」。那種寬朗自由的氣氛，即使在幾十年後，標榜自由與現代化的學校中，也是非常少見的。河北女師最傑出的「美育」薰陶是來自校園。那每天課後洋溢在校園中的歌聲，運動場上的球聲、同學的笑語，由葱蘢花木間，或冬季寒鴉歸巢的樹枝線條間悠然地傳來，襯出同學們由於學校給予充分自由所形成的個人風格，那眞是最生活化而又最具獨創性的「美育」教材。由於髮型與課外服裝都不是學校規定的，所以每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個性喜好來決定自己的「型」。喜歡運動的選擇飄逸的短髮，喜歡修飾的選擇可以變化花樣的長髮或是用火剪燙出不同的特色。課外的便服更是各人別出心裁，樣式顏色眞是多彩多姿。校園中沒有「流行」而只有特色。欣賞力由這各式各樣不同的風格，在無形中培養。那種決不千篇一律的美，是最具創意又最天然的藝術。每個人都有機會欣賞別人的創意，同時也都隨時可以發揮自己的創意，表現自己與衆不同的個性與獨特的風格。河北女師所培養出來的不僅是有教無類的好老師，而更是有選擇力的好公民。它的校歌也正是我們身體力行的生活與工作的指標：

勞作慣攻苦勤，女教謹嚴師道尊，
春風桃李文質彬彬，百年大計此樹人。

卅七、平穩的物價

父親手裡握著一把銅元，很快地把它們從右手滑到左手，然後開玩笑地問我：

「你猜這是多少？猜對了都給你。」

我順口一猜道：「二十三個。」

父親一數，不多不少，果然是二十三個。於是我得到了這二十三個銅元。

我那時大約是十三歲左右，剛唸「前期師範」不久，前期師範相當於現在的初中。

二十三個銅元，相當多少錢呢？

那時候，燒餅油條一套兩大枚，而且好幾年都沒有變過。我讀小學的時候就是如此。兩大枚，就是兩個銅元。零食花生米一大枚一包，小孩子向父母要零用錢是「一大枚」或「兩大枚」為單位，一大枚就是一個銅元。

銅元是輔幣，原訂一百個銅元換一個銀元，但由於銅價或鑄幣成色的問題，兌率有到過四百多枚的紀錄。只是它不影響我的「民生」，所以兌多兌少我並不去在意。

銀元是很漂亮的，白花花，亮閃閃，光潔可愛。尤其當人們拿起兩個銀元互相敲擊，用所發出的聲音來判斷成色的時候，那聲音之清美，眞是如同最好的音樂，使人側耳追尋不已。

當時的薪水是用銀元發放的。小學教員月薪十六元到二十元。久大精鹽的工人工資每月八元至十元。職員方面，一個大學畢業生剛進工廠，月薪四十四元。可見其待遇之好。另外還有年終的雙薪和紅利，高級職員每工作三年有三個月的休假。工廠給予路費去外地旅行。久大員工待遇好當然是因爲工廠賺錢多。賺錢多而沒有「暴利」的感覺，是因爲制度健全，福利合理。以紅利來說，每年大約發一個月薪資之譜，有時是半個月，全看工廠盈餘多少而定，員工平時薪資就高，所以不會演變爲全靠紅利來表現。工廠收支透明公開，平時爲鼓勵儲蓄，由工廠從每人薪水中預扣儲蓄金，工廠再給相對基金，做爲固定儲蓄，以備不時之需，離職時可以連本帶息一併領取。

中國人以前用銀兩，也用金元寶做通貨。中國的銀幣始於乾隆年間。在西藏的拉薩鑄造。光緒年間鑄造的龍洋，幣面上鑄有蟠龍花紋。清末有許多外國的銀元在中國流通，所以那時常聽長輩說，「這是墨西哥銀元；那是美國銀元」，覺得甚是花樣繁多。而中國自己鑄造的銀元以「袁大頭」爲最有名。

銀圓的成爲貨幣是從外國開始的，所以叫作「洋錢」。雖然以後是中國自已鑄造了，「洋錢」的名稱並沒有更改，而且常被人們稱作「大洋錢」或「現大洋」，因爲它們實在是用貨眞價

實，相當貴重的成色八八〇的「銀」所製成。是很「大」的。當時通行的「袁大頭」，至今有名。這種銀圓，一面刻袁世凱肖像與鑄造年度；一面刻「嘉禾」圖案及「壹圓」字樣。有了「袁大頭」之後，不僅墨西哥銀圓及其他外國銀圓日漸減少，就連舊有的「龍洋」也漸漸淘汰了。

「洋錢」在當時也是婚喪嫁娶送禮的最實惠的選擇，因爲它既是「禮金」，又是「禮物」。曾見父親在送同事結婚禮金的時候，附一張紅條，用毛筆恭楷寫著「『番佛』兩尊，藉表賀忱」的字樣，「番佛」者，錢幣上的外國人像也。袁世凱也當了好一陣子「番佛」。

父親每月給我四個銀圓零用。每周一圓，實在是十分闊綽了。我的零用錢大部分是用來買零食——花生米、山楂糕、熏雞腸、甜麵包、蘭花豆、青水蘿蔔和柿子。這是在學校飲食店可以買到的。而我們師範生有公費，教育廳發的伙食費也是四圓一個月，走讀生每月可以領取貳圓，因爲他們不吃晚飯，公費可以照領。

當時的物價，麵粉二圓一袋，大米十六圓一百斤，香蕉從南方運來，因爲量多，所以不貴，在地攤上買，一毛錢一堆，約有五、六個，蘋果族也是論「堆」賣的，一毛錢一堆。「毛錢」有單角和雙角，十進位，十毛兌一銀元。「毛錢」也是銀製的。

那是物價相當平穩的一段年月，家中傭人每月五圓，比一般待遇高，管吃管住，絕對效忠。

學校圖書館費，每學期二圓。

有一陣，市面上出現一種「一折書」，大達書局印行，大部分是古典小說和通俗說部，便宜

到好像白撿一樣，大家都買得起。很收到普及之效。
柯達照相機，學生型的五元一架。

我是從一開始懂事就使用銅元和銀元。但是對另一種銅幣也不陌生。那時我們叫它「銅錢」或「大錢」。它的學名應該是「制錢」。這種錢，中間有個方形的孔，也就是從前有些文人筆下的「孔方兄」，單位是「文」，一千文叫一串。清代本規定一串制錢相當於銀兩一兩。但由於供需關係，並不固定，但「錢串子」還是由於這種制錢的串法而得名。它變成一種小爬蟲的俗名。在本書前幾章裡，我曾經談到它，長得像蜈蚣，但無毒。

「制錢」到了我會花錢的時候，早已不流通，它在我們生活裡，變成了一種「玩」的東西，用來做毽子的底托，最爲理想，是我上小學時的珍玩。和制錢一類的「老錢」之中，還有一種特別大的銅錢，一個可以抵五十、一百或兩百個小銅錢，因爲太大，對我們小孩子來說，反而不知道它有什麼用處了。

現在想想，這些眞正的「錢」，如能存下一些，卻是很有市場，能夠發些小財，可惜當時是隨隨便便就都不見了。

民國二十四年，由於世界銀價高漲，政府公布停止銀本位制，發行法幣。規定「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爲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部沒收，以防白銀偷漏……」

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國步調逐漸一致，大家希望合力建國，雖然日寇不斷蠶食，國難

並無一刻止息，但是，民間愛國意識反而因此更加強固。一致對外的心情，使中國在七七事變之前的那一段十年時間裡，在日本的各種陰謀與壓力之下，仍然以穩健的腳步前進。那十年，也可以說是中國最看好的十年，正是我從小學三、四年級到女師畢業。特別是在女師的六年，因為年齡比較大了，能夠體會到那時代堂堂前進的步伐。

女師是全公費，只需繳少量的圖書館費、預償費之類，負擔很輕。而父親的工廠卻是以實業界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大步邁進，收入十分豐富。於是，父親就把原本為我準備的預算陸續「追加」，化為大量的零用錢，給我花用，使我在同學眼中，成為相當「浪費」的學生。

但即使浪費，也是很有限的。我花錢的範圍其實很窄。除了在校內「飲食店」買零食，周末出去還是買零食之外，較多的花費也只是偶爾玩玩照相機，或買些卡片之類。學用品沒有什麼可經常花錢購買的，只有勞作課，有時要買一些綢布、綉線之類的材料，數目也很有限。何況我的勞作大部份是幫同學抄筆記交換來的（把她們做壞了的替我交去）。我幾乎從來也不看電影，也不買雜誌，更不願耗費精神去穿穿戴戴或買什麼化粧品。當時同學之中，有衣著十分考究的；也有很多人是按時到理髮店去做頭髮的。而這些離我都很遙遠。

六年女師生涯，是「玩」過來的，它的快樂逍遙與響亮，完全是學校和久大精鹽共同所賜。

我愛那工廠一如我愛我的蘆台老家。塘沽，是工業的，有來自工業的明朗、規律與朝氣。塘沽又是屬於大自然的，浩浩蕩蕩的河水，與無涯無際的海洋，在亙古的天空下，寧靜自然的美，

毫不保留地給你自由開拓，任意施展的無限空間。那「工業」，並不是噪音和汙染的代名詞，而是人類智慧與對大自然及國土同樣敬愛的心情的大結合。

久大精鹽，是父親的化身；父親，是久大精鹽的象徵。不只我父親一個人是這份象徵；而更是全廠的員工與他們的眷屬，大家所共有的一種精神。這樣的一分向心力，是經營者的成就，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堂皇的起步。

日本人是很怕看到這現象的。

所有的外國人都是很怕看到這現象的。

當他們眼見中國的年輕實業家在朝向建設方面大步邁進；當他們眼見中國人不想再自相殘殺，而他們恐怕不再有機會用金錢與權力去蠱惑不同派系的中國人互相動武，讓他們假中國內戰之名來行瓜分中國之實的時候，他們是非常恐懼的。

中國太大了，太有潛力了，他們「不能坐視」。日本人尤其「不敢」坐視。

卅八、小記「九一八」

「九一八」那天，我穿的是一件紫白相間，豎條紋的布料旗袍。

你或許覺得奇怪，為什麼那麼驚天動地的事件中，你只記得你的旗袍。

我不是「只記得」我的旗袍；我還記得法租界西開教堂門前流動攤販賣的餛飩。眞糟糕！那初一程度（前師一）的十二歲年齡，懵懵懂懂，心理年齡比十二歲更小，剛剛離家住校，住在那古老的木造的二樓宿舍裡。對環境的陌生感還沒有消失，學校裡所發生的任何事，對我來說，都是「意外」。所以「九一八」這天的事，就也屬於衆多「意外」之一。而我那件紫白條紋的旗袍卻就是記錄這「意外」的標誌之一。

那晚，我睡得正熟，忽然被同學推醒。睜眼一看，但見全室燈光通明，同學一個個都已衣著整齊地站在那裡。

我大驚，連忙坐起來問，發生了什麼事。

同學催我趕快！「鬧便衣隊」了！學校要送我們到租界去避難，卡車在外面等。

「帶著錢！」一位同學囑咐。

我不知道什麼是「便衣隊」，更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麼嚴重。只匆匆忙忙換下睡衣，慌慌張張穿上旗袍，就是這件紫白相間條紋旗袍，很鮮明地記錄了我在那瞬間的緊張失措，加上剛從睡夢中醒來的茫然，穿上這件旗袍，仍不知還有什麼事要做的迷糊混亂，好像就都在這紫白相間的九月裡交織起來，冷冷的。

五部大卡車，帶著我們分成幾組的住校女生，深更半夜，浩浩蕩蕩，開往法租界西開教堂。那是一所有名的天主教堂，但我這剛剛考進河北女師的外縣學生來說，卻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來到這高聳的建築門前。

我不知道學校當局是在怎樣一種關注時局、擔憂學生安全的心情之下，挑燈夜會，商討出這樣一個緊急應變的權宜之計。他們終於決定接洽好西開教堂，再叫來五部卡車，然後開亮全校寢室的燈，把學生叫醒去避難的這過程，需要多少斟酌與擔當。他們的決定是萬不得已的，也是迅速而果斷的，因爲沒有人知道日本人會製造多麼嚴重的事端，發生什麼樣的後果。

但是對我這小小的連報紙也不看的初一學生來說，我可一點也不知道事態的嚴重。倒是深夜站在卡車上，扶著前面車頂，讓汽車載著我們開行，那可是最新奇好玩的經驗。有生以來，這還是我第一次站在汽車上呢！以前只坐過火車和電車，汽油味好好聞！這位置最便於欣賞夜街的景色。

五部卡車，滿載著我們，悄悄經過天津市區，那沉睡又肅殺的感覺，是從黑沉沉的街道壓迫而至的嗎？還是因爲北方九月的冷冷秋霜？不知道，只覺得新奇。

在西開教堂下車，魚貫進入肅穆的、燈光灰黯的教堂裡面，來到樓上。靜聽老師囑咐不要隨便走動，不要喧嘩。現在東北日軍入侵，說不定會波及關內，事態嚴重，大家要格外小心等等。而我卻只記得旁邊一位名叫梁愼言的同學，因爲夜寒，一直咳嗽。她身體不好，又剛巧來了月經，瑟縮地站在我旁邊，十分可憐。至今我記得她那蒼白的樣子。

不記得那半個夜晚是怎麼熬過來的，卻非常記得次日清早，庶務課發給我們每人十五大枚銅元，讓我們自己買東西吃。法租界原來是這麼繁榮又便利的呀！我可是第一次領教到它的好處。聞風而至的流動攤販一下子就來到了教堂前面的廣場。我隨著幾位同學發現了香噴噴、熱騰騰的餛飩攤，眞好！那是我以後再也沒有嚐到過的美味的餛飩，湯裡加著蛋皮、榨菜絲之外，還特別灑上一點香菜末，又熱又香，眞是永遠難忘！

次日，天津市陰冷冷的，我們回去上課。走讀生比我們先到了，大家聚在操場，正在聽一位高班同學站在司令台上大聲疾呼：

「我們要有所行動！不抵抗主義太懦弱了！」

我們傻傻地聽著，無心上課。這時校門口也湧來了大批「全國學聯」的男生。一路高喊：

「你們不要你們的國家了嗎？我們要救國呀！要奮鬥呀！」

高班的同學紛紛響應，許多人參加了遊行的隊伍，出去請願，要求政府抗日。

留在學校裡的低班同學和不喜歡活動的同學聚在各自的教室裡，聽有號召力的同學領頭發表意見，商討如何救國和抗日。說學聯已經準備發起「民衆抗日大會」，要號召全國同胞，誓死保衛國土，使日寇知道我們的民衆不是沉默的，大家要用行動表示我們的決心，請大家提意見。

於是，有人提議寫壁報，有人提議寫標語，有人準備下次一定參加學聯的遊行。

也有人主張從小處做起，每天早晨鍛鍊身體，準備投筆從戎。這，我贊成，因爲我最喜歡鍛鍊身體。

還有主張儲蓄救國的。國家太窮了，我們要「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兩句成語是我從那時才學會的。以後一直是每談到救國，就一定有人使用，後來的「獻機祝壽」是使用最多，也是最大規模的一次。）這，我也贊成，一共舉了兩次手，覺得自己終於能夠「不自外於國人」，很有成就感。

於是，我們有幾天沒上課，日子過得自由又奇特。最有成績的是壁報和標語，紅紅綠綠，貼滿了校園內外。

「九一八」其實早已過了，日軍堂堂進入東北。中央也拿不出強硬的對策，何況我們這些學生？

但我們很興奮。日子裡充滿了激昂的情緒。

尤其新鮮的是，不上課，只等打鈴吃飯，校園裡落了滿地的樹葉，那些白楊樹的大葉子，乾乾的，踩在上面，細碎的聲音傳達著大地的脈動。

卅九、那邊「一二八」，這邊「英租界」

當然，學生們的力量也眞不可小看。我們（包括我在內），最大的成就是「抵制日貨」。那時，北方的九月，相當冷了。學生們最喜歡給自己或親人織毛衣。課外固然可以雙手不停；課內也很容易避過老師的監視。

我們所使用的毛線以日本產品——「麻雀牌」最多。因爲它品質不錯，雖然比不上英國產品「蜜蜂牌」，但「蜜蜂牌」要賣四塊錢一磅。「麻雀牌」只要兩塊錢。

抵制日貨是全國學聯發起的。天津的學聯同聲響應而且立刻採取行動，在日租界各洋行門前站崗，發現有去買日貨的立刻把他攝入鏡頭，次日見報，偏巧我們學院部國文系一位同學不信邪，跑到須藤洋行去買毛線，於是她被照下來成爲次日報上顯著刊出的一條新聞。這件事，引起了全校同學的公憤，對這位不愛國而且非常影響校譽的同學，同聲譴責，不留餘地。這位同學迫不得已，只得退學了事。

自此以後，大家絕對無人敢去明知故犯。「抵制日貨」因此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時之間，同學手中的毛線都變成了國貨「牴羊牌」。它的商標是兩隻羊用角相牴，諧音是「抵」制

「洋」貨。廠商是仁立毛紡廠，當時這產品品質低劣，顏色又只有深咖啡和淺咖啡兩種，價錢比日貨還貴。每磅兩元五角。但大家同心同德，使用國貨的結果，把仁立毛紡廠扶植起來，使它後來成爲全國最有實力，產品精良的毛紡廠。

各地抵制日貨，當然不僅限於毛線，而是凡日貨都在抵制之列，使日本商人受到極大的損失。

「抵制日貨」的成功卻使日本想用武力來威脅，而出動海軍進攻淞滬，造成繼「九一八」之後的「一二八」事變。

那時，我讀「前師」一年級下學期。距離「九一八」只有不到五個月，我這初中一所受的教育，課本上的教材就遠遠比不上生活的教材。

如果說，是「九一八」讓我認識了法租界。那麼，讓我認識英租界的就是「一二八」了。

寒假開學，我從塘沽來到天津，原以爲，只要像上學期一樣，搬進學校宿舍就是了。

不料到學校註冊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們，因爲時局緊張，上海的戰事隨時可能擴大，我們學校在「中國地」太不安全，住讀生要暫時搬到英租界三十二號路一所民宅，我們要到那邊去住宿。

英租界在那裡？我從未去過。拿著學校發的地址及頭一天的餐點費（我們師範生是公費，宿舍搬家，伙事團卻沒有辦法跟著去，所以要發錢），讓我們在尙未正式上課之前，伙食自理。

帶著伙食錢，坐上洋車，來到英租界三十二號路。眞高興，這是一所非常大的宅院，英國式的樓房，高高的石階，把許多房間打開，供我們住宿。

當然，這裡是沒有那麼多床鋪的，所以我們仍毫無疑問地是要打地鋪。同學尙未到齊，我照例是最早一個到校的住讀生，目的是爲了要佔一個靠門的位子，避免「兩頭都是鄰居」，等於現代人所喜歡的「邊間」。

但這英租界的大宅是幾十個地鋪佔一間的。地鋪沒有什麼「邊間」，反而是「非邊間」可以避免靠走道的地方人來人往，比較清靜。

我隨便選了一個位子，舍監在旁邊告訴我，這一排都是我們三十三學級的。另一邊是三十二和「中九」。

「中九」屬於中學部，家在天津市的同學比較多，住讀生很少，有人很羨慕那些不必來打地鋪的，本市有家的同學。我起初也爲這很不舒服的地鋪而不太高興，但不久，我就發現這新住所是太令我滿意了。

英租界距離河北女師，隔著一個法租界，一個日租界，一帶「東馬路」，一條名叫「大胡同」的街道，還得過個「金鋼橋」，可以說是相當遙遠。何況英租界是高級住宅區，住戶除英國僑民以外，就是中國有錢人或身分特殊的人。大家以寧靜幽美爲第一要義，出門有私家車，根本

沒有公共交通工具。好像只在海大道一帶有一條公車路線經過，車子非常少。我們這些從「河北」中國地「躍升」到英租界來的外縣住讀生，在這樣好的環境來住宿雖然是「一步登天」，但交通方面卻是十分辛苦。為趕早上第一堂課，甚至還要趕學校的早點，大家當然要提前出門，步行到法租界去搭電車。然後還要走很長一段路，才可到達學校。

於是，我們住讀生就開始了每天來往兩趟的「跨租界長征」。

至於說我呢？愛玩的我，只隨著大家「長征」了兩天，就發現這趟路實在有太多的樂趣，而不想再和同學集體行動了。

從那時起，我開始「特立獨行」。

每天清早，我比別人格外早起，用最快速度收拾妥當，就獨自一人快快樂樂地出發了。

從清靜的英租界走到法租界，從沉睡的法租界，走到店面矮小的日租界。沿途數著「梨棧大街」的電車鈴聲，穿越旭街，來到日間繁華尚未登場的寬敞的東馬路，看著那些「平熱散」「一粒丹」的倦怠的廣告牌，走過金鋼橋，一拐彎，就是天緯路了。

這趟路，慢走一個半小時；快走，一小時零十幾分鐘吧？

反正六點半以前出發就行了。我沒有手錶，心中有時間。

如果早一點出來，我可以抽空先到法租界一家小店去吃燒餅油條和秫米粥，美味無比。如果不是因為時局緊張而住英租界，那有這分自由？

唉！不過，英租界的吸力是太過分的大了。最糟的是我被它們那些漂亮的路樹所吸引，所迷住。從有些住宅簇擁到視野裡來的松柏那麼蒼翠，襯得那些落葉喬木行道樹的樹枝更顯出了線條之美。更何況那平坦整齊又寬敞的人行道和它們兩旁那風格別具的大小洋房，那是比圖畫更美的仙境，而我可以在其中徜徉，眞是快樂！爲了這份吸力，我更無心上課。每天到了學校，勉強上完第一、二節重要的課，到了第三、四節，我就無論如何也無法抗拒自己了。於是，我溜出校門，自己一個人，回英租界，看樹去。

我可以不走通往住處的路，隨便換一條，英租界幾乎每一條路都那麼清幽。我一個人在多樹的人行道上走，開始是初春的風，以後是初夏的風。樹慢慢地變綠，風慢慢地轉爲柔和，每天的感覺都很清新、自在又逍遙，完全可以忘了學校的事，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在逃課而擔心受罰。

十二點以前要趕回學校吃中飯。有時太留戀了，趕不回去，我就在經過市區的時候，到「稻香村」食品店去買兩個滷好的豬腳。有時會在經過「茶食店」的時候，買兩塊「槽子糕」，那都是第一美味，勝過學校食堂的大鍋菜。

當然，我的零用錢可能是比較充裕一些，我沒問過其他同學的零用錢有多少，只記得每次父親給我寄零用錢的時候，都要囑咐一聲「節省用度」。

但只因他從來也沒刪減過我的要求，我也就樂得理所當然地享受我的「獨遊」及「零食」之樂。

你也許要問，你常常逃課，成績單怎麼交代呢？

很幸運！我是最會應付考試的一個學生，成績單經常全「甲」。偶然有一兩科成績欠佳，那是「體育」或「勞作」，我沒天才。「法制」有一次得「乙」，卻是老師刻意要扣我一等，該得「甲」等的，成績單上是「乙」。那位穿大馬褂的鄭老師有言在先，在我要逃課外出以前，就已警告過我：

「靳佩芬！你甭鬧！我給你扣分！」

當我找他要考卷以證明我考試得分是「甲」的時候，他胸有成竹地告訴我：

「我跟你說了，要給你扣分！」

眞是狠心！一扣扣掉二十分！

但是，得「乙」也夠好的了！「丁」才不及格呢！

我爲英租界魂牽夢繞，享樂不已的時候，卻正是上海十九路軍和日本誓死抵抗的時候，也正是各地學生急於投筆從戎，救亡圖存的時候。

我天天玩，自得其樂。我的「牴羊牌」毛線，始終沒有織成我要織的毛衣。在熱血沸騰，急於搞學生運動的同學口中，凡不參加活動的都是「冷血動物」。但我知道，同學罵的一定不會是我。她們對我都太寵慣了，而我又太不引人注意了。不信你問問看，同班同學中知道我「逃課」的好像連一個也沒有呢！好奇怪呀！

四十、談談租界

在寫國難當頭的文章中，歌頌英租界，是很離經叛道的，大概也只有在達到寫「回憶錄」的年齡，國家「體質」也不再弱不禁風的這九十年代來寫，才不覺得有太大的罪惡感。

不信你現在再看看各大城市的「租界」，有那一寸土地不是歸還了中國？當年頤指氣使，用各種方法竊據中國的列強勢力，而今安在哉？（天津的租界之中，德、奧、俄三國租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收回，改為特別一、二、三區。其餘也在第二次大戰之後全部收回）。

他們當然還是在緬懷過去能在中國呼風喚雨的光榮，因此時時刻刻，尋找機會製造一些事端，一下說這裡應該獨立，一下說那裡應該自治，管的可寬哩！

好在中國經過這一百多年的各種折磨之後，等於已經打過了各樣的「防疫針」，包括「外患防疫針」，也包括「內亂防疫針」，恐怕還包括了「文革防疫針」；以後希望這一陣子的「流氓治國防疫針」也已產生了抵抗力。中國似乎不必再那麼由於體弱多病而多所禁忌了。

歌頌租界就是可以免疫的題材之一。

租界的規劃與建設足以給後來有力量自我圖強的中國做為藍本。

談租界，要追溯到自鴉片戰爭以後的五十七年（一八四二—一八九九）。中國一共開了條約口岸四十五處。拳匪之亂以後的九年（一九〇一—一九一〇）加開三十八處。前此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天津、鎮江、漢口、九江、煙台、蕪湖、重慶、杭州、蘇州及沙市，設有英、法、美、德、俄、日等國租界。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二年，天津添設俄、比、義、奧租界，鼓浪嶼添設公共租界。一九〇四年，長沙添設日本租界。原有的英國天津租界，日本的天津、漢口租界，以及澳門的界址，加以擴大。租界有如殖民地，是各國商店、銀行、工廠的集中地。

不但如此，外國在中國還有經營鐵路、開礦、沿海與內河的航行、郵政、銀行……種種特權，其對中國之任意欺凌，歷史上都有記載，能在近百年的掙扎之後，有今天這可以說「不」的局面，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珍惜才對。

現在單提天津的租界，因為它和我關係最為密切。

天津是我國第二大商埠，租界也最多。八國聯軍之後，辛丑條約訂立，允許設立八處租界，包括英、法、德、日、義、奧、俄、比。本來也包括美國在內，後美國不願負擔佔人土地之惡名而與英租界合併，所以沒有「美租界」，但是在英租界馬場道南邊有「美國軍營」，其他各國也都有駐軍。

我剛到天津做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先就因為逃「九一八」認識了法租界。跟著，初一下，因

爲「一二八」而認識了英租界。不久之後，因爲日本繼續蠶食關內，老家有親戚逃到日租界避難，使我「心不甘，情不願」地認識了討厭的日租界。

天津舊城幅員不及八國租界的一半。大家稱這舊城所在地爲「中國地」以有別於租界，河北女師就在中國地。

中國地的建築始終低矮落後，馬路也是塵土飛揚，公共設施欠佳。在中國地的住戶一直都沒有衛生設備的情形之下，英義租界早已是十分現代化。不但人行道整齊美觀，路樹種得漂亮，而且住宅內部的設備全部歐化，自來水、暖氣、衛浴全屬一流，連現代人看來都會羨慕。

天津的租界區是沿著「海河」的東西兩岸排列。在河東的是奧、義、俄、比四國租界：河西的是日、法、英、德四個租界。英租界曾擴充過兩次，範圍最大，建設也最好。英中街的工部局、利順德飯店、怡和、太古洋行等都有悠久的歷史。「海河」邊的「海關大樓」建於一八八七年。法租界大部分是繁華的商業區，有電車貫通其間，有名的國民飯店、基泰大樓、勸業場、天祥市場，都在法租界。日租界只有一個「中原公司」是高層的建築，其餘都很低矮簡陋。而且在主要街道的「旭街」上，鴉片烟館林立，給人的感覺特別是「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只管賺骯髒錢的小器作風。只有「秋山街」溥儀住過的「張園」比較有規模。而在英、法、德、義等租界的房子比較漂亮，局面也大。有許多達官貴人、軍閥、富商都喜歡在這幾個租界做寓公。不但舒適豪華，而最重要的是可以避開政治和戰爭的干擾。達官貴人是根本就定居租界；一般老百姓則

是在災難來臨的時候，找關係去租界暫避。所以一些被通緝的政治犯，平時或戰時做地下工作的人們也視租界爲最佳的庇護所。

我一進天津河北女師，就有兩個「回合」住租界，使我這出生在農業社會，長大在工業小鎮的小女生，大開眼界。在天津住讀日久之後，也藉著周末假日出校門遊玩，回校的時候，坐電車，從「國民飯店」直駛「官銀號」，觀賞法、日租界的店舖招牌與廣告。最醒目是「平熱散」「一粒丹」的大廣告牌，在東馬路雄踞一方。而最奇怪的是日租界旭街那家醫院，面對大街，電車叮叮噹噹的必經之路，寫著日本式的漢字招牌「奧田肛門醫院」。那「奧田」的「田」字，怎麼看怎麼像個「因」。所以我們管它叫「奧因」肛門醫院。好久之後，才明白那是一個日本式的「田」字。

此外就是那「靠左邊兒走」的交通標誌了。

英租界的警察最「帥氣」，黃綠卡其的制服，個子瘦高。

法租界的警察穿海軍藍，帶銅扣的制服，個子肥壯。

日租界的警察穿國防色的制服，個子矮小精悍，指揮交通時的動作特別誇張。

當然，他們都是中國人，只是每個租界選特定身材的人來當警察，和他們的制服一起來塑造他們不同租界的代表性。我們經過這不同的租界時，只要看看警察的樣子，就知道是來到那一國的租界了。

我們逃「九一八」所住的西開教堂在法租界二十六號路，我們稱這條路爲「綠牌電車道」。逃「一二八」的地方是英租界三十二號路，是純住宅區。我只發現了一個「中興洋紙行」是商店，後來才發現了「小白樓」。那是和同學湊熱鬧，到「德盛洋行」（印度店）去買「印度紗」來做頭巾。英租界的店舖也是很堂皇的。我覺得這是英國人的特性，他們先天就受不了「因陋就簡」。所以把他們所有的殖民地，包括大至美國、加拿大、澳洲，小至香港、新加坡以及各處的英租界都做極好的規劃，好像他們一開始就想到長治久安，民族性眞是各不相同的。

天津華洋雜處，是很「先進」的。它在一八八八年就有了煤氣，幾年後，有了電燈、電車和自來水。清末的幾年，開始有了汽車。

我祖父在天津的時候是清末民初。住在中國地。他已在唱片上灌過音了。

我父親工作的久大精鹽工廠的總公司設在天津法租界，那也是民國初年開始設立的。

四一、我的課外讀物

因爲我在小學六年級以前，就已看遍了幾乎所有的舊小說，考入「前期師範」（相當初中）之後，老師給推薦的課外讀物實在引不起我的興趣，於是我足足有三年時間，大玩特玩。在課堂也不專心聽講，下課後更是我的「交際時間」，幾乎所有各班都有我的朋友，散步、唱歌、彈琴、打球、看體操表演、吃零食……塡滿了我的每一分鐘。整天腦中所想，也都是某班某些位同學的聲音笑貌，以及她們的喜好及趣事。圖書館的借書證卻始終是一片空白。

其實，我是從小學就不看學校所推薦的「課外讀物」。我的「課外讀物」是父親從老家帶到塘沽去的線裝小說，包括古典名著、通俗說部和新舊武俠。對於當時新潮流之下所進入學生生活領域的讀物如《小朋友》、《兒童世界》、《熊夫人幼稚園》之類，卻是絲毫不感興趣。我想這是生活環境所造成。因爲一來，我生長在那麼古老的大家庭，傳統給了我太多的影響；二來，我從三年級，會認一些字的時候，就有充分的機會接觸線裝書，父親的書架就是我的圖書館，那種「手到擒來」的便利，使我根本用不著向外面去尋找課外讀物。而當我從《永慶昇平》、《海公

大紅袍》、《彭公案》、《濟公傳》等等說部看到《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的時候，自然就更覺得那些《小朋友》、《兒童世界》之類早已不在我的生活範圍之內。連帶對以後中小學生統統看過的西方童話集，我也只對《大拇指》和《豆藤梯》有點印象。連《阿麗絲漫遊奇境記》也在翻閱的時候，被《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給打斷，沉迷到西方偵探小說裡去了。這卻也是父親自己的讀物。

我把父親書架上的書生吞活剝地看得幾乎一本不剩。《東周列國志》的生字難倒了六年級的我。那年暑假，我揮汗和這套書掙扎奮鬥的結果，是把繡像插圖臨摹完畢，書的內容只能一知半解，有個千分之一的印象而已。

我讀的小學是春季始業。寒假投考河北女師只考取了「補習班」，剛好把始業的季節調整爲秋季始業。

河北女師的國文老師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建議我們去選購三本課外讀物：一、冰心的《寄小讀者》，二、葉紹鈞的《稻草人》，三、夏丏尊譯的亞米契斯原著《愛的教育》。我只看了《愛的教育》。此外，前期師範三年，我沒再看任何課外書。

因爲整整三年不看課外書，也不看報，我的生活內容就只剩下了「游於藝」。彈琴唱歌最有收穫，尤其是唱歌，課內課外，林林總總，無所不包。左派右派，盡入我的腦中，好聽的就會唱。包括電影歌曲在內，我不看電影，但是會唱幾乎所有的電影歌。

相形之下，在書報雜誌這方面，我是太過分地孤陋寡聞了。

勉強影響我重拾對閱讀的興趣，讓我回過頭來接近文學作品的是翻譯小說。

在我這看了太多傳統小說的學生眼中，這翻譯小說勉強可以算是「新」的東西。

這本「啓蒙」翻譯小說是《孤女飄零記》，也就是後來李霽野又翻譯了一次的《簡愛》。

我愛上那異國情調的故事，和我國傳統小說中所未曾著力描寫過的戀愛。傳統小說裡的戀愛往往反而是太缺少精神層面的描述的，我喜歡《簡愛》那種不顧一切的愛情。

迷上這本戀愛小說之後，我接著看了《少年維特之煩惱》和《茶花女》。然後我才有機會把這份好容易重拾的看小說的心情銜接到國內當時三十年代的小說。

第一本是巴金的《滅亡》，然後是《新生》，接著看《家》、《春》、《秋》。

迷上巴金的那段日子，眞是瘋狂！一面閱讀手邊可以得到的巴金作品，一面和同學迫不及待地等著他下一本書的出版。在長篇等不到的時候，我們用他的短篇、散文以及翻譯作品來塡補，與其說喜歡看他的書，不如說喜歡他那些書名——《海底夢》、《春天裡的秋天》、《秋天裡的春天》，然後就是看他翻譯的那西方勞苦階級的申訴——《沙丁》和《電椅》等等激動力非常強的小說了。

巴金是很「左」的。

當年，你不能責怪巴金的「左」，你更不能責怪我們迷上他的作品而跟著他一起「左」得那

麼熱血沸騰。

巴金的讀者群是遍佈全國的。

那時，左派的小說不被禁。那是三十年代的特色，是三十年代之所以成爲「三十年代」。它那「百花齊放」的自由思潮，對現實大刀闊斧的批判，以及承襲五四餘緒，所形成的鏗鏘有力，詞句明朗又極富表達力的白話文。其中更加入了來自西方的新語彙、新思想，以及新的小說形式，這一切，都使我們這些學生投入到這似乎是來自全世界的天風海雨裡。那不是《紅樓夢》或《水滸傳》的舊式文學作品所曾提供，我們跌入那充沛的活力，被它吸引著，投入無邊的現實生活，走入那眞正屬於我們的、我們所置身的時代。

「左派」潮流的風靡大衆，不是因爲它「左」，而是因爲它敢碰觸到現實。不只是因爲它「敢」，而更是因爲它抓得住重點。左派小說的威力超越了五四以後興起的一般文學作品。五四以後，許多小說都曾以爭取自由解放，擺脫傳統束縛爲題材。反對舊式大家庭，爭取戀愛自由及婚姻自主，及爭取男女平權等等主張，踴躍地反映了時代的新思潮；但是直到左派作家出現，才開始用激烈的態度大力揭發貧富之間的差距，雇主與佣工之間的不平等，爲佔中國絕大多數的貧苦大衆鳴不平。而這些現象在當時的中國，正是生活中觸目可見的。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確實是當時大衆生活最眞實的寫照。左派作家抓住了這一點，得到了青年讀者強烈的共鳴。

於是，儘管以我當時的年齡，並不關心什麼左派、右派，把我從古典小說、章回說部的大海裡拉到現實生活岸邊來的卻正是這些左派小說。我深深被他們那直接剖開現實的犀利筆調，和那些愛憎強烈，恩怨分明的書中人物所吸引。他們來到了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裡，把許多問題端給你看。這種與自己切身有關的眞實感，是傳統小說所沒有的。

巴金是我們當時最喜愛的作家，他的小說風靡全國。我們是一本接一本的、迫不及待地期盼著他的下一部作品。

左派作家的小說給我的第一次印象，其實只是一個短短的段落。他描寫一個富人，開著汽車全速經過下雨天的泥漿地，濺了旁邊窮人一身泥水。那富人不但不表歉意，反而搖下車窗，罵了一聲「豬玀！」不記得這是不是來自巴金的作品，但這短短的一段描寫，卻吸引著我，從此進入巴金小說的世界。

他的小說裡充滿著由陰鬱不平而爆發出來的抗議。他的主角是不滿現狀的，是不甘隱忍的，是敢於爭取的，是不犧牲眞理的，是誓死也要反抗的。

但很奇怪的是，我一面非常爲他所寫的這些不平而熱血沸騰；一面卻發現自己是站在那一切反抗與鬥爭，憎恨與否定的另一邊。我一面同情那是非分明，言詞犀利的主角，一面卻不由自主地要跳開他那烽煙戰火之外去質問和否定他。我發現，我實在是更喜歡他作品中另外一個比較溫和的角色。我不大了解自己爲什麼會喜歡《家》這本小說中的大哥「覺新」？雖然我是那麼同情

主角三弟「覺慧」。

我想，如果我是在戀愛，我會愛上「覺新」，而不會去愛上「覺慧」。

雖然，巴金所塑造的「覺慧」是愛恨分明，是站在眞理和正義這一方，始終一貫，據理力爭，很合乎「時代」要求的。

雖然，「覺新」是只爲「顧全大局」希望大家互讓一步，過分中庸，而不夠「新潮」的，但我還是喜歡和覺新這樣的人做朋友。

多少年了，我對書中這兩兄弟的觀感始終沒有改變。我不知道，那是否我這從十幾歲，就飽受中國傳統小說影響的讀者所特有的反應，或者是否所有的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傾向於和我類似的反應——我們或許大部份是比較喜歡溫和的、肯替別人多想一下，而略微約束一下自我的、慢慢改革現狀的生活態度，而比較戒懼那不問情由，摧枯拉朽以圖速效的激進派吧！

但儘管如此，我迷巴金的小說還是迷到來者不拒的程度。以我當時的年齡，並不去過問他所親近的安那其主義、虛無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想法。我只是迷他小說不尋常的情節和鋒利的筆調。直到我發現了「老舍」，愛上了他所寫的《貓城記》、《老張的哲學》，及以後的《駱駝祥子》。我覺得老舍的作品可以讓我鬆一口氣，喜歡他那由感情切入卻給人理性的弦外之音的寬厚，而又絕不會讓我變成一個不辨是非的大妥協派。

暑假或寒假，回到塘沽，偶爾見到父親的同事，比較肯和我這晚輩談談文學的人們，會建議

我看看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看了茅盾，不喜歡他的陰暗；看了沈從文，不能欣賞他的溫和含蓄；看了魯迅，不能忍受他的尖刻……最後我把徐志摩的《愛眉小札》留下來。認識一下那屬於中國新詩人的「愛情」。也曾看上丁玲的《不算情書》，覺得她的響亮作風比較適合我的品味。但逐漸看下來之後，視野擴大了，也就不再去「迷」特定的那一位作家，只是這些書讓我發現，我喜歡看個性強烈的作品，卻喜歡溫柔敦厚的朋友。

倒還是巴金，他那簡明直捷的句子，一直影響到我日後的寫作筆調。

抗戰開始之後，以及來到台灣之後的歲月，逐漸越來越體會到自己對文學與思想上的中國並非盲目的喜愛，於是，我欣賞的除了古人詩詞之外，就是林語堂了。

四二、文明與野蠻

左手拿著文明棍兒
右手拿著大呀皮包哇
洋錢票哇
哎喲哎喲
可是不少

這首俗歌，在民國十幾年的市井間頗爲流行。它的流行，是因爲其中的諷刺意味，而且這簡單的幾句歌卻活畫著當時那些吃「洋」飯，掙「洋」錢的「假洋鬼子」。他們走在時代尖端，自命高人一等，穿戴打扮「全盤西化」。所謂「文明棍兒」在當時的有些文學作品中直譯爲「司蒂克」（手杖）。當年那來自西方的「手杖」

不是給老人用的，而是模仿西方的紳士階級——穿西服、戴禮帽，手拿「司蒂克」，腳穿皮鞋，到了冬天，大部份還在鞋面上加個毛呢做的「鞋蓋」，走起路來，高視闊步，手拿「大皮包」，是學自外洋的公事包，但其中所裝的除「公事」外，還有爲老百姓所既羨慕、又不屑的「洋錢票」。

這些「左手拿著文明棍兒，右手拿著大皮包」的假洋鬼子，在中國人群中晃來晃去，出類拔萃，目無餘子。使他們如此神氣的原因，除了「洋錢票」之外，還有那爲一般人所高攀不上的洋鬼子老闆，使他們有更充足的理由擺出一副紳士派頭。而他們最大的本錢就是會外文（大部份是英文，也有其他國的語文），會辦「洋務」。他們的英文不一定很好，但很夠用，所以至今還有學院派的人們在嘲笑別人英文不好的時候，說那是「買辦英文」。

「假洋鬼子」的學名就叫「買辦階級」。所謂「買辦」（Compradore），音譯爲「康白度」，指外人初入中國通商時所僱用的採買或管事。後來變成外國洋行華人經理的通稱。他們的工作就是替外國商人和中國人之間做生意。

早期我們的國際貿易可以說就控制在這些洋人的手中。而當時的外商不懂華語，又不懂中國的生意行情，爲了業務的需要，不得不找中國人合作，而產生了「買辦制度」。當時這種「進出口」生意，出口的大部分是國內的土產，進口的則除了少數機器、鐘錶、文玩、日用品之外，以鴉片煙和軍器爲大宗。來往交易就要靠這些「買辦」經手。他們的所得是事先約定的小額佣金和

按月的津貼。由於「買辦」這種職業爲過去中國社會所無，於是形成了一種特殊階級的商人。卻又爲其他商人所輕視，民間也不喜歡他們那自命高人一等的作風。

天津的洋行很多，有名的如怡和、太古、和記、卜內門等等，大家都很熟知。其實，認眞說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們是很有才幹的，旣懂經商又通外國語文，可以說是在國貿方面披荊斬棘的開路先鋒。但只因其中有大部分人太過趾高氣揚，而當時中國人又都相當貧窮；加以知識份子及民衆對國家主權被剝奪，對外人經濟侵略的不滿，於是把這怨氣就都發洩在「買辦階級」的頭上。

文學作品，特別是左傾作家的文學作品中所指的「買辦階級」和小市民口中「左手拿著文明棍兒，右手拿著大皮包」的「假洋鬼子」似乎有層次上的分別，但卻都指的是爲外國人跑腿而大賺「洋錢」的一些人。

民間這首短歌所反映的是普遍一般人對時代的不滿與無奈。升斗小民賺錢困難，走洋人路線的卻是「洋錢票」滾滾而來。文人作品方面，除了小說及其他作品以外，劉大白寫詞趙元任譜曲的一首「賣布謠」也代表了知識分子的反應：

嫂嫂織布，哥哥賣布。
賣布買米，有飯落肚。

嫂嫂織布，哥哥賣布。
是誰買布，前村財主。
土布粗，洋布細。
洋布便宜，財主歡喜。
土布沒人要，
餓倒了哥哥嫂嫂。

「賣布謠」這首歌，四十年來的台灣，很少人唱。它可能並不是「禁曲」，但它的性質使人自我設限，覺得最好是別去碰它，以免擔上替貧苦大衆講話，「挑撥階級仇恨」的嫌疑。這當然是「反共」的一種矯枉過正。實際上，「賣布謠」所寫的是在外來的經濟侵略之下，土產敵不過洋貨，而「財主」只問自己的錢花出去是否值得，並不在意中國的織布者是否無以維生。它的意思十分明顯，尤其在當時那三十年代，這抵制洋貨的歌聲所反映的正是一分現實與眞理。民衆與學生認同這首歌，無所謂政治上的左傾不左傾，因爲民間疾苦就是這樣活生生地擺在每個人的面前。當「土布沒人要，餓倒了哥哥嫂嫂」的時候，民衆當然會歸罪於販售洋貨而使國產滯銷的洋行買辦，覺得他們所賺的「洋錢票」也都是「不義之財」。

天津塘沽一帶，華洋雜處，「文明棍兒」與「大皮包」的形象就活畫出當時人們對買辦階級

的看法。

「手杖」變成「文明棍兒」，同樣的物件，不同的作用。過去，中國人的「杖」是實用的，竹杖也好，藤杖也好，都是爲了行走的方便，所使用的材料也都來自自然界，保持著一分樸實。「文明棍兒」卻是漆著亮亮的油漆，兩端用金屬做頭尾的「裝飾品」。大家把這原屬歐洲紳士標誌的手杖，拿來加上了「文明」二字，當做新時代、新人物的標誌。這「文明」二字可以說是十分的諷刺。它強烈地意味著，中國人覺得自己過去的一切都有欠文明，而只有向西方學習，經過西化之後，才夠得上「文明」。自卑的心態由這「文明」二字表露無遺。

「文明棍兒」是洋紳士的象徵，中國人「學以致用」，變成了「假洋鬼子」的時髦標誌。而由於這番「西化」所達成的「文明」，卻眞的給這些人帶來了財富，因此「洋錢票」確是不少。

同樣出於「全盤西化」以求「救亡圖存」的動機而使用了「文明」二字的還有「文明戲」與「文明結婚」。「文明戲」後來式微了，留下的是爲傳統所無的「話劇」。而「文明結婚」，倒是的確比傳統婚禮來得「文明」。二十年代開始的「文明結婚」，新郎手執禮帽，身穿燕尾服，新娘頭披白紗，身穿洋式禮服，手執鮮花的結婚典禮，取代了鳳冠霞帔坐花轎，也解救了後來無數的新娘。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年回老家參加堂叔的婚禮，親眼看見新娘從上花轎到入洞房，一整天要在衆目睽睽之下，坐在炕上，面對牆角「裝新」，連上廁所的自由都沒有，那才眞正是「不文明」

到了極點呢！

由於這新式婚禮逐漸被大家廣爲接受，「文明結婚」的「文明」二字也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悄悄地取消了，可能是因爲社會大衆對那「文明」二字也還是有些不太願意接受吧？

四三、音樂123

民國初年，有些人不知道「音樂」二字的讀音應該是什麼，很多人把它讀成「音ㄌㄜˋ」。而「軍樂隊」就被說成了「軍ㄌㄜˋ隊」。

我想，這得歸罪於孔老夫子，他老先生在論語裡面把一個「樂」字，反來倒去地改變讀音，一會兒唸ㄩㄝˋ，一會兒唸ㄧㄠˋ，又有時唸ㄌㄨㄛˋ。當然，它更有時候應該唸「快樂」的ㄌㄜˋ。

而天津人至今還是把它唸「ㄧㄠˋ」，「音ㄧㄠˋ」。

認爲「吹拉彈唱」都是「不務正業」；認爲從事戲劇的演藝人員是「倡優者流」的中國人，忽然發現，學堂裡有了音樂課，子弟們不但必須學唱歌，而且男校還有「軍樂（ㄌㄜˋ）隊」呢！「軍樂隊」被稱爲「軍ㄌㄜˋ隊」，很久都沒有改正。而大家對他們所使用的那亮晃晃的大號和小鼓十分好奇，而稱之爲「洋鼓」與「洋號」。於是「軍ㄌㄜˋ隊」的奏樂被訛稱爲「吹洋鼓，打洋號」，大家明知其錯誤，卻情願以訛傳訛，成爲一種善意的玩笑——「走啊！去看軍ㄌㄜˋ隊

吹洋鼓，打洋號去！」

高中的男生穿著黑色的中山裝，胸前銅鈕扣閃呀閃地，吹打著走過，確實增加了年輕人的朝氣。

反對子弟們「吹拉彈唱」的老式家庭，擋不住這洶湧的潮流，從父親念高中的時候，老式家庭中就有了唱歌的聲音，生活中也首度出現了「多、來、米」這種奇怪的符號。

春日兮融融，春暖懷袖中，
快哉休沐日，遠足任西東。
……

歌詞顯然還是來自論語〈先進篇〉，曾皙言志所說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泳而歸」，把這段孔門弟子所表達的最自由自在的人生理想語體化和詩歌化，而成爲新時代的高中音樂教材了。

從古書所認可與音樂相關的部分摘用爲現代教材，也可以想見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是在怎樣的過程中嘗試把古典化爲現代以便脫胎換骨所費的苦心。等於是把孔老夫子拉來「護航」，來說明它不是「倡優者流」。

中國人對音樂的矛盾情結使學校的音樂課不得不在生澀中摸索嘗試。其實，多少年來，中國

雖然表面上沒有音樂，民衆卻絲毫不缺少音樂的薰陶。中國的音樂分別由兩個管道在民間普遍傳布，一是經由戲曲。儘管士大夫認爲「吹拉彈唱」是「倡優者流」的末技，但士大夫絕不排斥戲曲。相反地，他們正是戲曲的重要支持者。士大夫如此，宮廷也更喜愛戲曲。「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由於在上者提倡並熱愛戲曲，而使音樂藉著戲曲的存在而存在，並且深入民間。

另一個傳布的管道是詩歌。在音樂不被重視的漫長歲月裡，中國的詩歌幾乎取代著音樂的功能，使民衆在受私塾教育時，由於詩歌是讀書所「必修」而且是日後榮登仕途所「必考」，因而得到完整的詩教。使大家在成長的過程中不缺少旋律與節奏的薰陶。「吟詩」，實際上就是一種無伴奏的歌樂。而中國詩教之普及與生活化，甚至超過了音樂所能涉及的範圍。

在使中國人深感陌生的「音樂」課列入中小學生的課程之後，音樂教材的來源首先就成了問題。大家都知道，早年的學校音樂教材是混摻著西方民謠，西方藝術歌曲、西方古典音樂或西方宗教歌曲等等。但本國民間的一些曲調還是做了開路先鋒，例如「蘇武牧羊」、「木蘭辭」、「漁翁樂」一類的歌，是先在中國民間存在而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學校歌。特別是「蘇武牧羊」，它是適合小學中、高年級程度的教材，但低年級用它的曲調另外配上淺顯的歌詞，變成「我家有個胖娃娃」。另有一首「燕子飛來低又高」的曲調，幾乎成爲所有七言絕句通用的曲調，從父親讀中學的年代一直傳到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變成了「山歌好唱口難開，櫻桃好吃樹難栽，白米飯好吃田難種，鮮魚湯好喝網難抬。」的一課國語課文的現成曲譜。另外還有明世宗（嘉靖帝）所

寫的「送毛伯溫」，也是用的這個調子。不過因爲它是律詩，所以要再反覆一次。這首普遍流行的歌調很簡單。它是：

「3·2 1·6 1·2 3|212-|16 15|65 323 5-|6 56 1·2 3|2·1 6·1 5-|6 1·6 5·6 5|3·2 1·2 1-||」

根據這首歌調所唱的「送毛伯溫」十分雄壯，原詩是：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
風吹鼉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豈能逃
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袍

民國時代，其實沒有「朕」了，但大兵的領袖們，個個是以「朕」自居的「大帥」。它確實是一首適合男聲齊唱的歌。北伐時，軍閥們對抗南軍把它用來鼓勵士氣。實際上，究竟學堂與軍隊採用這首歌是誰先誰後，也就沒人去過問了。只是大家用這同樣的曲調套入七言絕句或七言律詩，都是很容易的。

父親在學生時代所唱的歌都很「傳統」。「蘇武牧羊」和「木蘭辭」之外，他特別喜歡唱「黃族歌」，歌詞是「黃族應享黃海權，亞人應種亞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種自相殘，坐教歐美著先鞭。不怕死不愛錢，英雄絕不受人憐，洪水縱滔天，隻手挽狂瀾，方不負石盤鐵硯，後

哲前賢。」

這可能是最早期的一首「愛國歌」，擺脫了「三國戰將勇」和「怒髮衝冠」的歷史遺痕，著眼到當前的國事世局，有了時代感。

我提這些歌，是因爲它們既在學校之內，又在學校之外。也可以說，那時代還沒有正式爲學生而寫的歌，兵士們所唱的和學校男生們所唱的歌常常「不分彼此」。特別値得一提的是那首純中國風味的「滿江紅」，它和以後受了西方音樂教育之後的作曲家們所寫的「滿江紅」大異其趣。由它那直率的調子，可以斷定它純粹是一首軍歌，現在我把它的曲譜寫下來，大家可以唱唱看！它把「怒髮衝冠」的「怒」唱成去聲，是很「怒」的。音符上幾乎每一句的最末一字都用了加強記號，唱來像是每句一個「嘆」號。

53 21|5 0|3 5·3|21 16|10|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1 12|12 12|12 16|5 0|55 66|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

55 53|21 25|21 16|1 0|1 12

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

12 12|3 -|2·3 5|1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〇||

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因爲當初編歌的人不是根據西洋作曲法，所以小節不按規定。我把後面空下來的小節加上「一二三四」的口令，使它更具代表性一些。它沒有「奶油味」，山東腔調卻是很足的。

「新學制」的學校歌和父親及大兵們所唱的老歌同時並進，成爲我小學音樂的課外來源，父親也教我彈古曲「梅花三弄」和「鴛鴦扣」。只不過，我所使用的樂器不是古琴，而是當時剛傳入中國不久的日本「大正琴」了。

「大將南征」並沒有成功，後來反而是南軍北伐成功了。這首歌所反映的中國內戰，到了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之後，才被剛剛傳到北方的「打倒列強」所取代。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一致對外」大致有了雛形；教育與文化方面卻是「全盤西化」了。「打倒列強」是西方調子套上了中國歌詞，代表了中國的一個時代。

四四、我們的校園歌曲

「大家一齊流血汗，爲了活命，那怕日曬筋骨酸……」

這是那裡來的歌聲，如此粗獷又好聽!?

「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這是那裡來的歌聲，這麼悲壯又沉雄!?

「燕雙飛，畫欄人靜晚風微……」

這是那裡來的歌聲，如此典麗又柔情!?

「風淒淒，雨淋淋，花亂落，葉飄零……」

這是那裡來的歌聲，如此哀傷又悽清!?

好聽的歌，一首又一首，從校園裡，不同的角落傳來。究竟這首歌或那首歌是誰唱的？全部

的歌詞是什麼？

不用急！不用急！到不了一天，它就會成爲全體愛唱歌的同學都會唱的另一首「校園歌」。

這些校園歌是從電影裡來的。愛看電影的同學把這些歌帶到了校園。

當時不知道它們的作者將會是那麼令人驚羡的不朽；更不知道他們的作品是中國音樂劃時代的傑作。我們不問這些歌爲什麼只在電影中出現，而不包括在我們那銅版紙精印的正式歌唱教材之中。

也許歷史會告訴我們，許多傑出的成就是從「在野」的身分，由民間自動認同之後，才逐漸進入官方檔案的吧？它們的作者也許天然就比被官方肯定的一些人具備了更高的才華與成就吧？官方的管道始終是最後才容許這些人通行的吧？

關於這些歌，我必須感謝我們的校園。許多歌都不是在音樂教室而是在校園，由同學的傳布之中學會的。我們除了自己本班的歌之外，全校上下各班，包括學院部各科系，只要有人唱歌，大家必定可以學會。

電影歌曲大部分來自走讀生，他們有較多的機會去看電影，因此比我們先學會了電影裡的歌。

幾乎所有的電影明星也都是走讀生「介紹」給我的。

大部分是在星期一。他們周末的娛樂總少不了去看電影。我這住讀生，每個周末最大的樂事

是去買好多的零食，帶回宿舍來吃。然後是找個公園去玩。當時的「北寧公園」、「曹家花園」、「法國花園」，都是我的選擇。但認眞說來，我還是只喜歡我們的校園和英、法租界的行道樹。走讀生經常帶著他們新看的電影說明書、當時流行的電影明星照片，以及電影歌曲，來到教室向我們傳布。

我最早知道的明星，上溯到胡蝶和阮玲玉，以及男明星金焰。

電影歌曲從早期的「萬里尋兄記」、「大路歌」、「開路先鋒」到抗日的「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後中共用爲國歌），以至於後來上海十里洋場味道十足的「桃花江」、「滿場飛」、「特別快車」等等，還有後來加入的「天倫歌」，不分彼此，統統成爲我們的校園歌。

認眞說來，北方的學校音樂教材一直是相當保守的。由柯政和主編的音樂教材之中，充滿著民國初年至十八年的作品，借用外來曲譜塡中國歌詞的佔絕大部分。所以遠不如電影歌曲來得鮮活有力。上文所舉的幾首愛國歌或抗戰歌都是聶耳的作品，聶耳那時還在世，他是民國廿四年在日本去世的，年紀才二十三歲，天才早逝，卻留下不朽的音樂。至於流行歌之中，「夜半歌聲」是冼星海的作品，傳到校園裡，造成轟動。賀綠汀寫的「春天裡來百花香」由韓蘭根主唱，別人看過這部電影，我卻只是愛上了這首歌的直爽，深刻而又平民化的美。但我和我的同學大概都不知道誰是「賀綠汀」。至於說，「冼星海」和「聶耳」，可能別的同學知道，我則是只喜歡這些歌，並不了解它們的作者和出處。

同樣的，那麼有名的「天倫歌」是電影「天倫」的主題曲，黃自的作品。這是很多年之後才知道的。當時愛上這首歌的時候，既不知道它來自電影，更不知道誰是「黃自」。

但是，和北方那些「正統」的音樂教材比起來，就連大家認爲只屬於流行音樂作曲者的黎錦暉，他的作品都更具有創意而不完全倚靠外來現成的曲譜。他的作品對學生來說，無論在創作力或感染力方面，都展現了新的生機。我們小學時代所學的兒童歌舞劇「痲雀與小孩」，固然是絕佳的富有教育價值的作品，後來的「燕雙飛」、「落花流水」，也和那些從西方借用來的調子在校園中並駕齊驅，廣受歡迎。

後來知道，第一次譜曲發行，使我們以「先入爲主」的心情擁護愛戴的那首「總理紀念歌」竟然也是黎錦暉寫的。

至今令人費解的是，大家始終稱那些來自西方的音樂爲「正統音樂」，而自己音樂家創作的音樂既然是來自電影的「流行音樂」，當然也就「非正統」了。

北方學校音樂教材的改變是從民國二十五年，勞景賢與丁善德二位由上海受聘來到北方之後才開始的。

他們兩位，當時都已相當有名。勞景賢老師所寫的「出發」（槍在我們的肩膀），已經是家喻戶曉。他同時也兼了師範與中學部的課，私立耀華中學也有他們的課。

爲發掘可教之材，他們通知師中部各班，對音樂有興趣、有基礎的，可以去音樂館報名，然

後擇期甄審，分器樂與聲樂兩組，看你究竟是否有資格參加「個別指導」。我報了器樂組進修鋼琴。班上另有四位同好，其中兩位參加了聲樂組。通過甄審之後，排定時間，接受「個別指導」。

於是，我成爲丁善德老師的學生。

合唱團成爲嶄新的團體，勞老師所教的歌是我們前所未聞，卻是上海早已唱過，在現代化的步調上，立刻帶我們邁進了一大截。

民國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之間，我們一口氣學會了「山在虛無縹緲間」、「農家樂」、「旗正飄飄」、「抗敵歌」、「懷古」，等等由當代音樂家所寫的歌，我們這也才認識到中國作曲家的大名——黃自、劉雪庵、應尙能、陳田鶴，眞是使我們眼界大開，音樂課堂上不再是 Hendrickson 原曲填詞的「一個年輕的兵」或借用 Verdi「善變的女人」所填詞的「夏天裡過海洋」的西方曲調了。

作曲家的大名不被重視，使我們雖然一天到晚唱「大路歌」而不知道有「聶耳」其人；一天到晚唱「夜半歌聲」而不知道有人叫「洗星海」。至於說「天倫歌」的作曲者是「黃自」；「春天裡來百花香」的作曲者是「賀綠汀」，更是很多年以後才知道。但是，丁善德的一場鋼琴獨奏，卻使我們用萬分驚喜的心情，提早認識了「賀綠汀」。

那場音樂會的其他曲目早都忘了，卻只有這首 encore 用的「牧童短笛」如同一陣旋風，在

我們這些鋼琴學生群中，造成了轟動。幾乎是音樂會一散場，我們就奔向校園的鋼琴室，大家憑記憶，把這首中國風味十足的鋼琴小品試彈起來。

「左手太難了。」鋼琴程度不深的我們這些學生彼此討論者，準備明天去找丁老師借用曲譜。

「牧童短笛」並沒有成爲我們的教材。它那鮮活明朗的中國曲調在鋼琴上表達出來的特色，卻使我們迷上了賀綠汀——誰是賀綠汀呢？原來他也是出身上海音專的名家，而這首「牧童短笛」原來是旅居中國的俄國作曲家「齊爾品」爲了尋覓中國風味的音樂，設獎徵求的首獎作品。賀綠汀由於此曲而奠定了作曲家崇高的地位，也給中國風味的音樂帶來了旺盛的生機，「牧童短笛」至今仍是鋼琴家最愛的中國小品，成爲一首不朽的名曲。

好幸運！在「牧童短篇」中認識了中國音樂，也認識了中國有這麼好的作曲家和演奏家。

我們第三十三屆這一班，趕上了臨畢業以前的一年，接受嶄新的音樂教育，眞是值得感謝的大幸運。因爲這一年之後，我們剛剛一腳踏出校門，大戰就開始了。

四五、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我不是一個很欣賞都市的人，這正如我不喜歡繁複修飾與造作。我喜歡外縣來的同學，她們幾乎個個都像我老家的親人。那誠樸自然的風格，使我感受到人與人間充滿了溫暖與照顧。寬厚的、來自傳統的風範，謙和容讓，無論是在學業上或日常生活上，彼此沒有競爭而只有互助。我不是個用功的學生，但我品行良好，快樂開朗的天性，常得到同學的好感與讚許。當我太愛玩而太不唸書的時候，同學會像長輩一般地規勸我──「不要太心浮氣躁哦！該唸書啦！」當我經由同學的幫助而把數學考試應付得很好的時候，同學不但毫不嫉妒，而且會很坦然地誇獎我──「你就是聰明！」貪玩而粗心大意的我，如果勉強說是對她們有點回饋的話，那大概就要算高三下學期的兩門實習的課程了。

我們的師範教育不僅要把我們培育爲好老師，還更要培育我們爲「好主婦」。院長齊壁亭先生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很欣賞日本對女生的教育中有家事訓練。他回國以後，主持女師學院，先就辦了國文系和家政系。

民國二十幾年，正是五四以後，一切追求革新而揚棄傳統的年代，女性與男性爭平等權，大家輕視賢妻良母到了矯枉過正的程度。同學之間，彼此開玩笑的時候，如果說誰將來是「賢妻良母」，一定會換來反唇相譏，認爲那是一種侮辱。而留日又留美的齊院長，在新思潮莫之能禦的潮流之下，獨排衆議，先在學院部辦了家政系，眞難怪他會被當時思想前進的教育界同行們譏爲「老古板」「不合時宜」。不但外界否定他，學校的同學也不喜歡家政系，認爲只有「纏小腳的人」才去讀它，甚至覺得考入家政系的人都是守舊的鄉下人。

教育家齊院長不理會大家的反應，不但辦了家政系，讓家政系的學生可以選讀音樂副系或體育副系，而且讓師範部的學生在畢業前的一段時間排入兩星期的「模範家庭」實習課。全班分組輪流去住「模範家庭」。

「模範家庭」是附設在校園內的一個小小的院落，內有正房與廂房。學生分爲五人一組。住進「模範家庭」之後，由「家事」老師負責指導，怎樣整理內務，怎樣佈置裝飾，如何養花蒔草，當然，最重要的是烹飪一日三餐。

這「烹飪」，從買菜到炒菜、煮飯、烘蛋糕、請客；到洗碗、清理廚房，一貫作業，由老師記分。我當然也不能逃避，和同組的同學在指定的時間，搬進了「模範家庭」。

這眞是對同學們重新認識的時候！平常，我們住讀生過的是「打鈴吃飯，打鈴睡覺」的日子，伙食自有廚師供應，從來不覺得那和自己有什麼關係。現在住進了「模範家庭」，要我們自

己當家作主了，這才發現，有的同學由於在家裡就訓練有素，所以指揮若定，十分內行。從買菜到切菜下鍋，蒸煮炒燉，都很快捷自信，讓我這平時在家也從來不進廚房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大家起先是輪流當值，今天你買菜，她掌廚，明天換別人擔任這工作。我呢？既不知菜場在何處，又不知把菜買來之後應如何處理。拉著同學一直問，最後還是由同學搶過去替我做了，以免被我耽誤時間。

無可奈何之餘，我自動向同學們商量交換，讓我專管洗碗，明白表示：「你們不喜歡洗碗，我別的不會。洗碗很有興趣，而且保證可以通過老師的檢查。」於是兩個星期的「模範家庭」，我洗碗洗得成績斐然，同學們也樂得把這討厭的工作交給我去負擔。眞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因而皆大歡喜！

你或許會說，女師的教導太不嚴格，怎麼可以這樣自動交換？

誰知道？在我日後想來，可能辦教育的人早就應該了解，各人有各人的性向，喜歡炒菜的去炒菜，喜歡洗碗的人大可讓她去洗碗，否則，這世界上的人都去炒菜，誰去洗碗呢？

就正如，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當董事長，誰跑外務呢？

分工合作的事，我這河北女師的「高材生」所得到的「優待」還不只是這些。

師範學校高三最後一個學期的重頭戲是去附屬小學實習，我們被指定要把所實習的科目認眞做好，先寫「教案」，通過老師的審閱之後，再到課堂上實地教學，由附小的任課老師評分。

課表排下來，每人按時去上課。我實習的第一節課是四年級的算術；第二節課是五年級的國文。

兩堂課下來，我覺得苦不堪言。尤其是算術，我自己在小學就沒考及格過，現在讓我做老師，眞是緊張萬狀，覺得附小的學生都比我強。

河北女師附小的學生確實是很出色的，因爲老師都是女師畢業的前幾名，精挑細選，才可以到本校的附小來任教。那時，女師畢業生也以能進附小任教爲「第一志願」。其他的同學就要由教育廳分發到各縣市去了。當然還有「第二志願」，但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會眞的去當老師，所以從來也不曾過問分發的事。

面對一班又一班的好學生，我深感「自愧不如」。教了兩堂課之後，就異想天開，去問本班那些最怕音樂的同學——「誰願意和我換實習音樂？」

眞是「如響斯應」！大家紛紛來「申請」，沒多久，我的實習課表上的「歷史」「地理」「數學」「國文」……一概變成了音樂。這下我可是「得其所哉」！教案寫來順手，上課游刃有餘。從一、二年級的唱遊，到三、四、五、六年級的音樂都歸我包辦，我得到了解救，那些不喜歡音樂、最怕彈鋼琴的同學也更是由於我的挺身而出，把她們的「危機」變成了「轉機」，可以愉快地發揮她們在「學科」上的長處了。

至於說，學校教務處爲什麼允許我們這樣交換？我們有沒有經過正式的申請，得到允許才可

交換？我不清楚，也許當初是經過了申請，才可以這樣交換，我忘了。也許那是我開的先例，也許空前也絕後，不再有這樣的優惠，我眞的從來也沒去正面了解過。反正我們這第三十三學級是抗戰爆發前的最後一班。那是民國二十六年。經過了戰亂之後，國家的一切都已不能恢復舊觀。我那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女師歲月，也就至此截止。它是我一生最値得感謝與懷念的黃金歲月，它也是整個國家正在蒸蒸日上的黃金歲月。這三十年代最豐富多彩，也最奮發有爲的一段日子，是讓我趕上了。

四六、山雨欲來風滿樓

大概每一種「快樂的日子」將要結束時，都會出現一些前奏吧？

父親在塘沽久大精鹽總工廠所建立起來的響亮開闊的日子，是在民國廿六年，抗戰開始之後結束的。但在這以前的兩三年，父親的生活中已經出現了逆境——母親病了。

母親因爲生小弟時難產，由當時的廠醫緊急剖腹產下胎兒，但產後卻發現四肢逐漸痲痺，終於無法行動，卧床近兩年之後去世。

當時不知道那是因爲脊椎痲醉不當所致。但工廠只有這一位醫師，他雖然是全科，醫道與外科手術俱佳，卻缺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專業痲醉師。

母親病後，遍訪名醫，除了正式的內外科、婦產科之外，中醫當然更是不可少。後來求問到各種偏方，都未見好轉。父親是不惜重貲，只要有人推薦，而他認爲應該一試的，就必定前去求診。後來聽說天津法租界有一位著名的針灸醫生，號稱「太乙神針」，擅治疑難重症，而且有科學根據。他的診所堂皇高雅，不同於一般的江湖密醫。父親對這位名醫寄予很大依賴，特地在法

租界一家大旅館，包下一個房間，送母親到天津就近治療。並且請到一位護士，長期在旅館照料母親的飲食起居。旅館房租加上特別護士的工資，費用驚人。父親從無一字怨言，對母親溫柔體貼，比她生病之前猶有過之。塘沽與天津相隔一小時火車車程，父親在忙公事之外，更經常抽空來天津探視。

我當時在河北女師讀高一，年少無知，不懂替父親分擔憂慮。父親也從來不談他那幾年的心情。只有一次，我看到父親用毛筆寫的一張雜感詩，原文我不記得，大意是說，家中佣人不聽調度，小弟的奶媽無理要脅，而家用開支實在太大，其中有「長夜漫漫何時旦」的句子，說自己實在是「憂心如焚」。

當時家中雇有四名佣人。包括廚子、女佣、男佣和奶媽。奶媽工資最高，而且要供給她四季衣裳和金飾。廚子最會揩油，日常報上來的帳單是兩天一斤油。菜錢每天現洋二元，而飯桌上每餐只有一葷一素兩個家常菜。父親明知不合理，卻也無心過問。

母親在天津治療半年，並未見效。只得接回家中繼續求醫。記得居然有人先後推薦兩個殘障人士，由鄉下請來，常期住在家中給母親診治及針灸推拿。說他們自己雖然殘障，卻是「久病成良醫」，知道如何根治這種病。父親明知其不合理，也明知他們所開的藥只是一些參茸之類的補藥，對母親的病並無療效；而且日久之後，父親也早已看出，母親的病恐怕是無藥可醫，但為了安慰母親，也為了求自己的心安，只得盡力而為。金錢花費也在所不計了。



別人看，只是一張舊照，自己看，卻是一世滄桑，別人看，一排土土的小孩，自己看，多少親情友愛。

長姊居首，母親已歿，這一行雁，此後面臨的是戰爭歲月，艱苦生涯。

一切的憂煩焦慮，統統集中在父親一個人的身上。我只有十六歲，住在學校逍遙自在，偶爾回家，也不理正事。家中那位貪汙的廚子，早已在他自己的故鄉置了產業；每次他請假返鄉時，仍然大包小包挑回家去。其中究竟是米、是油，還是家中衣物或其他，無人過問。所以有一次他反而在我們面前嘲諷地說：「你們家呀！油瓶子倒了沒人扶。」惹火了我的二妹。十三歲的二妹從此挺身而出，到廚房去天天查看「油瓶子倒了沒有？」「否則怎麼天天買一斤油？」害得那廚子爲了賄賂她，每天炸蔴花給她吃。可惜就連這最勇於面對現實的二妹，暑假過後，也考進了天津民德女中，住校去了。

母親因爲不耐長年卧病，也漸漸變得喜怒無常，特別是面對父親那內外兼顧的忙。心上焦急而暴躁，就忍不住要發脾氣。父親雖然了解這是病人所難免，但自己也有自己的痛苦，當忍耐超過極限，也就爲自己申辯幾句，於是母親既難過又心痛，這種場面最後總是母親傷心掉淚，對父親表示抱歉。父親在出門上班之前，一定溫言軟語，安慰母親一番。母親有時捨不得父親離開她的身邊，就會哭著說：「我恐怕永遠不能幫你處理家務了！」「恐怕我要和你分手了。你去娶個身體好的，只要別虐待孩子就行。……」

父親一面斥她亂想，一面也黯然神傷。

父親的公事很忙，家庭生活又那麼煩心，即使他天性平和又樂觀，長期的煎熬也使他瘦了不少。一面仍然在無望中絕不怠慢那些說是可以爲母親治病的人們，總希望有一天會出現奇蹟。

母親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去世的。

那天早晨，她似乎還很開心，找女佣幫她梳好頭髮，換上乾淨的衣服。父親在床邊陪她吃了早點，照例在上班以前陪她聊聊天。忽然聽到窗外有烏鴉在叫。母親當然也聽到了。很難過地對父親說：「你聽到沒有?烏鴉在叫，我大概要走了。」

父親說她不要這麼迷信，沒有這回事。

母親卻一反往常，不再唯恐父親耽誤公事，拉住父親請他多陪她一會。她說她有點害怕：「不是迷信，是我該走了。這些年，辛苦你啦!我對不起你。孩子都還小……。」

母親話未說完，一面哽咽流淚，一面說她好冷，又說她枕頭太低，不舒服，要父親幫她把枕頭墊高一點。正在父親把她從枕上扶起來，想替她加個靠枕上去的時候，卻發現，她已靠在父親胸前，去世了。

兩個感情如膠似漆，苦樂相共，辛苦建立起和樂美滿家庭的夫妻，就這樣永別了。

父親後來告訴我們關於母親彌留的這一刻，一面惋嘆地說：「媽媽病中得到很好的照顧，醫生們又盡量開些補藥，所以她直到最後一刻，依然面色紅潤，比沒病以前還漂亮。……」

母親去了，家中倏然變了一個調子。往日的笑聲至此告一段落。

四七、面對噩夢不知愁

母親去世那天，我正在學校上課。

久大公司那位最忠心的工友李景增先生，從我上初一那年，就常常送我到校，接我回家。是父親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位最可靠的幫手。這次忽然在不是放假的日子到學校來接我，使我覺得奇怪。

我匆匆由教室趕到校門口。只見李景增手中拿著一個很大的粉紅色的包裹，說要帶我回家。我問他：「那包裹裡是什麼？為什麼現在讓我回家？」

李景增簡短的回答我說：「這是衣服。你父親讓我來接你，我已經幫你請過假了。」

我一點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從來也沒想到母親的病會奪去她的生命。我不覺得這種事會降臨到我的頭上，而且也更不應該降臨到父親頭上。

一小時的火車，李景增沉默著，我竟然一點也不想再問他，有什麼事。

家裡的門敞開著。弟弟妹妹們在巷子裡玩，我覺得氣氛有點異樣，茫茫然走進家門，赫然看

見母親躺在堂屋左側的一張床上，臉上蓋著白紙。

父親默默地走過來，掀開那張白紙，對我說：「再看一眼媽媽吧！她今天上午故去的。」

父親沒戴眼鏡，臉上一片蒼白，接過李景增帶回來的包裹，裡面原來是從天津買來的「壽衣」。家顯得異樣地凌亂，出出進進的是些父親工廠的同事和庶務處的員工。

我們開始變成沒有母親的孩子了。

是別人那悲憫的眼光使我覺得恐懼、緊張和悽冷，而不是我自己有那麼深切的悲慟。我非常不了解自己，在人來人往之中，我的感情整個被嚇住了。我突然變成了一個被所有的人注意的焦點，而我彷彿是一個拙劣的演員，冷不防地被人推上台去，面對一群陌生的觀衆，而不知自己爲什麼要站在那裡，卻又不知道要不要逃下台去。

從十一歲就開始住校的我，和家的接觸越來越少。學校的日子是「打鈴吃飯，打鈴睡覺」，一切人間事統統與我無涉，根本沒有任何有關「生活」的常識。婚喪嫁娶，小時候在老家參加過一些，但自己是從外面隨父母回家，身分像是作客。到塘沽以後，過的是全部革新的工業社會的日子。一切從頭開始，沒有傳統包袱，也就沒有傳統習俗。尤其是我，十六歲的年紀，一張白紙一般，索性連自己的母親去世也只使我對自己這「衆人注目的焦點」的角色感到恐慌——「爲什麼大家用那麼悲憫的眼光來看我呀？」

原來，才剛滿十歲的大弟被認爲不足以擔當「孝子」的重任，打算由我這長女來主祭。大家

的眼光中不僅是悲憫，而還包含著對我的衡量——你這身爲長女的人，能擔當些什麼呢？

在衆人注目之下，我沒有心情去號啕大哭。只是順從地穿上重孝，在辦事人員的擺佈之下，看著母親入殮，被指揮著下跪，叩首；再下跪，再叩首。而且還被命令著：「你現在要哭！」於是，我「如儀」地勉強哭上幾聲。

緊張而公式化，又那麼陌生的儀節，使我完全麻木。一心只希望這場大典快一點結束。

只有在短暫的、別人做其他準備工作的時候，我才被允許回到旁邊的房間去休息。有人給我一小盒萬金油，以爲我必然會因爲哭多了而頭痛，我卻覺得這眞多餘！我根本還沒機會開始悲傷哩！

大家都出去忙別的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坐在藤椅上，這我才悲從中來。想到我再也聽不見母親叫我的聲音了。我實在好希望再聽聽她那溫柔的聲音。就在幾個小時以前，我還以爲這次莫名其妙地被接回來，可以陪陪臥病的母親。一路上，我絕未想到她是永遠地離開了這世界。離開了父親和我們。我以爲我回來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樣，告訴她一些我學校的事，她很愛聽我們在學校的生活，那是她很難想像的。那麼多同學一起玩，一起唱歌，一起吃飯，一定是很快樂的。她還想去我們學校看看呢！她一直都沒去過我們學校。我還想告訴她，我的同學很喜歡吃她爲我做的菜。那糟白魚和栗子鷄眞是美味！我總以爲母親很快就會好起來，再去下廚爲我們做那麼多好吃的菜！我們好久沒吃過她親手做的魚、蝦和螃蟹了。

我是多麼傻！多麼自私！我完全沒有想到她病得那麼苦，而我都沒能時常回來服侍她，陪伴她。她已經在死亡的邊緣了，而我還只在那裡希望她可以像平常一樣地來愛我，照顧我、做菜給我吃……我是多麼後悔！多麼痛恨我自己，但我永遠也不會有機會向母親去懺悔，去告訴母親我是多麼愛她！多麼想孝順她了！……。

堂屋裡掛了許多輓聯，襯著母親那莊嚴的黑色棺木。輓聯中有「……忍見嬌兒弱女，共倚嚴父哭慈親」的句子，是父親的同事好友張功惠先生寫的。我覺得很慚愧，因爲我並沒有倚在父親身旁哭，甚至在凌亂的心情中，我都沒有和父親交換一句話。寫這輓聯的人卻是比我這當事人更能體會到我們眼前和日後的處境。

母親去世，而我只顧在繁瑣陌生的儀式中緊張得連眼淚都流不出來，給人的印象一定是「太不懂事」。我自己也一直不能原諒自己爲什麼如此淡漠無情！這心情，一直到多年之後，我在這世間奔波勞碌，人間苦樂都有了不少的體會之後，才慢慢了解，我的眼淚是只有在剩下我自己的時候，才可以流的。我是這樣一個人，我也許是太會自我控制了。而我甚至懷疑，那些身負各種禮儀上的重任而還可以哭個不停的人，是不是比較能夠無視環境的存在而自行其是。

其實，我眞正的「重任」並不在這把我當傀儡一般擺來擺去的喪禮的當時，而是在母親入土爲安之後。只是當時我一點也不曾感到而已。

我們把母親的棺木送回老家的墳地去安葬。年輕的母親，在外面工業界生活過的我們這一



1935年，母親因病去世，這兩個最小的妹妹和弟弟，不知苦日子即將來臨、背後的「塘沽新村十七號」也即將由我們生活中退去。

1936年，繼母進門，1937年，大戰開始。

家，在喪禮方面，比起曾祖母和四爺的那葬禮，可眞是簡單多了。

母親的事情辦完，我帶著解脫的心情回到學校去繼續我那不問世事的日子，只不過是右臂上多了一條黑紗而已。

而事實上，命運是從遠處兜過來的巨大的陰影，像天上那不知從何方聚攏而來的黑雲。它距離你像是很遠，但你已在它的籠罩掌握之中。你在被它吞噬，可悲的是，你竟然一點也不知道。所以連逃走的念頭都沒有，更別說有沒有逃走的機會了。

四八、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我不知道父親是怎樣度過那一段艱難失落的日子的。

多年之後，我反而有點怪父親太爲我們設想。他永遠是把痛苦與憂煩獨自吞嚥，而用輕鬆樂觀的一面來面對我們。他太愛我們了，不忍心讓我們有任何一點憂傷。

這是父親先天的性格。

他承擔一切痛苦而不讓別人分擔，使我們一直以爲他是不需要我們分擔的，而且使我們覺得他的生活中幾乎是沒有一點困難的。

所以儘管我從幼年就不斷地對自己發誓，「我要孝順父親，要分擔他的困難」，但實際上，我卻一直做著一個受寵的女兒，不知人事艱辛，不懂生活擔子的沉重。

在學校，我是花零用錢花得最多的。

放假回家，我是最懶得打理家務的。在我想來，廚房的事有廚子，洗衣打掃帶弟弟妹妹有男

女佣人。我根本沒有必要去過問家事。所以我的假日生活中，只有看小說，打網球，和弟弟妹妹聊天，去郊遊，頂多在晚飯後，陪公餘之暇的父親談古論今，強作解人一番。父親喜歡書法與詩詞，喜歡談三國演義和紅樓夢，他的讀後感是我的考驗，當我們意見相合時，父親就很高興我可以是他的「傳人」。父親喜歡喝點小酒，當我也可以陪他喝兩杯的時候，他就覺得這女兒與他志同道合而十分高興。

至於說，父親生活上有什麼問題嗎？佣人給父親什麼麻煩嗎？父親從來不提，我也不懂得問。寒、暑假一結束，就又帶著父親給的現大洋和父親的慈愛，揚長而去，到學校做閒雲野鶴去了。

父親唯一的一次把他準備決定的事向我徵詢意見，是關於他要續娶的問題。

「親戚介紹的，家中是海貨店商人，三十一歲的老小姐，有照片，你幫我看看。」

我的「愚孝」以父親的意見爲意見，十七歲的我，只覺得不反對父親就是「孝」了，何況，也無從反對起。

只是我沒想到新時代的父親爲什麼還遵守著「媒妁之言」。難道他忘了祖父當年續娶時的失望？或許他們父子同樣都是因爲第一次的婚姻太美滿了，因而過分地相信了媒人。

繼母過門時，帶著全部有錢商人家庭的習氣，使我們大感陌生與好奇。

她帶來一位「陪房」女佣，叫「姜媽」。

她說天津口音的寧河話。

她的陪嫁講究到和工廠宿舍的格局太不相稱。

她的衣服全是最上等的料子與最高級的剪裁。

她使用香水。

她不去我們的洗澡間，而把上房旁邊的小間另做一個浴室，但因爲那邊沒有衛生設備，所以要「姜媽」一盆一盆地打水來給她用。她的馬桶是考究的福漆紅木馬桶。

她不喜歡房間裡有那麼多的書。叫姜媽把所有的書都送進儲藏室，而把那整面牆的大書櫃改成了衣櫥。

她辭退了廚子和女傭，換了新人。我們都叫不上來他們的名字。

她給我們每一個小孩一枚金戒指，又叫裁縫到家裡來給我們量身做衣服，不問我們是不是有機會穿。

父親的心情不問可知。

繼母進門之後，不到一個月，父親就向工廠要了三個月的假期，獨自去南方七省旅行去了。

他沒有祖父那麼幸運，可以把新娘的蓋頭一摔，從此離家而去。在天津過他的遊蕩歲月。

父親負責求全的個性，和他的七個孩子，不允許他一走了之。他只能逃避三個月，做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長期旅行。母親在世的時候，他是捨不得離家的。現在，面對新人，他對自己的後

半生痛感無望。

父親南遊歸來，帶來三大本照片，「九溪十八澗」「一線天」；杭州西湖十景，錢塘風貌……讓我們分享他的旅遊之樂。而絕口不提他對續娶的失望。

繼母對父親在新婚不久就一下子離家三個月，也並沒有一點抱怨。她不了解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內容。她以為，婚姻必定就是這樣的，她擺她的譜，父親過父親的日子，在她看來這彷彿根本無所謂感情不感情。只是父親的同事絕少到家裡來了，繼母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她對我們以前的日子毫無概念。

我在繼續住讀。只有暑假寒假才回來。不過，從父親書桌上我看到了現代人寫的以陸游的婚姻悲劇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釵頭鳳》。照例，父親的書我不放過，隨手拿來看完，從此記住了陸游這首滿懷愁緒的「釵頭鳳」。

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牆柳。
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
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音難託

莫莫莫。

父親和陸游之間的共鳴，我是直到如今，回頭寫父親的時候，才眞正了解而引起了我無限的感傷。回想當時四十二歲的父親的心情，眞也只有借古人詩句發抒自己的胸中悲慟，有了像母親那樣既美且慧，又感情極爲融洽的賢妻之後，本來已是「曾經滄海難爲水」，更何況所娶到的續弦是如此一位生活情趣迥異的商家小姐，對自己這只憑媒人說合的選擇，又怎麼不自嘆「錯錯錯」呢！

但是，錯已鑄成。父親自此寄情他的工作與詩酒，排遣無望的歲月。至於說繼母，她是從來也不知道父親心中在想些什麼的。

這是民國廿五年。

時代並不允許父親就此認可這寂寞的婚姻，繼母進門不到一年，戰爭就天翻地覆的捲過來了。

四九、槍在我們的肩膀

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到民國廿六年大戰爆發，是中國人在強敵虎視，步步進逼之下，積極趕工，建設國家的壯麗歲月。

我們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國家是如此鎮定地在砲火威脅之下建設發展毫不遲疑的。中國人，一面建設，一面備戰；一面備戰，一面建設。熱血沸騰而又堅強冷靜所形成的三十年代，成績輝煌，史無前例。

民國二十年到民國廿六年，「九一八」到「七七事變」，是我在河北女師的六年，親沐那年代的奮發有為，親見那環境在我們周圍的各種成績，高視闊步，一日千里。

我在河北女師的六年，久大精鹽和永利純碱兩廠業務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一九三六年，我讀後師二年級，相當高中二，久大精鹽在沿海有鹽田十萬畝，年產鹽四百萬擔，當時全國人口以四億來算，平均每人每年可吃到一斤多的久大鹽。

一九三六年，民國廿五年，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蓬勃進步的高峰。在北方，應以久大、永利兩廠爲代表。當時兩廠的工人每月工資，最高可達九十八元，職員工資最高爲四百元。年終加發一個月薪水，舊曆年還另發獎金紅利；最高可發三個月工資，最少也有半個月。化學工業也積極向全國推展，和久大、永利一家的、設於南京的硫酸錏廠是東亞規模最大的化肥廠，於一九三七年二月開工出貨。久大、永利附設的黃海化學工業社吸納許多一流人才，各項研究工作迅速展開，開發出自己本國的產品，抵制外貨，保護國家的利權，不使外溢。

永利純碱在一九三七年，產量高達五萬五千四百一十噸，燒碱四千四百四十六噸。

文化界也從「五四」以後的意見分歧與空喊口號，發展到百家爭鳴的成熟階段。優秀的作家人才輩出，深受全國讀者的歡迎與重視。而且在思想上極少受到限制，左傾作家的作品擁有廣大的市場，自由而蓬勃。

「九一八」之後，許多音樂家自海外學成歸國，新的作品從上海開始，向各主要城市迅速推展，正式來到北方的時候，也恰好是這同一年——民國二十五年。他們帶來了新的、國人創作的音樂；更帶來了抗敵救國的許多歌曲，連同早期聶耳與冼星海的歌曲，壯大了新音樂和愛國歌曲的聲勢。河北女師學院齊院長慧眼識英才，也連帶出現了「英雄造時勢」。他禮聘南方的音樂名家到天津來任教，爲北方展開了劃時代的音樂風氣，也形成了全中國南方與北方在音樂上的同聲相應。這澎湃的浪潮和自民國二十年以來，日本對華北毫不放鬆的節節進逼，一邊是壯烈，一邊

是兇殘；雙方暗中較勁，逐漸集中到了一個短兵相接的爆發點。而人們很少發現，敵人所累積的實力是槍砲彈藥；而我們所累積的卻是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壯烈的士氣與民心，我們的文學與音樂在無形之中做了這場聖戰另一戰場上的「尖兵」。

在一九三六年的前一年，民國廿四年十一月，日本嗾使附日的殷汝耕，在河北省通縣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塘沽與蘆台老家都屬於「冀東」範圍。民國廿五年這一年之間，塘沽的日本洋行、日本酒館、煙館，以及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不斷增加。每天有許多日本兵車，由東北開往天津，車尾架著高射槍砲，日本軍艦也明目張膽，開來塘沽停泊。而中國人不觀望，不鬆懈，環境艱難之下，該努力的就那樣積極努力。

時局在久大、永利兩廠業務顚峰時期，在全國民心士氣團結旺盛的頂點上，急遽惡化，日本的野心侵略步調迫不及待地積極加速。這邊正在奮發圖強的中國，愛國備戰的情緒也日益高漲。

學校裡迅速地排出了「軍事看護」課，每班都要參加。

我們對這項可以實用的課程反應熱烈。從「人工呼吸急救法」、「抬擔架、扶傷患」、「各種綳帶的使用包紮法」等等，大家熱心學會，時局正在嚴酷地考驗著我們。和校園中那明朗振奮的新歌，形成了極爲罕見的交響。把一九三六年一年，渲染得絢爛如醉。沒有親身經歷過那時代的人們，或許難以想像那樣一種戰火一觸即發的局勢之下，全民隨時準備慷慨赴義的勇壯動人的場面。

平時，年輕的我們輕鬆快樂，即使經常盤繞心頭的是戰爭與國難，年輕人的歲月也還是充滿著笑鬧與「強說愁」的個人感情，浪漫又清新，理所當然的那麼輕盈。

轟動一時的華北運動會，就是在這年春天，在天津舉行的，那潮潤潤的土地與灌滿了歌聲笑語的旺盛的朝氣，一定使虎視眈眈的日本人嫉恨欲死，加速了行動的決心。

炮火對準了我們！我們清楚地知道。但是「又怎樣？」我們是那樣的堅定又樂觀，熱情又勇敢。勞景賢老師寫的歌早就替我們說了？

槍在我們的肩膀，血在我們的胸膛，

我們要捍衛祖國，我們齊赴沙場。

面對日本的欺凌，全國學生們是早就想要「打」了！

五十、空間與時間

——你的空間換走了我的時間

父親是非常愛他的工廠，非常盡忠職守的。

「七七事變」之前，「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即已成立。日本兵車肆無忌憚地在北方鐵路線上絡繹不絕，車尾架著高射槍炮。日本軍艦也明目張膽地開入海河停泊。塘沽的久大、永利兩廠在日軍虎視眈眈之下，已深知這局面的緊張和前途的險惡。南遷的打算早在醞釀之中。機警的、來自南方的高級職員，自那時起，即已把眷屬悄悄送回南方；有些職員也已不聲不響地離去，以保自身的平安。

日本對華北最有野心的可能就是塘沽這久大精鹽和永利純碱兩處工廠。這兩廠的產品、設備及規模，對日本極具重要性。

日本如果沒有華北的鹽，它的曹達工業不能成立。而更重要的是軍需業，如毒氣、火藥、炸藥原料等等，都需要鹽。

此外，日本也非常仰賴華北的煤和棉，來維持他的製鐵工業和紡織工業。過去日本所需的

棉也大部分都是從遙遠的非洲進口。

「七七事變」，雖然表面上石破天驚，是大戰的著火點。但對北方人來說，它只是早就在進行著的一連串國土淪喪的延續。「七七事變」發生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七月廿九日，北平就已經淪陷。三十日天津淪陷。塘沽的日軍在他們早已駐軍的「日本大院」屋頂上，指揮軍艦向海河對岸的天津郊區開砲。

這時，位於天津法租界的「久大總公司」開始命令塘沽工廠的全部人員撤退。

常有人問，爲什麼天津淪陷得那麼平靜，特別是和上海淪陷及「南京大屠殺」兩相比較，這邊既沒有「四行倉庫」的壯舉，也沒有「八一三」砲戰的值得大書特書，難怪後人讀歷史的時候，不相信會有那麼平靜的戰爭。

其實，自「九一八」以後，北方那大片國土的淪喪是「慢性」的。

日本進佔東北之後，是逐步地向關內蠶食，你可以大致看看歷史上的記載，算算這時間：

民國廿一年，滿洲國成立。

民國廿二年，日軍攻打山海關，並進兵熱河，於當年五月卅一日訂塘沽協定。劃冀東二十二縣爲非武裝區。「非武裝」的意思就是你別抵抗，我也就不費一兵一卒，「不戰而掠人土地」了！

民國廿四年五月，日軍進兵冀東。政府恐怕日本的侵略繼續擴大，才在七月六日答應與日

本有所協議。這協議，規定國軍不得在河北省及北平、天津兩市活動。北平的「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撤銷。抗日部隊撤離。中國不得有反日宣傳與活動。這以後，日本又進一步要求擴充華北駐屯軍，開發龍烟鐵礦，建築塘沽港，以使河北及熱河、察哈爾全歸日本控制。同一年的十月，日本外相廣田發表「對中關係」三原則：㈠中日親善，中國應取消一切抗日行爲。㈡經濟合作，「工業日本，農業中國」。㈢共同防共。日軍得駐屯中國境內。

這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日本自民國二十年九月至民國廿四年五月，在所佔據的中國東北、蒙古、和冀東地區，分別成立了三個僞政權：㈠溥儀的「滿洲國」。㈡蒙古德王的「蒙古大元帥帝國」。㈢殷汝耕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而在這段時間內的中國政府，忙於「安內」，無暇「攘外」，引起民心激憤，對政府這種「不抵抗主義」怨聲載道。於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全國各地學生約九萬人，集中南京，要求政府抗日。河北女師，也有代表參加南下請願，要求取消「華北自治」，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終於發生了民國二十五年的「西安事變」，這才促成了民國廿六年的全面抗戰。

這也就是說，在民國廿六年，日本大舉侵華之前，河北及平津一帶早已在日本控制之下。是因爲這個緣故，這場驚天動地的大戰，在北方並不似人們所想像的那麼慘烈。北方的淪陷是慢性的淪陷，北方的抗戰也是「慢性」的抗戰，靠的是精神上持久的不屈不撓。

大戰爆發後，日本有「三個月征服中國」的速戰速決的策略；中國則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消耗戰來應付，華北鐵路沿線各地淪陷得很快，使日本在一年之間，佔據了華北和東南沿海大部分地區，並沒有多少機會給北方的軍民去「浴血抗戰」。

「不抵抗主義」是民國二十五年底截止的。但它對華北來說，是有點遲了。抗戰的轟轟烈烈，都只有在華中、華東一帶去使當地的老百姓「驚心動魄」。堅毅的中國民衆，在北方，也只得用實質上的「慢性」抗戰，內心的不妥協，不投降，去使那長驅直入的日軍陷入「背腹受敵」的恐懼。

換句話說，大片的北方國土是政府用來做爲「換取時間」之用的「空間」。我們在這樣的「空間」上，只得靠著自己的機警、忍耐與堅持，一面自求多福，一面南望王師，付出著我們一生中最寶貴的時間，希望終於有一天，能再讓我們回到「祖國」的懷抱。

久大精鹽總公司下令塘沽的員工撤退，南方有家的先已走了，臨時才奉令撤退的也已搶先找到交通工具，安全撤退了。父親是北方人，他於公於私都必須留到最後，一面護廠，一面等待別人都撤走，他的任務完成之後才可以撤退。

工廠是早已準備在不得已的時候遷往四川自流井，以便「長期抗戰」。

父親要不要去呢？

不僅因爲他是南方無家的北方人，更因爲大家都有理由南下，北方必須留一位重要職員負

責處理風雨飄搖的工廠前途，父親幾乎是唯一的人選，記憶中，好像連總務處的責任也由父親在負擔。

至於說，新進門的繼母更是特別「安土重遷」，堅持反對跟著我們這與她尚未建立感情與互信的一家，到陌生的南方去。即使有機會，她也寧願相信——這戰爭不會太久。

父親在北方留下來，當然，他也只得和大多數北方人一樣——希望這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一切都可恢復舊觀，其實，深入了解各重要部門紛紛南遷的各種動作之下，父親比大家都更知道，這局勢，不是那麼容易改變。

事實上，如果不是美國的原子彈迫降了日本，中國眞還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

附錄：蘆溝橋事變第一階段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依據辛丑條約，參加八國聯軍的國家得在北京至天津間駐兵。日本在此區原駐有軍隊一、三五〇人，一九三五年後續有增加。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我廿九軍被日軍壓逼撤出豐台。政府爲了顧全大局，暫保和平態度，將廿九軍遷至宛平縣永定河岸駐防。駐豐台日軍又要求我軍撤出長辛店，爲我軍拒絕。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在蘆溝橋附近演習，藉搜查失蹤士兵爲名，襲擊宛平縣，駐軍宋哲元部吉星文圖奮起抵抗。

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於廬山發表談話，決心對日本一戰。

（中國因在軍力物力方面自知不敵，因此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中國抗日的主要條件在精神，不在物質，全國抗日情緒極高。）戰爭起後，華北各地先後陷落，然因此使日本兵力分

散，攻擊力大減。據記載：

北平，七月廿五日開戰，廿九日陷落。（我國守軍宋哲元部，日本部隊爲香月清司部）。

天津，七月三十日陷落，駐軍是保安隊（戰爭開始時間及「日本部隊」欄均空白）。

南口，自八月十日到廿五日，打了十五天。駐軍是湯恩伯與衛立煌部。（在此同時，日軍八月九日進攻上海虹橋機場，八月十三日向我國上海保安隊攻擊，爆發了「八一三」戰事。）

上海是我國經濟中心，又是國際性都市。更是南京的屏障，政府乃派最精銳的部隊應戰。出動五十餘萬人。日軍三十餘萬人，兩軍相持三個月之久。傷亡三十萬人以上。空軍及海軍都協同作戰。

「八一三」戰事尤爲激烈而有名。

政府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日宣佈遷都重慶。

日軍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佔領南京，肆意大屠殺。

（以上摘錄自張玉法著《中國現代史》下冊。由當時我軍撤退之速，可以了解「以空間換取時間」之迫不得已。）

五一、偷渡

父親在七七事變到八月中旬這段時間，任務格外重要。工廠中其他的高級職員是忙著往南方撤退，父親卻是負責保護工廠和處理留廠員工在戰時的去路。

所謂「保護工廠」最重要的是不使大批員工覺得突然之間群龍無首。其次是盡可能做到減少損失。鹽廠和鹼廠的設備都無法搬動，所能保護的也只是資料、帳冊等等文件。而最重要的是員工們的去留。儘管說，大家明知，日本人朝夕必至，全廠員工無法像高級職員那樣撤走，為了生計，自然還是要做留下的準備，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是選擇離開工廠，不做日本人的「奴隸」。這些人，離開之後的住處及眷屬們的安頓，生活費用應維持到什麼程度，都得由父親負責處理。

在工廠當局來說，當然是盡可能的照顧。但事實上，每個人也都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萬一工廠被日本人佔領，中央軍一直打不回來，又當如何？

父親八月八日到天津來接我。我是因為堅持要來報考女師學院而被戰火劫在天津的。年少

無知的我，只在七月廿九日那天，站在法租界總公司的陽台上，遠遠看到日本飛機轟炸中國地，好像看電影一樣，不相信那是真的，心上也沒有恐慌。在天津總公司住了三天，又由公司把我送到附近一處剛蓋好的「壽德大樓」，安排了一個漂亮的卻又空空的房間，讓我住下。我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而且正好可以利用機會好好溫書，準備入學考試，眞是迷迷糊糊。其實那時學校早被戰火波及，內部也被摧毀，搶掠一空了。

十天之後，父親來到了天津，既然交通斷絕，父親是怎麼來的？我沒問，父親也沒說。

父親到壽德大樓來接我的時候，一定先已處理了許多公事，一直負責照顧我的老工友李景增中午給我送飯的時候告訴我：「你父親來了，今晚帶你回塘沽。」

我也只覺得很高興，因爲可以見到父親了，並沒有打聽戰事如何，家中怎樣。

我是非常的「不懂事」，所以連緊張與害怕都沒有。現在想想，眞是慚愧！我已經在七七事變前四天，七月三日，行過了畢業典禮，算是正正式式的師範畢業生，可以有資格爲人師表了；而我卻是那麼幼稚天眞，不但完全不了解當時自己和國家的處境；而且也一點不了解父親的心情。我在戰火燎原，危急萬分的局勢下，乘最末一班能夠開出的火車離家赴津，跟著就炮火連天，與家中音訊斷絕，父親該是何等焦慮！他一方面在緊急局勢中處理工廠要公；一方面要設法打聽我的消息，安排如何「救」我，而我卻完全無憂無慮，一個人住在壽德大樓的空房間裡，念書消遣，以爲不久就可以再去投考呢！

父親來了。

他那天穿的是一套淺灰色的夏季西裝，戴著同色的麵斗帽，腳下是深棕色的皮鞋。他好像永遠是那麼不慌不忙的樣子。也許那只是一個孩子由於對父母由衷信賴所產生的錯覺，父親交給我一個方方正正的報紙包，外面用白棉細繩紮著，囑咐我說：「好好拿著！」

我接過來，替父親拿著，把我的書袋和幾件換洗衣服用另一隻手提著，簡簡單單，隨著父親離開了壽德大樓。

租界裡，風平浪靜。也難怪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戰事。

父親和我走路到英中街的太古洋行，去接洽英國輪船。原來父親是坐英國輪船來的。漂亮的英租界的建築是我最不能忘情的景色。父親胸有成竹，在我看來，父親本來就是如此，我一切都不用問，跟著父親走就是了。

黃昏時分，我們來到海河碼頭，登上那很小的英國輪船。船艙裡有兩排面對面的座位，疏疏落落，有四、五位乘客，我坐在父親旁邊，父親遞給我幾片餅乾和一把花生米，說：「我們就吃這個當晚飯吧！」

天黑下來，小火輪靜靜地開入了河心。大家沈默著，艙裡有個小燈，暗暗的。外面沒有開燈。我們是趁夜悄悄地開往塘沽，這才使我感到這趟旅程不大尋常。

船上的人始終沈默著，有人閉目養神。

「銜枚疾走」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我暗暗地想。

只是小火輪走得很慢。我意識到這可能是怕岸上的日軍發現，或被探照燈照到，所以盡量走在其他停泊著的船隻背後，也盡量不使岸上看到一點燈火。雖然，離港時，船上懸的英國旗，但誰也不知道它現在還有沒有作用。

整整一夜的行程，父親一語不發，我也不敢隨便講話。同船的幾位乘客好像也互不相識。天還沒亮，這輪船在河的中央停住了。船上的工作人員走過來，低聲告訴大家，爲了安全，這船不能靠岸，而要趁著天尚未亮，讓我們尾隨著他，摸黑魚貫而行。跨過一艘又一艘停泊著的大小船隻，悄悄來到最靠近河岸的一艘，再從那艘船的甲板穿過。有人像是早已等待接應，黑暗中，只知道黑影幢幢，沒有一個人開口講話。我們一個跟一個，來到有跳板的地方，才能上岸。

日後回想，他們這事先的安排十分嚴密。久大精鹽和英商怡和、太古各洋行都有業務聯繫，父親更是重要的負責人。這次在交通斷絕，危機四伏的情形下，父親爲了公務，不得不冒險走這一趟，在時間的配合上要恰好。黃昏以後，從天津悄悄出發，天亮以前剛好到達預定的地點。而這地點所停泊的船隻要剛好可以供給我們這幾個「偷渡者」跨越。各船的船東更是要事先得到知會，才可以順利地給我們接應，不致因我們突然跨船引起誤會而發生意外。

我這才一路膽戰心驚。不是怕戰爭，而是怕跨越那高高矮矮的船舷時，跨不過去，或一不

小心掉到河裡去。全部這幾位乘客只有我是女孩，我是緊緊隨在父親背後，把父親在上船以前交我提著的東西交還給父親。把書袋斜背在肩上，騰出雙手，小心翼翼，眞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地摸索著爬過那一條又一條的船舷，最後總算來到了岸邊。

岸上另有人悄悄接應。帶領著我們來到了一個荒涼寂靜的處所。把我和父親送到一座很大的像倉庫似的建築，來到一個角落裡的簡陋的房間，打開房門，低聲說：「先休息一下，天亮才可以送你們回家。」

驚魂甫定，我才小聲問父親：「家裡怎樣？」

「有辦法的人都走了。新村只剩我們一家，等我把事情辦完，也得走。」

父親說完，又輕輕加上一句：「家裡買不到菜。你剛去天津，這邊日本軍艦就開砲了。兩廠怕保不住。」

熬到天亮，我們才坐人力車回家。

父親帶著我一定也有好處。至少減低了有公務在身的可疑性。路過日軍崗哨的時候，不太盤查。

一路冷冷清清，行人絕跡。我們來到新村大門口，往日警衛也已不見，整個新村空空落落，剩下我們一戶人家。原來高級職員都已走了，其餘的工作人員住在另一處員工宿舍，更有些當地有家的工人是不能不留下來的。他們在等著發薪，也等著工廠給他們是否繼續上班的命

令。

父親把我送到家之後，就匆匆到工廠去了。那位剛進門不到一年的繼母，帶著陌生的焦慮與關心，向我敘述買不到菜的事。告訴我，家中的廚子李師傅別出心裁，用油條炒粉絲。果然，今天中午我就吃到了這前所未有的「新發明」。

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教我一路替他拿著的那方方正正的報紙包裡是所有留下來的員工的薪水，全是現款。時局不樂觀，工廠隨時即將易手。以後是留是走，只得看個人的意願了。目前，工廠當局還在勉強負責。薪金照例要從天津總公司解來。戰事爆發至今，七月份的薪水還未發放，大家嗷嗷待哺之中，父親擔起這項重任，偷渡來回，把錢帶到，暫時維持了員工的生活。

這是久大工廠在日軍進駐以前，最後一次的發薪；也是父親在久大工廠南遷聲中，最後一次在塘沽工廠的任務。這以後，我們和其他一些職位不太重要而不必南下的中級職員及眷屬，一起再度乘英籍輪船逃到天津，那就是我們一家「全盛時期」的結束了。

日軍很快地如願以償。

父親既未留在工廠，也未逃去南方。他的任務是在工廠南遷的過程中，處理這邊工廠的重要事務，暫時在天津總公司上班（總公司因在法租界，暫時可以不太受日本人的約束），盡量利用這段時間，整理存放自塘沽搶運來的重要資料，做了必要的整理與保存，維持了戰後，工

廠自南方復員接收時所需的一切，並和南方持續保持聯絡。

而在這段期間，日本人雖然堅兵利甲，勢如破竹，但究竟不敢預料將來勝負如何，爲了名正言順，取得久大、永利兩廠的主權，曾和兩廠當局商量，要出資把這兩廠買下來。范旭東先生傲然回絕：

「我們的產業是不賣的。你要拿，你拿去好了！」

中國人，威武不能屈！錢就能買了嗎？

「侵略者！你且慢高興！假以時日，我們必定會回來！」

日本人也彷彿聽到了這不屈不撓的聲音。「蛇呑象」的日本人，佔領了廣大的中國土地之後，他們卻是越來越感到四面楚歌，背腹受敵而膽戰心驚！



著作年表

一九五九年（民國四十八年）以前
·以靳佩芬本名及不同筆名在報刊發表散文及小說，並爲廣播節目撰寫短劇。

一九五九年（民國四十八年）
·開始用羅蘭筆名撰寫人生哲理性之短篇論述及散文小品，在廣播與報刊發表。

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
△出版《羅蘭小語第一輯》，收入〈敝屣〉〈談忙〉〈看戲的傻子〉〈偷閑一遊〉〈小悲哀不必悲哀〉等五十五篇。
·發表〈談徐訏的詩〉於《中央副刊》。

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
△出版《生活漫談》《給青年們》等書信體廣播作品共一百四十六篇。

一九六五年（民國五十四年）

·發表〈廟裡的日子〉〈父親的照片〉〈吉人天相〉〈夏午〉〈兜雨〉等散文，約每周一篇在《中央副刊》。
·發表〈風外杏林香〉〈冬暖〉〈葉澐〉等短篇小說於《聯副》及《皇冠》。
△出版《花晨集》，收入上述短篇小說等共十二篇。
·陸續發表〈那豈是鄉愁〉〈生活的滋味〉〈寄給飄落〉等散文於《中央副刊》。
△出版《羅蘭散文第一輯》
△出版《羅蘭小語第二輯》。收入廣播作品十二萬字。

一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

·發表〈碧天偎著海洋〉〈那南風吹來清涼〉〈春夜聞笛〉〈雨中的紫丁香〉等一系列散文小說。嘗試將小說及散文加入音樂的聯想，以表達有關戀愛的各種心情，題爲「青春組曲」（《聯副》）。
·發表〈聽啊聽啊聽〉〈二弟〉等短篇及〈嗚咽的河〉中篇等以教育問題爲主幹的小說。

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

·發表探討當前教育問題的論述〈一億字的心願〉於《徵信新聞人間副刊》。（此文一萬五千字，獲得廣大讀者迴響，未收入任何文集）。

開始撰寫《飄雪的春天》長篇小說。

△出版〈羅蘭小說〉短篇集。

·發表《綠色小屋》，先爲短篇，在《人間副刊》發表。後改寫爲十二萬字之長篇，在《純文學》月刊發表。

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

△出版《綠色小屋》。

△出版《羅蘭散文第二輯》，收入〈生活的滋味〉〈那豈是鄉愁〉〈彩色的聯想〉〈青春組曲〉等，計三十篇。

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

·發表長篇小說《飄雪的春天》，於《徵信新聞·人間副刊》連載。

·《羅蘭散文第二輯》獲中山文藝獎。

·開始爲《婦女雜誌》撰寫「現代生活」專欄。

一九七〇年（民國五十九年）

△出版《飄雪的春天》。

·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訪問，沿途撰寫「訪美散記」並遊歷歐洲及亞洲等十一國。

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

·發表〈華府風貌〉〈天涯若比鄰〉〈無止境的超越〉〈洞天豈在塵寰外〉等遊歷散記（《人間副刊》）。

△出版《訪美散記》。

·發表〈孔夫子在臺北〉〈莊周夢錢〉寓言及其他散文於《聯副》及《華副》。

一九七三年（民國六十二年）

△出版長篇小說《西風古道斜陽》（在《文壇月刊》發表）。

一九七四年（民國六十三年）

△出版《羅蘭小語第三輯》。陸續出版各散文集。

一九七六年（民國六十五年）

△出版《詩人之國》（在《中央副刊》發表）。

一九八〇年（民國六十九年）

·發表《歌與春及花》系列小品於《聯副》，並予同年出版。

△出版《一千個你怎麼辦》選集。收入為廣播節目所撰寫之敎育短劇及問題解答一百篇。

△出版《獨遊小記》。

△出版《早起看人間》，收入為《婦女雜誌》所寫有關社會及婚姻問題之專欄計三十六篇。

一九八一年（民國七十年） ・《天下雜誌》創刊，應邀撰寫有關傳統文化與經濟社會之矛盾與調適問題之專欄。

一九八二年（民國七十一年） ・撰寫《濟公傳詩歌劇》。

一九八三年（民國七十二年） △出版《濟公傳詩歌劇》。赴印度旅行。歸國後，發表〈印度行〉〈印度一弦琴〉〈風雨歸舟〉等散文於《聯副》。

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 △出版《羅蘭小語第四輯》。收入〈勇往直前談人生〉〈答問談道家〉〈武俠小說中的武與俠〉〈百川匯海溯源頭〉等討論傳統中國文化之散文與現代生活小語約十二萬字。

・爲《民生報文化版》撰寫「指南針」短評。

一九八五（民國七十四年） ・發表〈燈的隨想〉系列小品於《聯合文學》。

・赴菲律賓參加亞洲華文作家會議。次年夏，寫〈菲律賓的資源及藝術〉，題名「另一種財富」，發表於《天下雜誌》。

△出版《生命之歌》散文集。收入〈燈的隨想〉〈生命之歌〉〈印度一弦琴〉〈風雨歸舟〉等計卅三篇。

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年）　・往返美國多次，體驗美國生活，撰寫〈美式商業幻術〉〈跟上時代的悲哀〉〈屬於中國的現代〉等專欄論述。

一九八七年（民國七十六年）　△出版《從小橋流水到經濟起飛》。收入〈從不屑言利到不恥言利〉〈從三顧茅廬到自我推銷〉等爲《天下雜誌》所寫之專欄及〈孔夫子在臺北〉〈莊周夢錢〉等相關文章，計三十八篇。

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　・兩岸開放之後，開始往返大陸，撰寫〈故土之旅〉、〈返鄉小記〉等散文，在各報刊陸續發表。

一九八九年（民國七十八年）　・赴美國遊歷落磯山十州，歸後寫〈旅行筆記〉在《中華日報》發表。

・《羅蘭小語》及《羅蘭散文》等書在大陸出版。

△《綠色小屋》英譯本出版。

一九九〇年（民國七十九年）　・開始撰寫《歲月沈沙》散文，記載所做的生涯回顧。

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　・應邀赴南非旅行，發表觀感及詩一系列於《聯副》、《聯文》與《華副》。

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　・應大陸出版界邀請，赴東北參觀訪問，歸後寫〈野風呼嘯過關東〉等散文，並開始爲《天津日報》不定期撰寫〈羅蘭時間〉

等散文，及小品。

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發表「我家雪莉」生活故事一系列，及其他散文於《聯副》、《華副》與《新生副刊》。

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發表《歲月沈沙》於《中華日報》、《新生報》、《青年日報》，美國《世界日報》轉載。

一九九五年（民國八十四年）△出版《歲月沈沙》三部曲——「薊運河畔」、「蒼茫雲海」、「風雨歸舟」。

歲月沉沙三部曲：

薊運河畔、蒼茫雲海、風雨歸舟

封面設計：朱旭

ISBN 957-08-1388-1



前言

——獻給讀者

一九九〇年七月，台北天氣酷熱，住處樓上又在整修房屋，竟日塵土飛揚，噪音盈耳。不得已，只得向中央圖書館申請了一個研究小間，一方面避開塵囂，一方面想讓我對自己這生命的長程，做一次感性的回顧。

我這趟生命的列車，已經在這世界上奔馳很久了。我不想就這樣頭也不回地沿著這生命末梢隨風而逝。並不是我要留戀這世界，我只是想要認眞地了解一下自己這幾十年生命旅途上，都看到了一些什麼，和它們究竟都代表著什麼意義？

在中央圖書館，我用了三個月時間，從自己出生那一天的《大公報》開始，細讀自一九二〇年代到晚近的各種相關史料，我所致力尋訪的，全是自己曾經從旁走過，卻又全是當時幼小或年少的自己所不曾了解的一些路程，它們籠罩我，影響我，塑造我，考驗磨練我，也培育我。而我這三個月在「研究小間」，藉著報刊書籍上的文字記載所做的生涯回顧，可以說是讓我把一生所經過的路程，從頭再走了一遍。

離開了「研究小間」，我開始沈下心來，用剛剛回去檢視過這趟旅程的、嶄新而澄澈的心情，著手寫這部題名《歲月沈沙》的書，寫這樣一個渺小的我，如何走過了這樣一個複雜的時代。

那是一九九〇年九月，我開始寫下這部書的第一篇——〈大宅巡禮〉，想要帶讀者回去看看我那記錄著歷史軌跡的老家。

也要感謝一九八七年的與大陸恢復來往。那以後的五年之內，我往返大陸十趟。它不僅讓我認識現在的故土，也給了我具體的可能性，去找回我廿九歲以前的腳步，用屬於一個中國人的一世滄桑的心情，把那悲喜交集，一言難盡的感慨，通過實際的了解和具體的回顧，來做一次由衷的表達。

今天，是一九九五年四月廿七日了。

我從《薊運河畔》寫到獨自飄洋來到台灣之後的《蒼茫雲海》；歸結爲能在有生之年，回到故土去尋尋覓覓的《風雨歸舟》。

寫這樣一個中國人的生涯回顧，用了將近五年的時間。我實在已經很累。所幸，我總算把握住這段時間，讓自己有機會回溯到生命的源頭，用惆悵而又安恬的心情，認眞地「再活了一次」。

現在，當我擱下這支爲我用慣的筆，靠向椅背，面對滿室空寂，仍彷彿聽到遠遠傳來歲月的

濤聲，帶著沈雄的迴響，向我叙述它們的感慨，告訴我時間的去處，宇宙的遼闊，與個人生命的渺小與蒼涼。

讓我就此把感慨化作欣慰，把這部《歲月沈沙》獻給愛護我的讀者。

「**海上風濤闊，扁舟好自持**」，是我當年隻身來台時，面對茫茫大海，惆悵悽惘而又對前途充滿憧憬的心情自況。其實，它也是每個人在人海風濤中奮勇航行時，所共有的心情，個人所能做到的，也許只是爲自己好好掌舵，認識這航程，記錄這航程，以使自己不虛此行吧？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九九五）四月廿七日台北

薊運河畔：歲月沉沙第一部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初版第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臺幣180元

著　　者　羅　　蘭
執行編輯　吳　興　文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3620308・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6 4 1 8 6 6 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6 4 1 8 6 6 2
印 刷 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388-1(平裝)